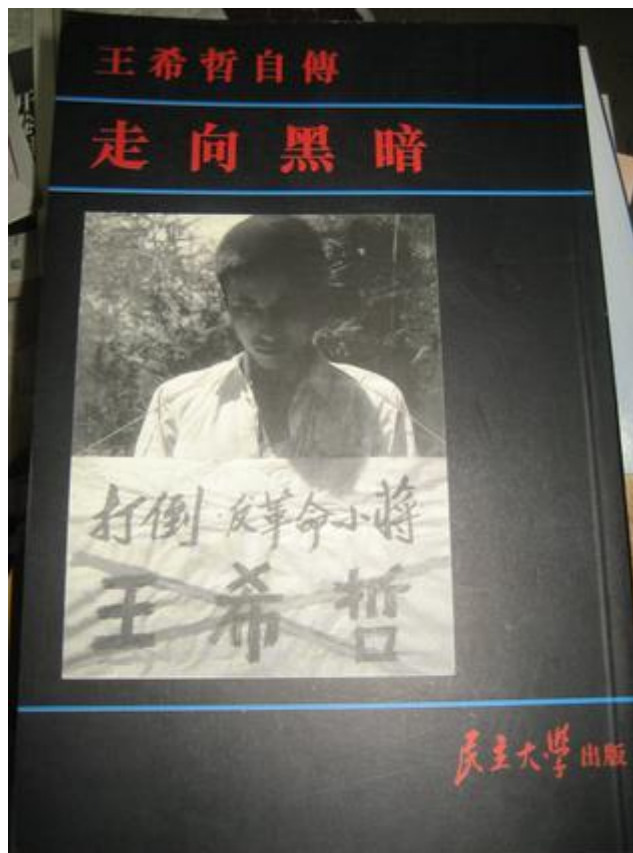


走向黑暗

王希哲



目录

走向黑暗.....	1
王希哲.....	1
一、蒙昧的年代.....	8
二、广州的风云.....	12
三、血染的青春.....	17
四、大联合、三结合.....	22
五、亡命扬子江畔.....	29
六、带血的思考.....	33
七、广阔天地.....	37
八、压迫中的升华.....	44
十、邂逅李正天与结识郭鸿志.....	50
十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55
十二、赵紫阳与批黄运动.....	60
十三、李一哲与批黄运动.....	65
十四、李一哲的宣言《民主与法制》.....	72
十五、迎战数百万人的围剿.....	75
十六、沉默中的期待.....	80
十七、转折的牺牲品.....	84
十八、黄华监狱的囚徒.....	87
十九、冰川下的春潮.....	92
二十、习仲勋的阳光.....	97
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	109
二十二、伟大的中国之春运动.....	119
二十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	131
二十四、《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141
二十五、“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	145

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评介

龚小夏

接到王希哲送来的他的自传《走向黑暗》，当即一口气细细读了两遍，从晚饭后一直到凌晨四点。

王希哲的名字与他的政治背景，对中国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与抗议运动稍具知识的人恐怕绝不陌生。当年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曾经拥有大量热心的读者，“民主与法制”也因该大字报而成为七十年代末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主要口号。然而，该大字报形成的背景、大字报作者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前后经过，在王希哲这本书出版之前却基本没有得到过全面、正确的报道。这不仅导致许多有关事件与人物的真实情况被误传，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民主运动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因此而出现了空白。

《走向黑暗》一书记载了王希哲和他的朋友们在六七十年代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狂热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苦难——包括监牢与“上山下乡”——的磨炼，如何一步步地发现了“民主”与“法制”，如何将他们的发展付诸文字，又如何因为文字的公开而遭受到迫害的整个过程。之所以说是“发现”而不是“寻求”或“探索”，正是因为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成长起来的王希哲那一代人从来都被完全地隔绝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之外，连那些制度的最基本的描述性常识也被干净彻底地从他们的知识来源与信息系统中剔除了出去。正如曾经是自然科学尖端的牛顿力学现在已经是中学基础物理的内容一样，曾经被各时期各类型的专制政府视作洪水猛兽的“民主与法制”，在今天的自由开放社会里（哪怕是在九十年代中国那样的专制半开放社会里），已经成为公认的政治社会准则。然而在“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年青人中间，人们对于“民主”的认识仅仅限于所谓“民主生活会”给领导提点不疼不痒的意见，或是按照官方的安排去写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不明真相的外人看上去热火朝天的“人民大民主”，实际上也不过是毛泽东排斥政敌的工具，参与者在思想上不得越出正统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否则便要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基本上没有来自外部世界的启发的条件下，“李一哲”们不得不独立地去发现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尽管这些观念早已被现代文明的思想先驱系统地探索、研究讨论了几个世纪，也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制度化地实行了从几十到一二百年。

《李一哲大字报》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中国出现的如果不是第一篇，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对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制度的探讨。同时，这一探讨的基础，是作者们对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九年后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实行的政治社会专制的批判。《走向黑暗》详细地记载了大字报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具体过程，包括大字报诸位作者的个人经历，其中有一些关键性的描述值得引起我们特别注意：

首先，书中追溯了文革中的造反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的渊源关系。文革中的造反运动，一方面固然是毛泽东与中央文革铲除异己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却也培养了大批富于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并且具有相当的组织经验与活动能力的人。从组织的角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六十年代后期的造反运动是七十年代民主与

抗议运动的助产婆。王希哲以及“李一哲大字报”的其他几位作者，还有书中记载的活跃于广州地区地下运动的人物，绝大部份是当初广州造反派“红旗派”的活跃分子。文革期间，他们曾经将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连续的几场政治运动——包括“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之中，广州的造反派遭到了军队的残酷镇压。王希哲的个人经历在那一代人中颇具典型性：一个单纯的中学生成为造反派的活跃分子，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和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炼之后，开始对培养了他的那个政权和社会盟生了怀疑和反抗意识，进而将这种意识形成文字和政治活动。类似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从几乎每一个红卫兵出生的民主运动参与者那里找到，正是这些当初毛泽东的革命的狂热参与者成了后来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中坚。

第二，王希哲笔下围绕著“李一哲事件”而描述的地下政治活动场景，为我们提供了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地下抗议活动的生动画面。在目前西方对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的研究中，七十年代基本上是个空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或者是放在文革早期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抗议行动上，或者是着眼于民主墙时代之后一波连一波的民主浪潮。然而，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系统地对七十年代进行研究。事实上，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王希哲的记载，为了解这一时期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信息。

第三，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获得作者们意料之外的影响。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王希哲还涉及到了民主运动自身的分裂问题。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但却无法回避。不可否认的是，各阶段民主运动主要是由参与者对当前社会的不满所结合起来的，而他们各自对国家政治前途往往有著非常不同的期待。在政治社会状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时，运动的分裂也就必不可免。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著共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每次民主运动的高潮过后，类似的情形都曾经产生。这也是政治运动发展的必然过程之一。

综上所述，《走向黑暗》一书虽然是王希哲的个人自传，但却包含了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历史。需要补充一句的是，作为书中描写的许多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之一，我认为王希哲对一些主要当事人与主要事件的描写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

然而，作为个人传记，《走向黑暗》却缺少了一点个人色彩，使得这部书看

上去更象是历史记载而不是个人故事。或许可以说，王希哲是个非常勇敢的行动者，却不是个对他人与社会的很好的观察者。他的笔下少有个人细致的心理感受，对不少重要事件与人物的描述也相当粗疏。

书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是作者对待文革时期的经历似乎缺乏批判与反省。作为广州中学造反派的头头之一，王希哲参与了当时发生在广州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虽然从前后的叙述中，读者能够猜测出来这些事件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但其影响的方式、角度、深度，却无从得知。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在武斗中他命令就地枪决投降者——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但却被作者一笔带过。总的看来，尽管王希哲在七十年代之后的文章著作中对文革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在写下自己年轻时代的历史时，似乎难免流露出了几分对那个轰轰烈烈时期的留恋。这种感觉看来妨碍了他更为深刻、更为系统地去剖析这段个人经历，也使得他后来的思想演变显得缺乏深厚的根基。

另一处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是作者没有能够详细地介绍《李一哲大字报》各个思想观点及其根源。在动笔时，王希哲似乎下意识地将他的读者对象仅仅限于经历过文革、熟读过大字报的一批人。对不属于这群人的读者来说，想要弄明白大字报的大致内容及其历史重要性，恐怕还得另费一番功夫。如果作者能够进一步系统而全面地整理出大字报的思想资源与形成过程，不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加清楚明白，对于专家学者来说也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启发。

至于“李一哲事件”平反之后王希哲再次卷入的民主运动，书中的描述更是蜻蜓点水，草草交代了事。那实在应该是另外一卷或另一书的内容。

作为当年的友人之一，我还是觉得王希哲在对待一些老朋友——特别是李正天和陈一阳——的时候有欠公允。须知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不同的政治和人生道路，尤其在平反之后更是如此。只要不是出卖良心，对他们的选择似乎不应该过于苛求。另外，在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王希哲对朋友似乎也应该有多一些的理解。

就我所知，他在人生其他方面虽说颇不顺利，但感情生活方面却比许多人都充实。他有相对比较正常的家庭以及与他情投意合的妻子，因此便也不容易理解那些生长在扭曲破裂的家庭中人们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处理爱情婚姻和其它人际关系的方式。无论如何，我只希望他多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对老朋友们多几分宽容和体谅。

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王希哲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的自传对于中国当代的政治和思想历史是非常宝贵的史料，研究与关心中国当代历史，特别是中国民主与抗议运动历史发展的人必须一读。

□ 原载《北京之春》第42期，1997年2月号



“李一哲”部分女成员，左起：袁伟英、袁小敏、龚小夏、张帼娃



“李一哲”部分成员左前：张帼娃、陈慧珊、李秀芳、龚小夏、陈明。
后左起：郭鸿志、王希哲、项明、郭应颐、陈一阳、张嘉琪、李正天

共产党说，它是灯塔，它是光明。人类只有在它的指引下才能得救。我下面的故事是写一个青年(后来他老了)怎样一步一步远离了这灯塔的照耀，走向黑暗的。

王希哲

一、蒙昧的年代

一九六二年，我十三岁。按那时的说法，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的背信弃义，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回学校的一路上，都能看到弃婴。到处是浮肿的人们。我父亲所在的武汉电影制片厂，从导演到职工只好以吃高粱，吃小球藻和打太极拳来救饥和救病。

在此三年之前，是一个狂热的时代，那是大跃进。我父亲从上海来到武汉，援助建设武汉电影制片厂。在遍地饥荒之中，现在“下马”了，按照中共“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父亲又与武影厂的骨干陶金等一起调到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从此，广州便成了我的故乡。

我学俄语。我进了广州第十七中学住读。这间学校在山灵水秀的越秀山麓。学校图书馆的李老师很喜欢我，要我帮她整理图书，我当然乐意，因为可以读书。我读了《斯巴达克斯》和《拿破仑传》。我特别喜欢让女孩子知道我在读这些书。

第二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地震：中苏论战开始了。在宿舍里，我很仔细地听高年级同学议论邓小平、彭真赴苏的会谈。我也仔细地阅读了一论和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直至后来的“九评”。甚至为了学好俄语，我还直接地以中俄文对照的方式读《关于斯大林问题》，从此发生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在后来的李一哲驳宣集文的系列大字报里还能找到此时的“九评”对我的影响。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国内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围绕李秀成评价问题，戚本禹派和罗尔纲派激烈地辩论着。在那时少年的我看来，戚本禹实际上是在重围中作战，姚文元更是呼啸着抗争着周谷成、邵荃麟等的围攻。我把他们的文章都剪了下来，收集起来。我同意戚本禹对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评价，我更叹服姚文元的胆魄和逻辑推理的战无不胜。在姚的文章面前，周邵一类文人的立论显然是躲闪的，软弱的。请原谅六十年代初的这位十四岁少年，他那时不可能明白，这种软弱和躲闪并不是姚文不可战胜的结果，而是面对着姚的后面那不能不低头的压倒一切的官方意志的结果。

随着姚文元、戚本禹对海瑞的批判，国内政治空气极度紧张起来。在我高中一年级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被揭露了，我们高一（2）班发生了一次关于彭德怀问题的辩论。班长，解放军157医院院长的儿子马克东认为彭是内部矛盾，是年老了，跟毛主席不上了，才去“稍息”的。我力争，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急关头彭德怀既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并得到了右派那样的赞赏和极力为他翻案，就说明彭是敌我矛盾。随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集团被揭露，小道消息传来，更震惊了我们。结合苏联变“修”的宣传，那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播，对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责问，在全国上空轰响。刚好学生

饭堂的墙报轮到我们高一（2）班编辑，我便写了个评论“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马克东说，他是班长，但他不能对这版墙报负责任。我说，“我是宣委，我负责任。”

六月五日星期天，下午要开班干会。上午，珠影演员剧团团长张早的儿子张沙俊告诉我，他们学校（华师附中）闹起文革来了，大字报已贴满了校园，直指校党委书记麦某，揭露他是“小邓拓”。我立即回校。班委会上，我把华师附中运动的状况告诉了大家，并建议班委会的议题改学《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班主任李翠云支持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派闫历、郑子华、邓志去华附取经。同学们也闻讯赶来。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字报立即布满了学校。我干脆把“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抄成大字报贴在垒起在大门正中的书桌上。运动开始了。

六月七日，教育局工作组进校，一进校便挑动高三的同学来监视我们，围攻我们。我后来的战友陈一阳也参加了围攻。气势汹汹的质问大字报贴进了教室，并宣布复课。我们高一班坚决不复课。当晚由高一级的团员骨干谢良骥等（大多为干部子弟）主持，开了一个师生串联会，反驳了对我们的指控，并提出口号：“教育要革命，我们要革命！”会上，五位年轻教师表示支持我们。

市委工作队也进校了。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如报纸上鼓动的那样，来支持我们，进校第三天工作队便伙同党支部搞了场大规模的“打狐运动”，把六·七会议打成“高一黑会”，把支持我们的五位年轻教师李翠云、杨爱梅，谭秀琼、丘瑞霓、张壮欣打成了“狐狸帮”。李翠云面色惨白，张惶失措，已经与丘瑞霓私下讨论今后怎样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脱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谭秀琼哭哭啼啼，好象末日已经来临。杨爱梅倒从容不迫，谈笑如常。她丈夫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帆。

高一造反的同学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我自然首当其冲。我很难过，心情矛盾而苦闷：“工作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然要拥护，要相信。但为什么恰恰这五位支持我们的年轻教师都是右派呢？真的我们做错了？”我把心事告诉了同学莫庆梁。意外的是，他听后却悄悄地告诉我，原来他是工作队布置他故意接近我来刺探我的思想的。现在却被我感动了。他愿意与我共同来调查这个事件，为这五位教师辩护。

工作队发现了我为抵制他们而进行串连的苗头，便要我去参加博罗县的抗洪。那时，对领导的安排是不会讲价钱的。我去到博罗，举目是汪洋一片。农民告诉我们，这下面都是庄稼。我和抗洪的同学睡在冲毁的一座堤坝上的席棚里，每天轮流担泥筑坝。就在大坝合拢的时候，我得到消息，北京开了会了，否定了工作队压制革命师生的错误。果然第三批工作队下来了，并迎接我们回校。

我回到学校连络莫庆梁、廖广生等，以“刺刀”小组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开打狐运动的黑幕”，炮轰工作队和党支部。而何志波、周继能、李小平等同学则以“澄清”小组的名义，对我们的大字报进行反驳，这便是我校两派形成和发展的滥觞。

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浪潮中，广州各报登载了市委文教书记薄怀奇接见十中女学生刘肖芳，支持其“革命行动”的报道。十中党支部便成了文革中第一个被抛出来的黑党支部。王继新、栾勃的工作队开大会，宣布支持我校师生前段的革命行动，号召揪学校和教育局的“小邓拓”、“小赫鲁晓夫”。同时，他又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下，宣布“爱揪谁就揪谁，爱斗谁就斗谁”。

这一下就象炸了锅。学生的乱斗活动立即野火似的蔓延开来，纸糊的高帽子到处戴，教师一片恐慌，朝不保夕。有些教师恐怕我会组织学生斗他（她），不断地私下找我求情。我虽然从来没有斗过老师，但也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大错，以为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的“矫枉过正”。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十六条下来，工作组形式被否定，并撤出，斗教师的风潮才渐渐平息下来。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上天安门检阅了数十万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他们冲出校门，斗志昂扬，四处寻找着“革命”的目标。他们抄了“四类分子”的家，把他们拖出来殴打。他们剪喇叭裤，剃“飞机头”，把“封资修”的书扔进火里，又把“封资修”的遗物砸烂；他们把大街小巷一切不顺耳的路名，通通改过来，“革命化”了。这些路名，十多年后又在否定文革的方针下通通复原。例外的是，十七中学生黄建言（我井岗山公社的“兵”）砸烂了“永汉路”的牌子换上了的“北京路”，却奇迹般地保留到了现在，给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留下了一处难得的怀古凭吊之地。

大串连迅速兴起。工作队留下的校“筹委会”却关紧了铁门，贴上标语：“要革命的留下来。”为此召开了辩论会。一位年轻教师激烈地反对外出串连，认为学生走完了，就会影响对工作队错误的批判。陈一阳也反对串连。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梨子”。而这梨子就是本校的运动。我上台争论说：“在群众尚闹不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的情况下，发动大家先出去经风雨，见见世面就显得十分必要。光吃梨子不会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吃了苹果再吃梨子才会更清楚梨子的滋味。”同学们呼喊着我同意我的意见。筹委会主任苏英也表示赞同了我的意见，愿意开证明给同学们出外。铁门冲开了，同学们都浩浩荡荡地涌出去了。

我到了北京，住在北京航空学院。十一月三日是难忘的。我随200万红卫兵的洪流在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中缓缓地淌过了天安门广场。一大早，队伍已经集结，当我即将进入广场时，天已黄昏，远远只见毛主席在天安门的一角向手持红宝书疯狂跳跃的千千万万红卫兵挥动着军帽，周恩来、陶铸轮番地焦急地劝导着同学们快点走。我暗暗地在心中向伟大领袖宣誓：“毛主席，我永远忠于您，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航的大字报极多，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大字报历数了彭、罗、陆、杨的罪行和他们“窃据”的地位，历数了贺龙的“二月兵变”和刘、邓的错误。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自遵义以来，最紧急，最关键的一次会议，毛主席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读了它，不能不使人感到红

色江山危危乎殆矣，文化大革命真是及时的了！

那时，东北的哈军工“造反团”和“八八团”好象把整个北京占领了。到处都是他们的大标语，互相攻击，闹得很凶。我想，出来无非是取经，取经就要从典型入手。于是我决定到哈尔滨去。自十二岁离开武汉之后，好久没见过大雪了，一见东北的冰天雪地好亲切。

我住进了林学院。我索取了造反团和八八团两派的资料并阅读了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小报和资料，觉得潘复生和潘复生支持的造反团是正确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相符的。甚至林副主席都支持造反团，为此还发表声明与他参加八八团的女儿林小琳断绝关系（后据说，是叶群所为）。

在林学院，我还亲眼看到了一种奇观叫“打、砸、抢”。凌晨，我被激昂的大喇叭广播声惊醒，窗外，传来部队跑步前进似的一片急促的“咔咔”声。起身一看，大队的造反团红卫兵正朝八八团的总部冲去。一会儿，八八团愤怒抗议的喇叭声里传出什么东西倾倒的嘈杂和一阵女声的尖叫，便静止下来，寒冷的夜空中，剩下的只是造反团的喇叭兴奋的呼喊。别人告诉我，这是造反团把“老八”的窝给砸了。我被惊呆了：“原来还可以这样！”又想，“大概这体现了‘革命是暴动’吧！”以后，便也司空见惯了。

从哈尔滨出来去了趟大庆。我是一心“革命”的，没有别的红卫兵那样一种乘机游山玩水，全国乱逛的兴趣。串连考察一个月后，我已是归心似箭了。

二、广州的风云

大串连开拓了我的视野。回到学校，我开始把眼光向社会延伸。

正当此时，广州发生了一件震撼白云山的大事——《红卫报》，即原《羊城晚报》被封了。这一下，运动原还相对平静的广州象丢了炸弹，全城立即翻滚了起来。

原来，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也没有能够同意工人的造反活动，特别是不允许他们成立跨单位、跨行业的组织。直到上海工总司造反，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按毛泽东的意思与工人达成协议，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在既成事实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另行发布文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这样，全国各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渐次发展起来，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进入了高潮。

1966年12月13日，以武汉红卫兵三司牵头，联络中大831、华工红旗、珠影东方红、哈军工造反团等，逼中南局书记金明签字，一举封掉了《红卫报》。

这个行动在广州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一群南下学生的联络站发难的。他们的目的，一是以此为突破口，揪出陶铸；二是为了加快激化广州运动的矛盾，把广州运动推向高潮，带着勇敢的性质。

广州市民早已听说他们在北方封了《解放日报》、《长江日报》了，现在又目睹他们跑来广州封报。矛盾确是激化了。

六十年代广州市民的思想尚普遍排外，在此之前，南下“破四旧”所谓“打狗”的红卫兵，就已不时遭到成百上千市民的愤恨围攻和殴打。甚至赵紫阳、金明亲自到场也无法制止。《羊城晚报》是他们最喜爱的报纸。虽然文革开始后，“通俗性”、“趣味性”已荡然无存，但习惯还在，喝夜茶的工人大佬们，上茶楼的时候，少有不抓份《羊城晚报》的。现在这张报纸却突然被那些来广州包办革命的外省“佬头”封掉了，如何不使他们愤怒万分！

丰宁路羊城晚报社一带每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反封派被骂作是“老保”，要保放毒的羊城晚报和中南局宣传部；封派则被斥责为企图封锁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我对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我认为在“十条”刚刚下来，广州运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也没有事先对《红卫报》作充分的批判，使人理解的情况下突然地、冒险地把它封掉，势必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工人群众赶到革命的对立面去，何况，某些人正是企图这样做来显示自己“革命”。哈军工驻

穗代表林云给广州军区的报告信里就说：“把广州工人革命造反派队伍推上广州政治舞台的是封《红卫报》事件”。“封与反封的斗争实际是‘革’与‘保’的矛盾在当时的尖锐反映”。我不赞成。我担心，这会给广州今后的运动带来极有害的后果。我以“十七中红旗公社”的名义在丰宁路报社前贴出大字报和标语组，主张恢复出版红卫报，然后以新红卫报批判旧红卫报（羊城晚报），这样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些大字报和标语“人微言轻”，没有得到任何的响应。

果然，运动的发展证明，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到一个月，上海兴起了“一月风暴”。毛泽东高度赞赏了《文汇报》的夺权斗争，二报一刊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一月二十二日，广东夺权开始，中大红旗闪电般地站了出来。它是广东学生企图摆脱北方学生操纵的第一次独立行动的尝试。显然它也看到了封《红卫报》由北方学生牵头造成的广东工人发自地方主义潜意识的反抗。但也正因为如此，又引起了北方钦差大臣学生的不满。使它一开始就陷入了宗派利益的争执中。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等组织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宣布向广东省委夺权。

面对夺权，赵紫阳很识时务，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发布“告全省党员书”，没有任何抵制交出了大印。省革联成立。

但省革联无法实际运作权力。他们只能向各部门派出形式上的监督小组。权力的实际运作，仍由省委、省政府及各职能厅局原班人马执行。

“唯我独左”的省革联对反封派甚至对异己的造反派的排斥激起了反封派和造反派反对派形成的联合阵线的更猛烈的反抗。他们把省革联夺权视为阴谋，视为造反派与走资派相勾结搞的“假让权真复辟”的闹剧。他们要“打倒赵紫阳，绞死省革联”。挤满了中山五、六路、北京路一带的两派游行队伍和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复盖，日夜不停地对骂。

一月二十五日，公安系统反省革联的多数派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邹力志领导下，向省革联驻公安局监督小组发起反夺权，与省革联派的“公安红旗”发生了冲突。广医红旗、省直站与其他一些工人组织闻讯赶到，冲进了公安局以省革联名义逮捕了邹力志，制止了反夺权。同时已经掌握在省革联手里的《广州日报》发表社论把1·25反夺权宣布为反革命夺权，使得支持省革联与反省革联的矛盾更加激化。1·25警察开着成百辆的警车和消防车上街游行，与原反封派的队伍合流，形成了反省革联的铺天盖地的声浪。红旗工人、红农友、广医红旗等大批省革联中坚宣布退出了省革联，大多外地驻穗学生以“新北大”为代表也指责省革联。赵紫阳一看不妙，为脱干系，也贴出了“踢开省革联，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此时站出来反潮流，写出“为什么我们要在战火中参加省革联”的，仅有崔文涛、刘克为代表的省文化局造反派了。

省革联“黑云压城”岌岌可危。为稳住阵脚，它决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一次大型辩论会。我感到这次辩论会将会直接影响省革联的命运。我已决定必须支持省革联。汲取“人微言轻”的教训，我想寻求支持。我立即赶到省委，在省委办

公大楼找到了进驻在那里的北师大井岗山联络站的谭某。北师大井岗山是个有影响的组织。我已与谭某数次交换过对广州运动的意见。他那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省革联。我对他说，省革联目前的形势已相当紧急，希望他能参加这次辩论并发言。我谈了三点意见供他参考：一，省革联虽有关门主义的错误，但它是新生事物，依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应支持省革联；二，省革联应该改正错误，立即改组，把造反派和反封派中的所有造反派（在本单位造走资派反的）吸收进省革联；三，省革联如果一垮，会立即引发排斥造反派的再夺权，整个广州运动就向右转，不可收拾了。

谭某没有反对我的意见，表示到时一定去。

辩论会那天，台上台下挤满了人，外面的人流还在不断向纪念堂涌来。大会主持人立即决定改到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不多时，能容七、八万人的体育场已经全部坐满，只见漫山遍野摇旗呐喊。1·25警察大队人马扛着旗从正门牌楼进场，直逼主席台下扎寨，然后也是呐喊。开始的发言不甚激动人心。然后谭某上台了，自报北师大井岗山，引起一阵欢呼。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条理鲜明，出乎我意外的却是历数省革联的罪状。这些罪状并不新鲜，无非说省革联不是革命的夺权而是阶级调和，排斥大联合以及把数千造反派警察打成反革命等等。这位优秀演说家每数一条罪状的最后，都要安排一个煽动性的自问自答句：“这难道是大方向正确吗？不，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每问之后就是山摇地动般的欢呼和响应：“一千个不正确，一万个不正确！”下面的1·25警察更是激动地把大旗舞得哗啦啦响。我一见不妙，立即上前站到话筒前面就要发言，不料一个面圆圆的小个把我挤开说：“我是中大的，我先说几句，”他把双手插在一件敞开的旧棉袄里，傲然地自报家门：“我是中大红旗的张尔纲。”也引起一阵欢呼，但他似乎意识不到谭某刚才的犀利发言造成的反省革联派的压倒气势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没有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却仍是自话自说地讲了一通1·22夺权的过程和省革联不怕压迫的空话，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倒彩。他讲完，我欲再讲时，主持人宣布散会了。我长叹一声知道，大势已去了，省革联完蛋了。果然，这次大辩论之后，省革联便一蹶不振，广州的大街小巷除了倒吊着写着“省革联”的稻草人外，再也听不到拥省革联的强一点的声音了。

赵紫阳被认作是阴谋家，不停地被两派拉出去，作不同方向的批斗。

二月底，广东军管。为杀鸡警猴，黄永胜立即取缔了跳得很高的珠影东方红、电台东方红、八一战斗兵团和红农友等组织。广州运动立即全面萧条。

四月中，周恩来总理为处理春季交易会事务来到广州。他批评了广州军区，肯定了1·22省革联夺权的方向。他老练地看到，省革联的垮台，主要是因为外地学生企图在广州包打天下而再夺权造成的。为此，他批评了清华井岗山、新北大等。他为珠影东方红平反，造反运动再次复苏。

反省革联的造反派并没有因反省革联而减轻广州军区对他们的猜疑和压迫。省革联垮台，广州军管，果然使他们尝到了“整个广东运动向右转”的受压滋味。为回头评价三月的军管，一切受压的造反派自然认为是糟得很，黑风滚滚，故称

黑风派，为首的组织多以“红旗”命名，便称“旗派”；原反封派则认为好得很：“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故称“东风派”。

四月底，我校以我原“红旗公社”等为主力，联合其它十几个组织成立井岗山公社，并加入了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

“新北大”在“三月黑风”中的表现，特别使得广州造反派们刻骨憎恨。新北大走访广州军区后抛出的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但在广州各报登载，而且由军管会专印了数十万份在全省散发。广州的造反运动一复苏，广州各中学造反派头头本身的组织“革命钢杆”（我也在其中）便立即把批判的火力喷向了它。

接着，又是“革命钢杆”，发起了烈士陵园5·3绝食斗争。企图从营救省直站头头项明入手，营救“三月黑风”中所有被捕的造反派知名人士。

绝食斗争得到了中大8·31、暨大东方红等的支持和参加。这是文革中广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绝食斗争。全市许多组织纷纷参加或游行声援，声势浩大。

项明是军管后被所谓“群众扭送”到公安厅的。公安厅二办负责人宫本德拒绝释放。绝食到第三天，谈判毫无进展。“绝食指挥部”发布《向毛主席宣誓书》，宣布750名绝食代表即刻起“绝食、绝水、绝盐、绝医”。昏倒学生猛然增多。

第二天，5月6日，黄永胜在军区接见中大红旗代表，表示公安厅二办扣留项明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应立即解决项明问题，同时表示愿意接见绝食代表。

随之，项明获释。项明来到绝食现场，流着眼泪表示感谢大家。但绝食队伍仍没有撤，要求为项明彻底平反并释放所有被捕的造反派人士。

正当此时，中央文革来电：

广州静坐绝食的群众组织：

1，希望你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要采取绝食行动。要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2，请你们推举代表与军管会负责同志协商解决。集结的队伍请你们回去。

3，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学生和有关单位共同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1967年5月6日23时

蔡登望（中大头头）和革命钢杆头头黄婉（二中）坚持认为不达目的不撤。

亲自参加并指挥绝食的红司司令武传斌想撤，但拿不定主意。我和陈一阳见情况紧迫找到武对他说：“不要犹豫了，必须撤。同学们都已饿昏了（武这时也饿得说话没力气了），中央来电后，人心已经浮动。再不撤势必变成抗拒中央文革，群众也就不好再声援你了。”武得到我们的支持，终于下决心撤。

反撤派不服，翌日在广医开辩论会，（“革命钢杆”的总部设在那里）黄婉激烈地攻击了武传斌和我的“右倾”。我起身反驳了她，我说：“毛主席说：饭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个一个打。革命只能一步一步去达到它的目的。企图用一次激烈的行动，就把什么目的都达到，甚至中央文革来电都拒绝执行，只能使我们脱离群众，变成少数人的冒险，这就不是我右倾而是你左倾了！”在场的人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包括辩论会的主持人，中大八·三一头头黄意坚也给了我赞许的微笑。昨天，他还是反对撤的。从此，武传斌就和我很熟了。

三、血染的青春

一九六七年春夏，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文革坚持着文化大革命的上海模式，即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最终实现以造反派掌权。这个模式在五月六日成都“132厂武斗事件”发生后，又一次在四川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们着手在解决武汉问题时也按照这个模式进行。但这一次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制。

因上海模式并不牵涉军队问题。但“一月革命”引起大混乱后，实行的各省全面军管，使各省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首先过军队这一关。军队是少有喜欢造反派的（怀仁堂的“二月逆流”是它的上层表现）。这样，当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谢富治、王力奉令要求武汉军区陈再道改变方向支持“三钢、三新”造反派以瓦解“百万雄师”时，中共军队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大规模兵变事件便爆发了。警卫武汉的独立师8201部队造反，绑架了谢、王，逼迫中央文革。这便是震惊全国全世界的武汉“七·二0事件”。

这次兵变虽在武汉空军、东海舰队的急速干预下平定了，但却使毛泽东、中央文革认识到了军队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影响。他们仍然没有放弃上海（四川）模式，他们决定着手解决军队问题。7月22日，江青号召造反派在“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面前“文攻武卫”，林彪则走上天安门，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在这一形势下，广州军区感到危机，因“三月黑风”后，广州的造反派以中大8·31为首早已发布了炮轰黄永胜令，把矛头指向了他们。

武汉“七·二0”事件及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之后，广州的武斗气氛急速上升，先后发生了“七·一九糖厂事件”，“七·二三中山纪念堂事件”，“八·九中南林武斗事件”等。

对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我和我领导的井冈山指挥部是拥护的。对于武斗这样一种准军事斗争，在那时的我们看来，是一种文革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到了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当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军内走资派时，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既然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面对武斗又有什么可怕呢？

八月十一日，这对井冈山公社来说是黑色的一天。中午，我乘车去司令部开会，到中大听说中央文革代表下飞机后便遭到了绑架，很可能会发生广州的“七·二0事件”。头头已到广州兵团组织兵力去了。我马上赶到七中，见到一车一车全副武装架着机枪的广州兵团战士已在开出去。“八·三一”的陈子均说被绑架的是金敬迈，头头已走了，暂没有十七中的任务，要我赶回学校待命。我心急似火，催司机快开，谁知“文革牌”的司机李穗昆在下东山铁道急转弯时竟翻了车，好在我伤不重，吩咐将伤重的人送去中山医学院，自己便拦了部车继续往回赶。同学们一听这消息，义愤万分，纷纷请战。虽然这时我们已有了几支枪，

但仍觉执行任务不够。欧志武提议马上行动抢一次枪，说空军后勤可能有。事情紧急，我同意了。

曹敏松、郭耀昆从6路汽车总站强借了一部“火柴盒”车，争着做司机，我决定曹敏松开。（后来回想，才庆幸我这个决定救了一车人。）大家挤了上去，有数十人，车顶也坐了人。空军后勤就在我校的对面，空军与造反派的关系历来较好，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吃过“窝边草”，这次事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车绕到环市路电视塔前停下。那时的环市路还是郊区，荒无人迹。我们攀过铁丝网，趟过齐腰的茅草，转过山包便见到了一排排营房。大队人马乱嘈嘈冲了进去。营房却不见有枪（原来抢枪风潮开始后，部队已奉命将枪坚壁起来了）一些人只好顺手捞了些军装和钢盔。

出得营房，部队已经列队，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羞愧万分，不敢让他们看见是“邻居”所为，命令大家赶紧从原路撤回。

没有抢到枪，欧志武仍坚持要去白云机场。我不同意，认为情况不明，司令部并没有给我们这个任务，还是回学校待命。

绕大北路经德宣路，车过中山纪念堂，进入省人委地段，突然遭到猛烈伏击。枪声噼噼叭叭地响。我只觉臀部象猛挨了一棍，麻得很。向外一望，只见一个家伙正倚着省人委大门柱举步枪向我瞄准。坐我前面的梁江平钢盔已经穿透，白色的脑浆直冒。我马上大叫：“趴下，冲出去！”十六岁的小个子曹敏松一听枪响，机警地蹲在方向盘下，以两侧楼顶定方向，刹时间冲了出去，驾驶室的玻璃全是弹洞。他个子这样小，又蹲下，头皮仍被子弹划破。若是大个子郭耀昆，那就完了，他必死无疑。司机一死，满满一车人的伤亡就更是无法数计了。

曹敏松冲出火网就大喊：“细佬（我的绰号），车往哪里开？”我回道：“直开中山医！”

车到中山医，竟停不下来，顺坡直冲了下去，原来刹车系统已被打坏。曹又急问，怎么办？我命令道：“撞墙！”曹敏松猛一打舵，车跳上了人行道撞穿了执信路口邮电局的一堵墙，才停了下来，街对面东山消防队立即过来抢救，将伤亡人员抬进医院急救室。我支持着自己走过去。医生为我取出弹头。我听说罗干英伤势最重，一排子弹扫过肚子，肠子出来了，极为痛苦。

晚上，同学们送消息给我，死亡五人，轻重伤十几人。指挥部人员负伤的便有我、罗晋江、欧志武。欧志武重伤，子弹击中脑部，幸好车分秒未停，送院抢救及时，不然便没救了。

我悲痛极了，陈一阳也悲痛极了，握着我的手疯狂似地喊：“报仇！报仇！”

“8·11事件”，是广州市区发生的第一起伏击事件。紧随我校之后，又

有几辆过路车被打翻，死伤多人。主要凶手，人民汽车“615”的沈志华、黎子昂后遭逮捕，下落不明。

十四日，武传斌在陈一阳陪同下来看我，告诉我鉴于广州治安已近瘫痪，红联红警司已经成立，并着手接管治安工作。为集中力量，要我们撤出学校驻进海珠广场陈列馆，并抽一部份力量参加红警司加强团。陈一阳执行了武传斌的布置，撤到了陈列馆，并抽调了林汉为首的一个战斗队参加了红警司。十六日，武传斌参加了在中山医召开的八·一一烈士（那时是理所当然的称谓）追悼会后，便踢着拖鞋乘飞机赴京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广东两派谈判了。

红司联络员肖妙琼通知我，司令部决定委托我担任红警司副司令。但公社指挥部研究后，考虑我住院，改由陈一阳代任。

由于武斗，市民纷纷筑起街垒、路障自保，恐怖的谣言飞传。广州十字街头到处吊着被活活打死的所谓逃亡劳改犯的尸体。红警司理论上是要担负起已陷于瘫痪的广州社会治安、保卫、交通等职能，故其司令由公安红旗头头，原八处干部刘沛良担任。副司令由广铁温仲其、体院吴之伟、“八·三一”黄意坚等担任，政委则由中南局干部车学藻、空军学毛著标兵黄祖示先后担任。武传斌曾在北京邀请黄永胜担任政委，据说黄满口答应，后来却又不认帐。

我在医院关心着已撤到陈列馆的同学，也关心着红警司的工作。

八月十九日晚，发生了围攻省总工会的武斗，这是红警司成立后部署的第一次作战。据报告，鉴于东风派控制的省总工会大楼经常放出冷枪造成人员伤亡，已经成为了威胁长堤、珠江航道、海珠桥和工人医院安全的据点，红警司决定拔掉它。具体部署是，从二轻大楼方向的进攻，由八一兵团王全才负责；从工人医院方向的进攻，由黄意坚率领大、中学生负责，从海珠桥长堤方向的进攻，由三司红旗兵团负责；邱长卿的海员总司则负责出动红旗轮封锁江面。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一开始，正面进攻受阻。王全才搭软梯从二轻大楼攀过省总大楼，上下夹攻，造成混战，才把东风派的“守军”逼上了塔楼。事后，我校参战的邓某告诉我，他冲上楼的时候，东风派还以为是自己人，招呼他，他便把手榴弹扔了过去。

武斗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北京人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正主持着广东两派的谈判，据说莫超海即找邱学科商议，希望他做工作停止对省总的围攻，因省总的“守军”正好是他的部下。周总理闻讯即问：“怎么还在打？”立即吩咐樊大九打电话回广州命令进攻停止下来。周的联络员老谢陪樊去打电话。樊用粤语问江振洪，还有多久拿下来？江说还需二小时，正准备用火攻。樊说那好，二小时之后一定要停火，周总理下令了。谢等在旁边听不懂粤语。但他大概也能猜到樊某不会那么听话，便另外通知了广州军区。解放军即时赶到，省总塔楼的“守军”在旗派即将举行火攻的危急关头，终于在部队的保护下撤了出去。

第二天，旗派便遭到了报复。8月20日，旗派车队在三元里遭到了猛烈伏

击，死亡数十，伤数百人，被俘数百人。

广州1967年8月的大规模武斗，是广州军区黄永胜、闫仲川一伙，在武汉“7·20”事件发生，陈再道垮台，中央文革揪军内一小撮的形势下，为了自保，而一手策划和操纵的。这在当时，便有了大量的迹象和证据。1974年，原东风派工交红旗头头张守云揭露的一个秘密材料，更作了进一步的证明。

张守云说，1967年7月某日深夜，黄永胜在军区小岛秘密接见了，提出：

“我建议你们总派的五个组织，各抽出一个头头，其中有你们，成立地下指挥部，地点设在郊区某大队，我们派人保护你们，负责一切”，“你们要什么，我们全力支持”。

张说，接见他之后，黄又连续接见了其他几个总派的头头，作了同样的布置。

张又说，“7·20”事件后某天，闫仲川在小岛又接见了，他，“要我谈谈对7·20事件的看法”。要求张在声援武汉大会上发言，支持广州军区，并派了副参谋长杨芝清与其联络。如此等等。

广州武斗形势急剧紧张，客观地说，东风派在军区的支持下，首先顺利地得到武器，装备了起来，并竭力防止红旗派也得到武器。红旗派最初得到的武器，则来自公安部门。因省革联夺权接管公安局后，较熟悉公安部门的武器装备状况。

8月20日前，总派已得到旗派将去北郊石井某海军仓库抢枪的情报（有这种说法，引诱旗派去石井抢枪，本身就是计谋），于是，立即派遣人汽“615”头头陈庆全、傅亚恩等率武装会同广铁北站“春雷”、“郊贫联”等在棠溪一带布伏截击。第二天，旗派车队果然来到，便发生了震惊广州的“8·20”大屠杀血案。死亡的大多为九中、铁中、十一中等的中学生，不少为女学生。

“8·20”血案后，戈枫、黄施民等93名省、市委干部发表声明，抗议这场有军方背景的屠杀事件。结果，全部被军方打成“黑手”。正如他们所说，“杀人的无罪，抗议杀人的倒有罪了”。

我刚能走动，便来到了陈列馆。我校驻扎在六楼，与广氮工联住在一起。它的头头是戴眼镜的青年技术人员梁锦豪。

回来没多天，又发生了西村水厂武斗。这是两派为了争取水厂的控制权而发生的。

西村水厂原掌握在红旗派手里。东风派以“615”、“春雷”为主力于8月30日晚9时开始对它发起了猛烈进攻，红警司决定增援，以反包围的态势为水厂解围。我校林汉率的一个加强班已随红警司队伍出发了。据说负责此次行动指挥的是八一战斗兵团的原塔山英雄团的复员干部詹某。

这时已是午夜，我上到陈列馆顶层用望远镜了望水厂方向，只见一片通红的火光，不时传来爆炸声。林汉来电话报告我，进展迅速。当冲击水厂某大门受阻时，谭进林毅然站出来用冲锋枪暴露射击，吸引对方火力，掩护了张稼贤用炸药包炸开了大门，自己负伤。现已占领了水厂一个据点并正向纵深发展。我很高兴，鼓励了几句，放下电话就到司令部看看。他们正在开会，议论纷纷说一师范的装甲汽车在彩虹桥被穿甲弹打穿，车中有人竟打死自己人投降。我有些担心，马上再打电话叫来林汉，问他我校的战士怎样，他说都很勇敢。我说：“司令部命令，若再发生投降事件，就地枪决！”

由于红警司及时的增援并阻断了进攻者水、陆两路的援兵，“6 1 5”——“春雷”被迫撤退，水厂之围遂解。终文革之局，广州的供水从未中断。

这期间，红警司调查血案凶手的侦缉人员捕获了一名对“8·11”、“8·20”血案都负有重责的人员张金贵。他被关在陈列馆包装参展机器的大木箱里。对他怎样处置，成了驻陈列馆各单位关心的问题。我公社经过讨论不主张枪毙他，认为可以教育释放以体现旗派的宽大胸怀，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把这个意见上报给司令部。吴之伟原拟同意枪毙张金贵，犹豫未决。梁志泉也劝他谨慎。正当此时，铁中王一飞、21中张明子等人不待命令自行将其装入麻袋，拖到21中后山乱枪打死了。王一飞（后来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责任》的主编）为此坐了多年的牢。

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主席批准的交枪令。“又不文攻武卫了么？”我们不理解，但为了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回到了学校立即封存了枪支弹药。这时我闯了个祸。我想，一个月来养伤没有过过枪瘾，枪交了，大概就再没有机会玩玩了，便私取了驳壳枪上越秀山打了一通连发。枪声一响，山下一带的单位、居民以为又发生了武斗，人心惶惶，同学们也纷纷冲击弹药库要求打枪，反对交枪的人也乘机嚷嚷不要交枪。只见陈一阳激动地高喊：“同志们，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毛主席要我们封枪，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封？毛主席要我们交枪，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交？”军训团一看事不宜迟，立即要我们把枪枝弹药装上车，插上彩旗，写上标语，敲锣打鼓地送到了梅花村军区指定的交枪点。

四、大联合、三结合

毛泽东曾号召过：“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这个“底”究竟是什么呢？毛泽东并不清楚，中央文革也不清楚，红卫兵更不清楚。他们只好按照各自的理解走去。

1967年秋季，毛泽东感到他原来设想应该打倒的政治敌手都已打倒，但是，地方上的派性斗争仍不能平息下来。军队的顽强抵制，使上海模式难以通行。他不敢冒军队瓦解的风险，他反过来要中央文革“还我长城”。他发表了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最新指示”的精髓，就是放弃上海模式。他第一次向造反派群众威胁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在毛泽东发了警告这一形势的逼迫下，11月15日，马拉松似的两派北京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广东省革筹名单得到通过。

在这之前，九月份以来，广州军区已渐转舵，公开承认红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并在工革联（旗派工人联合体）成立大会上授旗以示支持，同时写出检查，承认了二三月军管期间压制造反派的错误。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检查。周恩来也曾在两派谈判会上表态说，广州的红旗派是造反派，东风派“偏于保守”。这一切使得省革筹三结合的名单，略体现了红旗派的代表优势。那些日子，很使广州的红旗派们高兴了一阵子。

但他们很快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要想把“造反派略占优势”的大联合、三结合的原则在广东各市、区、县和机关、工厂、学校贯彻下去简直是困难重重或简直是不可能。因为广东的军队干部和原省、市委干部大多都在感情上是站在东风派一边的，他们都是具体实施“三结合”的核心。真正承认红旗派的不多，而且大多被打成了黑手如所谓“闵、车、张”，“相、江、陶”，“张、戈、黄”，“薄、陈、江”等以及赫赫有名直到不久前才逝世的吴有恒。

对在“三结合”中不能取得优势，甚至不能取得起码的政治肯定感到威胁最大的是工人。他们与学生不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的利益。

实际上，文革中基层单位的两大派并不纯是文革的产物，它是文革前四清工作队在职工中划分左、中、右，早已深刻分裂了职工队伍，使之势不两立的一种恶性爆发。在基层单位，许多工人甚至干部，他们当初投入造反运动，正是出于对文革前四清运动极左政策的不满。如果他们这次造反后，不能最终在政治上得到肯定的待遇，那么，他们会落到比过去所受压制更惨苦的境地中去。

正因为如此，1968年春的广州街头，工人的大字报成了最引人注目的舆论中心。

赴京谈判代表回穗后，参加与未参加谈判的红旗派头头们几乎全体集聚到佛

山，召开了一次学习和传达会议。会议的“纪要”反映了他们大多还没有从北京的幻觉中解脱出来，因此非常乐观。会议的基本精神认为，“大局已定，大权在握”。

这种乐观的估计由于与基层事实不合，于是很快便出现了一个反佛山会议浪潮。首先造反的是樊大九。他们批判所谓“大权在握论”，提出“大局未定，大权在争”的口号。

反佛山会议派的思潮又被称为“八·五思潮”。广州造船厂“1 2 2 战团”与“红司呐喊”（李正天属此组织）合署的《十大分歧》，也被称为这个思潮的代表。它的最极端的产物，则是由吴有恒操觚（此文确写得精彩），贴上街头，发表在《八一战报》上的《广州还需大乱！》

十七中井岗山公社还未表态，因为我还拿不定主意。但公社属下的最激进的战斗队，曹哲武领导的“8·11血战团”，却在外与水电院红旗等组织，一再联署文章，抨击佛山会议。这都迫使我不得不迅速作出决断。

工人的抵制情绪影响了学生。大、中学校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也同样不很顺利。

佛山会议是符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它转舵了。它把造反派瓦解保守派取得胜利的上海模式，转变为两派无差别的大联合模式。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转变？出了什么事情？我决定行先跳出广州这个圈子看看，使我对全国文革的形势，有个总体的了解。

我又走了趟北京，回了趟四川。清华、北航、川大、川医这些院校我都去看了大字报，找人交谈。我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是：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已经到了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叫“进行到底”的问题了。

清华有个“4·14”思潮。它认为，“造反派能够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天下是共产党的，造反派不等于共产党。因此造反派在冲击了资反线，批判了当权派后，就应主动退出舞台，让那些虽受了批判，但并非叛徒、特务的干部重新上台执政。

这个观点其实很接近毛泽东此时的意思（但后来他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说他不赞成清华“4·14”的“造反派能够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说这个思潮是反动的）。毛泽东在视察讲话中警告造反派不要坚持企图以自己为核心掌权，否则要犯错误，就十分明白无误了。

但大多地方的造反派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坚持希望象上海一样能够让造反派掌权。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革命才算“进行到底”。

但这又立即遇到一个问题，造反派本身也划分有许多不同的派系，都坚持自己具有成为掌权最终核心的资格和权力，这么一来，“底”也就无止境了。

所以毛泽东要求围剿派性，恢复党性。“天下是党的！”这是毛泽东转舵的依据。

正当此时，《中国向何处去》及它的姊妹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使命》已在康生点名之后广为流传了。批判它，几乎成了贯彻毛泽东视察讲话的组成部分。《中国向何处去》是湖南省无联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理论家是杨曦光、谢若冰等。

他们也正是要回答这个最紧迫的“底”的问题。但正好极端相反。如果说“4·14”思潮的特征是“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话，省无联思潮的特征则是造反派干脆把这个天下打烂，换个天下，然后坐上去。他们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而这个“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他们石破天惊地指出：

“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政治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即所谓“底”）。

但是他们又认为，周恩来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太强大了，毛泽东不得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面前妥协和后退。因此，全国各省的革委会、革筹会不过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面临着辛亥后的局面。

坦白地说，我那时根本不能接受“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概念。接受这个概念已经是十年后在柯木朗监狱读完《资本论》以后的事了。我更不能接受周恩来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但是，杨曦光们独立地探索和回答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的勇气和思路，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了。

回到学校，我在四楼礼堂召集了学校各组织活动分子及青年教师座谈。我在介绍了我观察到的外地形势后，明确表达了我的反派性立场。我说，北京的“天派”和“地派”，武汉的“钢派”和“新派”，成都的“红成”和“8·26”都是造反派。保守派一垮，他们自己为争核心就打起来了。如果广州的东风派瓦解了，红司和三司打不打？恐怕也会打。这么纠缠下去怎么结局？文革的目的是批资反线和走资派。这个目的既然基本达到了，群众组织就应该联合起来。我建议立即成立校革联实行大联合。人们对我的发言感到惊讶。教师都涛站起来表示不同意我对四川形势的分析，他似乎是支持“8·26”的。

井岗山公社指挥部根据我的建议向军训团提出了成立校革联。军训团很高兴地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当时，因全市红司中学系统只有十七中、二十一中大联合搞得较好，红司要求我们总结经验。2月16日，我去司令部汇报工作，并参加武传斌主持的讨论中学红代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当时中学红代会正因名额的分配争执不下。我将井

岗山公社的“6：6”方案提了出来。我说：“毛主席说争核心是愚蠢的。核心是靠我们正确的政策和口号，争他干什么？”六中头头黄瑞伦（黄后来在香港成了一名著名的“左派”，一位美国人写的《毛主席的孩子们》曾例举他）。说，向群众不好解释。我说：“主要是干部，群众好解释，开个辩论会就通了。”会上，武传斌赠给我一本那时很稀有，很珍贵的袖珍《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着：赠给亲密的战友王希哲 永远做毛主席的红卫兵 武传斌。

几天后，市二轻大楼礼堂召开了一个中学头头和活动分子参加的辩论会，我代表十七中作了发言，结果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对意见，中学红代会便按照“6：6”的方案成立了。

学生组织的联合实现后，校革委会的筹备便提到了日程上。为了清除派性统一学生的思想，军训团组织了几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向同学们提出了一系列供讨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随着这些问题的热烈辩论形成了以我为代表的“炮声派”和以陈一阳为代表的“烂漫派”。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的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

我渴求着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和历史的知识。刘慧雪老师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丈夫，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磊（现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是孙中山研究的权威。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哲学史，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孟夫子到孙中山，他介绍我读一本艾思奇的通俗哲学。后来，他还借给了我一本研究所内部参考用的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我如获至宝，把它推荐给陈一阳和其他最密切的同学。我读了它后感觉，如果说马克思透过商品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则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发现了划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篇《笔记》，我从推崇它到后来的批判它（见本书第二十一章），整整影响了我十年。

哲学研究所离我校很近，武斗中是我校的控制范围。一切建筑都很熟。我太爱书也太缺乏书了。我从建工局医疗所楼顶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的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自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张磊听说，大怒，让刘老师传话给我说：“绝交，绝交，绝交！”我自感惭愧，再也不敢找他。不知张磊老师至今肯原谅我吗？

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想安下一段心来，政治风云却又一次起了变化。

毛泽东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为了应付他自己施放出来又无法善后的混乱局面，不得不应急地要求消灭派性——但中央文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派性。毛泽东对造反派派性的警告、威胁和围剿，特别是王、关、戚的垮台，鼓舞了文革中长期倒霉挨整，蓄怨待发的“右派”及其支持者。无可避免，北京便出现了一股所谓为1967年“二月逆流”翻案的“逆流”。

先是，外交部91名司局长联名贴出大字报“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欢迎陈毅回外交部主持工作。周恩来一见不好，立即会同陈毅本人发声明，把此事压了下去。但中央文革已是怒火冲天。

接着是，国防科委提出了“左派”标准必须“拥护聂荣臻为核心”的正确领导。此提法离经叛道，更遭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训斥。

然后，便是北京地派学生的拥护谭震林、余秋里和炮轰张春桥、谢富治等等。

毛泽东最愤怒的便是“右派”的翻案。一直到他死去的1976年。他立即布署反击。他亲自和林彪、中央文革一起，抓住了“杨、余、傅”事件大作文章，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中央文革需要得到支持的力量。他们又想起了造反派。

但是“造反派”早已被毛泽东剥去了派性。没有了派性也就没有了造反派。中央文革需要重新把他们武装起来，为他们再次披上派性的盔甲，教他们再次执起派性的长矛，把他们再次推上派性的战场！

昨天还在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昨天还在说：“围剿派性，主席说，这不是替造反派脸上抹黑，而是教育造反派”的张春桥、谢富治之流今天就说：“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

随之，“两报一刊”一篇又一篇发表社论，传达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号召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来，各校、各工厂单位的“无派性”（实际确以东风派为中心）的大联合、三结合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冲击。反佛山会议派士气大振。昨天还在受到前后左右围攻的“八·五思潮”一夜之间，成了红旗派坚持原则的“中流砥柱”。昨天还在跟着反派性的红司、三司、新一司、机关红司、工革联、珠影东方红的各家小报，纷纷倒戈，重振派性。

最注目的是在反派性中高姿态倒旗停刊的工革联机关报《广州工人》，又宣布复刊了，并在复刊号上通栏发表了广州十大厂（广钢、广重、广氮、广纸、广船、黄船、供水、供电、水泥、发电）联署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关于目前广州运动的若干看法），又发表了这十大厂的大联合《调查报告》。这个工人自

己的调查报告，以翔实的材料，披露了造反派工人在得不到政治肯定的“大联合、三结合”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排挤的苦况，令人震撼。

这份广州文革中最有分量，最有影响的工人大字报和调查报告，正是由原佛山会议派的广州造反派工人赴京谈判首位代表，广船的顾芳诚牵头组织的。

广州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5月13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开车去中大，宣布逮捕所谓造谣的黄意坚（未遂），因为他从北京带回了反右倾的“小道消息”。武斗和抢枪的消息也到处不断传来。我校也有人不满公社指挥部的右倾迟疑，自行介入了抢枪。但这一次解放军没有敲锣打鼓而是开枪迎接。他们身中枪伤，铩羽而归。

面对这一形势，我虽然不得不同意在校门外也刷上了“彻底反右倾”的大标语，但对是否应该重提坚持派性还是心有疑虑的，我明白它的后果。

我记得去年“7·20”武汉事件后，明明是林彪、中央文革上天安门号召“揪军内一小撮”。局势严重后，却把责任推给了王、关、戚和造反派群众；明明是“7·20”后，林彪接见刘丰，提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才引出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文章。可受毛主席批评后，林彪却不认帐，倒煞有介事地批判杨成武，把这一切又推到了杨成武的身上。他们的这种翻云复雨、无信无义的行为，使我感到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而根本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的极其肮脏自私的宗派斗争。他们不是正派人，红卫兵不应该跟他们走。周总理是正派人，是值得信赖的。我不由得对这次反右倾的打击对象，周恩来所要保护的老干部们——谭震林、陈毅、余秋里产生了同情，并在阅读那些他们抗争的“反面材料”的同时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

我把这些想法悄悄地向同学们散布，这也就为我伏下了今后挨斗被揭发的祸根。

正当我仍犹豫未决的时候，陈一阳向我建议召开一次井冈山政治工作会议以决定我们的方针。我同意了。但我已感到无力也无兴趣把握今后的发展，要求政治工作会议分两个报告，由我作过去一年工作总结的报告，由曹哲武（实际是陈一阳）作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早已挺身而出反对佛山会议的曹哲武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由他来作这个报告，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

陈一阳从一开始就是井冈山公社的实际领袖之一。他的组织能力，他的理论学识和他的诗词都是出类拔萃的。但是除了短暂地代理我的红警司副司令一职外他从未正式任公社职务，因他出身于旧官僚——他的父亲陈适，曾任黄埔军校教务处主任，是鲍罗廷、周恩来的密友。至于与蒋介石校长的关系，那时，他父子当然都是讳莫如深的。

半个月的筹备工作后，政治工作会议在造反楼召开。造反楼内外布置得隆重热烈。三天的政工会议都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军代表、各组织头头列席了会议。代表们对报告分组进行了讨论。军代表潘主任也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称井岗山5·22决议）仍大致肯定了前段大联合、三结合的方向，但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广州军区参谋长、省革委副主任邱国光。指责他歪曲门合精神，只讲反派性，不讲路线斗争，“坚持过去的错误口号，实质上就是要把运动拉向右转”。指责他暗示红旗派是阶级敌人，“这是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作舆论准备”。决议最后呼吁全市革命派都来批判邱国光，把他“作为广州反右运动的组成部分”。

“井岗山5·22决议”的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广州许多家有影响的小报都予以转载；各机关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仿效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作出了类似的反右倾翻案的决议。

政工会议后，我便退出了井岗山公社主要领导岗位，由曹哲武替补。但外界，特别是军代表方面却一口咬定认为我应当向这次矛头指向军方，企图动摇已定的三结合格局的风潮负责。从此，在军代表眼里，我便成了“坏头头”。

不久，积聚广州上空的武斗乌云终于炸开。继5月22日海珠广场供电局武斗，白鹤洞5月30日22中武斗之后，6月3日更发生了中山大学火烧物理楼（十友堂）的特大武斗。我赶到中大看时，“8·31”的杨飞立已在武斗中死亡。物理楼的大火已经逐渐烧上了顶层。中大东风派“革造会”（今广东省公安厅长陈绍基先生即此组织）头头阮向阳冒死跳楼。我估计他可能是为了下来谈判，急唤黄意坚，他正在楼里指挥火攻，不料回头一看，在场的中学生（主要是撤到中大的22中学生）不由分说乱棒齐下，已将其打杀。我阻止不及，徒唤奈何。

广州抢枪之风迅即重新蔓延。

为制止广西和陕西的武斗，毛泽东连续发布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其实广西早已不是什么“武斗”。韦国清操纵指挥“联指”用机枪大炮把“4·22”派杀得个天昏地暗，血雨腥风，积尸远浮伶仃洋外，震动香港澳门。这是文革中，全国所仅有的。同属广州军区，广西军方下手的坚决鼓舞了广东军方。广东的五华、梅县、潮阳、怀集、广宁都发生了军方纵容、参予下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尤以海南儋县为甚。广州市，军方也扔掉了“一碗水端平”，翻过脸来，对红旗派头头秋后算帐，批斗拘捕，风声鹤唳。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受到了一次显然预谋的伏击、绑架和殴打。衣服撕烂。我身上的东西被抢去，包括武传斌赠我的《毛主席语录》。这些，后来都落到了军训团手里作为“勾结小爬虫”的罪证陈列。（武传斌已经被捕）

我奋力挣脱了围追，躲进了中山医学院。

五、亡命扬子江畔

武传斌是从北京一回到广州就被捕的。

为了向周恩来反映广东的“右倾翻案”和各专县血案的情况，他和邱学科来到北京向周的联络员呈递材料。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下，七月十九日，他又和广西朱仁一起在北航主持了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市造反派组织上京告状情况交流会，并着手在北航设立一个常驻的联络站。武传斌真是昏了头：全国性的组织，是随便搞得的么？他当即受到周恩来点名的严厉指责，狼狈回到了广州。军方已等候多时了！

抓住这个机会，代理黄永胜职权的孔石泉立即召开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批斗关押了武传斌、邱学科和莫竞伟等。由此，大造声势，大肆牵连。每个单位都在鼓噪搜捕他们的“坏头头”了。

广州已经无法藏匿了。我不得不逃亡到了武汉，住进了湖北话剧团。我少年时代的朋友黄小忠收藏了我（他现在在哪里呢？我永远忘不了他）。

不久，陈一阳也逃亡到了武汉，住在武钢。此时，武汉文革的形势倒相对平静，引人注目的仅是“北、决、扬”的一些大字报。即所谓“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扬子江评论”，其核心人物，不过是冯天艾、鲁礼安、张志扬、蔡万宝等人。他们的主要文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考茨基派》、《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为了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最终要发展到以造反派的受压和瓦解作为结束，其思路与“省无联”一样，都是反周的。不同的是，杨曦光把周视为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代表，“北、决、扬”则把周抨击为从中派到右派从而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茨基派”。这些观点，对我已不新鲜，惊世骇俗的是，冯天艾在《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公然地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一文中的语录号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决不应该交出去！”

武汉的传言很多。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座谈纪要已在街头张贴。这标志着毛泽东已不得不抛开了他文革中超然的、凌驾于群山之上的神圣面孔，直接面对红卫兵，指责他们，宣布了红卫兵运动的死刑。他甚至点了武传斌的“北航黑会”，说它是“代替中央，指挥全国运动”。

在“新华工”，我和陈一阳见到了黄婉，她说从广州跑出来的头头都打算去庐山开个会。我们也决定去。我担心路费不够，陈一阳说可以在途中找点担泥、推车之类的临工，挣点钱。

到了黄石，真的路费不够了，再说我记挂着可能也要来武汉与我会面的我的女友苏令仪（苏江），便折回武汉，陈一阳则一人去了浠水。意欲亲眼看看当地的农民运动。

回到武汉，收到苏令仪的信，说她缺路费，加之军训团的警告，不能来武汉了。我懊丧极了，十分地想念着她。

我少年时代心里便有了一位单恋中的小姑娘，她是珠影某导演的女儿。我经常借故出现在她的面前，假装是不经意地向她显示我与众不同之处。但却经常地受到她的嗤笑，使我丧气。也许那属于少男朦胧“初恋”的情感也极其纯真吧，她至今在我的心中仍留有不可抹去的印记。

我再次打开情感的门扉是一九六七年底的那次返川。故乡的亲人们都十分地关心我有没有女朋友（我已十九岁），要我“下次把媳妇带回来”。我的大妈似乎还很有心要撮合我和我的表妹，有时还闹得颇为尴尬。这都不能不挑起了我对异性的思索。

在回广州的火车上，望着缓缓后退的，无边无垠的大西北的黄土沟壑百无聊赖。“这黄土沟底下埋葬着五千年多少的白骨啊！”我想起了我投身的文革前途艰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就象我那死去的五位同学一样（半个月后，又死去两位）。火化前，我剪下的李志林的头发珍藏在我的身边，看着它，真有点惶然了。我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死，固不可怕，然而年轻的我，来到这世界上，没有尝试过一回男女之爱就象李志林他们一样，永远永远地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未免总有点遗憾。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校内校外已有好几位女同学以暗示甚至明示的方式向我传递过爱的信息，然而情感的门扉是打开的还是人为地压抑着的，大不相同。我对苏令仪产生了印象是她参加排演《红卫兵战歌》的时候。

一九六七年末，大联合和各级革委会的筹立正处于高潮或密锣紧鼓之中，两派都需要以文艺宣传的形式向外界展示自己“紧跟毛主席”的辉煌斗争史和功绩，用以争取“三结合”中更有利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学东风派红卫兵的《红卫兵万岁》和中学红旗派红卫兵的《红卫兵战歌》。

《红卫兵万岁》基本上是肖华的《长征组歌》的套版。歌词写得豪迈、老练，但内容却显得空洞苍白，最有激情的一场为“血战红八月”，这是歌颂他们抄家破四旧的。但那实际是对“牛鬼蛇神”的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绝对压迫，并没有什么“血战”。令我诧异的是朗诵也很差，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应该不乏朗诵人才。

《红卫兵战歌》则模仿舞蹈史诗《东方红》。它的歌词总体文采比不上《万岁》，主题歌几近于嚣叫，但其内容是充实的，几乎包罗了毛泽东、中央文革领导和肯定的文革当时的全部重要阶段，其表演水平和音乐创作、演奏水平也不错。

特别是“文攻武卫”的那一场，女儿对母亲的那段唱，真个是惊天泣地，发可冲冠，充分地表现了那一代青年红卫兵经过了十七年共产党狼奶的哺育后，养成的为革命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真实感情。而这段英雄主义歌词完全来源于“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武汉七月诗”。它甚至悄悄地影响了1979年中越“武斗”后所产生的那些风靡全国的英雄诗，比如，从那时起一直唱到了“六·四”，唱到了香港、旧金山和巴黎……的《血染的风采》，明眼人一眼

就能认出武汉“七月诗”的影子：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让共产党新的当权者和他们的走狗们去咒骂、污蔑那些当年在他们的党中央的号召下，为了他们的权力斗争而无辜地献出了生命的青年吧，我向他们脱帽致哀。他们的死是无辜的，但他们的死和他们的亲属蒙受的无休无止的冤屈却使人们终于懂得了共产党政权究竟是怎样的政权。他们的死是有意义的呀！

《红卫兵战歌》的排练场地在十九路军坟场的广东音专。莫庆梁率领的我校井冈山宣传队进驻在那里。送他们出发时，我曾作动员，要求他们每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去演好、唱好。但是，当我去检查工作的时候，莫向我汇报说：由于普遍的风头主义，各校宣传队甚至各个人都争着去演出团，不愿去合唱团，矛盾很大。为了顾全大局，表现出礼让的风格，莫决定，我校宣传队全部参加合唱团，不争演出团名额。这一来，就使满心希望在这次大型演出中露一手的善舞的同学（包括莫本人）受到委曲。不过莫说，由于道理讲清楚了，大家没闹什么意见，接受了，其中他提到了苏令仪，说她本来是很能舞的。这使我注意到了这位剪短发，穿一身女军装，面圆圆的女同学。

我们的关系在悄悄地发展。

逃亡武汉前夕，我约她出来见一面。我们在红花岗烈士陵园前的那片松林里（今天的擎枪雕塑碑后面）见面了。我轻吻了她。我问她，如果愿意跟着我的话，怕不怕背一辈子黑锅，遭一辈子磨难。她回答不怕。我很高兴。从此，在我与她合影于烈士青青墓冢前的像片的背后便题上了这样的诗句：

“红花岗的朝阳
是我们永远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红心，
红花岗的青松
是我们永远不老的革命青春。”

八月十二日，我十九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湖北话剧团礼堂看完钢琴伴唱《红灯记》回到宿舍不久，武汉警备司令部来人把我带走了。

已是深夜，我被押在军用敞篷吉普车上驶过长江大桥向江北去。寥廓的楚天，苍茫的大江，阑珊的灯火——多美啊！我虽然明白我已开始了祸福难卜的囚徒的日子，但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恐惧。我只担心着若是苏令仪又突然地来到了武汉又怎么办呢！她该多么伤心啊！

临时的武汉警备司令部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省委党校，那正是我少年时代度过的地方。兵士是穿蓝裤子的空军。自“七·二〇事件”后，刘丰的空军8199部队就接替了“叛军”8201部队的武汉警备任务。

关押在武汉警司期间，我意外地结识了“北、决、扬”的蔡万宝。作为文革中有影响的一个派别，1980年我还介绍过香港的骆竞才先生与他们见面交换意见。“北、决、扬”于1969年的9月为中共所取缔。

有幸的是，我在武汉警司拘押的时间并不长，不知是何原因，一个半月后，拘所长官通知我，要我自行回广州去投案。9月28日，我回到了广州。

六、带血的思考

回到了广州，便进入了“地下状态”。

我躲藏在女同学吴某家。苏令仪悄悄来看我，着急地要我马上离开广州，因为各工厂、机关、各大中学仍在“办班”，揪斗“坏头头”，白色恐怖并未过去。陈一阳已经被抓了。我同意即离开广州，但希望见一见曹哲武，全面了解一下广州的情况。苏、吴劝我“不要见他了，马上走吧！”我不同意，感到回来一趟都不能见一个自己的同志实在是对人太不信任。我坚持要见曹。

第二天下午，曹哲武如约来到烈士陵园后门的松林，他带来的十几位同派、不同派的同学把我围住了，面孔冰冷，劝我回校。我知道我被“醒悟”了的同学们“反戈一击”了。曹哲武的醒悟过程，我至今是个谜。

军训团让人把我押上四号楼二楼的一间小房。房门未关，一群人涌了进来乱拳乱脚的一顿打。然后，什么人操起桌上盛水的海碗猛地朝我头顶砸下，碗应声而碎，我只觉眼一黑，倒在了地上，又是一阵脚踏，血水染红了我的衬衫。看看差不多了，军训团兰干事对众人吆喝说：“出去，出去”。他把门关上时，我鲜血迷糊了的眼睛看见了他幸灾乐祸的眼睛。

第二天上午，我就被带出去批斗。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批斗：连续几小时的深度弯腰，胸前吊着沉重的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王希哲”（从此，“反革命”这三个字便与我结下了至今数十年不解之缘）。木牌牵着极细的铁丝，深深地勒在脖子的肉里。木牌的设计者非常精心地利用了“压强随受压面积无限缩小而无限增大”的物理学原理。

没多久，我的双脚便开始颤抖，腰和脖子就象要拆开、断裂。我提醒自己：“坚持住，坚持住，不能倒下去。”这时有人会一边骂我不老实，一边或是凶狠地按我的头，或是向下扯一扯木牌，让铁丝勒得更深一些，然后再用手掌作刀状在我的脖子上猛砍几下。

就在我真有点支持不住的时候，一名工宣队的人走了过来。他把勒进肉里的铁丝提起向后挂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下，痛苦立即减轻许多，这可真是大恩德。我不由得想，也许这工宣队与军训团还真有点不同呢！

傍晚，学校一片静悄悄的。门外忽然有人压低声音喊我：“希哲，希哲，我是陈光石。你被打成反革命已经定了案了，没得翻了。你放心，我养你一世的！”陈是井岗山公社“炮声”的成员，曾随我去过北京。他的美术字写得好，常以“炮声”的名义在外刷大标语。我问：“陈一阳呢？他已经放了吗？”因为我从房中遗下的一本残旧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上，看到“解剖自己，使自己适合革命的需要 陈一阳”这几个字。说明他也在这里关过。陈说：“你们井岗山的头头现在都是自己顾自己了。陈一阳也是被他们送去军训团的，现在在‘牛栏’。”我

知道“牛栏”是关教师牛鬼蛇神的地方。我又问：“楼下有人专门看守我吗？”他说：“没有。你多保重吧。”便走开了。

我决定逃跑。

因为明天就是国庆，直到深夜，学校的大喇叭都在反复广播二报一刊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它掩盖了我撬开窗口上钉死的木栅的声音。撬窗的栏杆是我踩断的桌底横木。我撕开被单，拧成一股，一头结死在窗口上，滑了下去，然后爬树，翻过墙，顺着一条估计此时不会有人的小巷，跑出了环市路。

我跑到了华侨新村珠影导演陶金的儿子陶令昌的家里。文革前，他也从十七中毕业。他和他家的保姆很同情我，但害怕，不敢收藏我。我求他们说，现在外面人还多，怕有人认出我呢！就先让我躲一晚，明天天不亮就走。他们也只好这样，并凑了十五元给我。

我把衬衣脱下，开着自来水搓了搓，晾在椅子背上，一些血迹仍洗不掉。保姆让我在一间杂物房里略躺了躺，便起身了。我顺着铁道向北走。国庆节的凌晨，交通要道到处是军人和工人纠察队设卡，盘查着行人。我不得不经常钻进铁道边的草丛里匍匐前行。过大北路那一关时，就象演了一出“渡江侦察记”。就这样连滚带爬到了花县，已是饥疲不堪，一咬牙爬上了去武汉的火车。车到郴州查票，我表示愿意补票，但他们显然对我身上的血迹和没带任何行李发生了怀疑。车长立即把我交给了执勤的解放军带下车。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次的被抓回，我不感到沮丧，因为在我离开广州前，苦苦地想我应跑到什么地方去时，就明白了我的抓回只是时间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落实到基层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本就不可能有逃亡者的立锥之地。

回来之后，又是斗，又是打。家常便饭，不必赘述。值得记的是一件奇事。

那时，上山下乡的方案已经决定：红旗派的同学，大多去边远的农村插社；而海南建设兵团，是部队建制，又是国防要地，基本上只能由东风派的“主义兵”去。

“主义兵”登船的那天清早，军训团得到情报，知道一些人决定饮醉酒后把我往死里打一顿，再扬长而去。兰干事怕出大事，令我卷起铺盖转移，把我藏到中心楼军训团会议室的内房。那内房原来推满了学校图书馆破四旧后幸存的藏书。我大喜过望，象老鼠掉进了米缸，立即翻捡了起来。突然，军训团外面的门被撞得一片山响，挟着气汹汹的吵嚷，我这才猛省自己的险境，于是坐以待变。原来，那群人在囚室找不见我，便挥舞皮带冲军训团来了。

军训团见来势凶猛，便几个人顶住门，兰干事并大声恐吓，僵持良久，冲门者才悻悻散去。我收拾了几本书裹进了棉胎。天亮了，我紧抱着棉胎回到了囚室。

以后，便安静了一段时间。除了少量的留校辅导员，老同学已全部上山下乡离校，新同学大量入校，百废待举，顾不上批斗我了。我读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更重要的是我认真地把毛选一至四卷通读了几遍，重要的章节我要求自己能背下来。我特别爱读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它使我懂得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源于对中国真实社会状况的调查了解和对各阶级各政治力量动向的准确估计。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深深影响了我直到现在。

周继能来看望我。他已分配到了广州的一间机器厂。他说他真不明白为什么工厂的工人都那么讲求经济报酬。过去，我们白天黑夜贴大字报、游行，什么时候想过钱？可现在，晚上一出去贴标语，就要领加班费。人家都领，我不领不行，也习惯了。这个社会很怪，工人阶级并不象我们在学校时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他又告诉我，“杨爱梅上吊自杀了”，“啊！”我大吃一惊，难过极了。亲爱的杨爱梅老师，她一直爱护我，培养我，就象自己的孩子。我家远，不常回家，她常把我带到她家吃饭。文革初期，她因支持我们被打成“狐狸帮”，似乎也没害怕过，怎么现在顶不住了呢？也许是受不了她的丈夫江帆（著名的“薄、陈、江”之一）也被打成了反革命黑手的残酷事实吧！那次我被抓回学校，经过“牛栏”，她深深地望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充满了母亲般的哀怜、痛苦、甚至绝望！真想不到，这一眼竟是对我的永诀！可是，杨老师，你走了，你留下的那几个孤儿可怎么办呢？

李小平（今天的理科虫草王公司总经理）也来看我。文革中，他以政治谐怪，伶牙俐齿著名。在善辩上，全校公认只有他能与我为敌。由于他父亲李吉瑞属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逼害致死，他是一直心怀怨恨的。他从海南回来。带来了叛逆的消息，他说，去海南的知青普遍感到受骗上当了。文化大革命，根本就被人捉弄了，被人当枪使了。

他告诉我，“九大”即将召开。但“二月逆流”和“反二月逆流翻案”，仍是党内一块心病。陈毅对毛主席说，他不参加九大了，他没资格，因为他是“右派”。毛主席说，“你就以右派身份参加好了！”

去年的由“反二月逆流翻案”引起的“坚持派性”及它造成的后果，仍在我的眼前，甚至仍背负在我的身上。政治上我朦胧地根据经验预见到了悲剧而果然发生了悲剧，这是第一次。并且我真的看到了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又一次若无其事，似乎“坚持派性”后来的一切混乱、武斗和流血都是红卫兵自己要犯的错误，与他们无关。在后来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我写道：“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就反映了我1968年以来对极其无耻和残忍的中央文革的憎恨情绪。

我仍然敬畏毛泽东，但我已十分的厌恶林彪和中央文革。我的感情已完全转到了陈毅等“右派”老干部一边。我问李小平对林彪的看法，他知道我的罪状中有所谓反林彪言论，笑我说，“现在人家说的比你凶多了：过去的皇帝是万岁，

亲王是九千岁；现在的毛主席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主席是差一岁，差一岁，差一岁！”他临走警告我说，“这些你可不许说出去，不然我就反咬死你。反正军训团信我不会信你的。”

为了争取早点离开这囚室，我决定向军训团写一个申诉。

我的申诉绝对不敢把责任归咎到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身上。我竭力想把自己说成是哲学探讨上的认识的错误：由于一九六八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和转舵，一九六八年春的反复等造成的困惑，我发起了井冈山公社理论学习和哲学探讨，在探讨中提出的一些命题，也并不都是错误的，有些，如“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是正确的，是为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彻底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阶段上的发展云云。我甚至还现买现卖地引用了几段刚刚偷回来看了不久的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的语录。

这个申诉虽然我认为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但感到还是温和的，讨好的，也许能说服对方的。

不料，我又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军训团、工宣队立即宣布要象粉碎赵紫阳的“猖狂反扑”一样，粉碎我的“猖狂反扑”（赵氏此时也向省革委写出了个检查），动员了全校师生大会来斗争我。这一次是用麻绳紧紧地捆绑了我，学生民兵持枪押我上台。主斗的是几位政治老师和留校辅导员。我想，不能退让了，既然下了挑战书，就不应该示弱。因此，不是象过去那样只是被动地挨斗和回答，而是积极地争辩和反诘。也许这就更激怒了他们。他们喊着口号，没有先例地一群人涌上了台，在坐得整整齐齐的成百上千的师生面前对我拳打脚踢，军训团、工宣队正襟危坐，欣赏着。马克东，我的老班长，在麦克风前讲了几句捍卫毛泽东思想，一转身便抬起军用大皮靴的脚朝我胸口踹来，我挣扎而起，刚要作声反驳他的发言，口一张，共产党培养的广州第一个中学生四清工作队队员郑南进瞅个正着，挥拳朝我的门牙打来，只听得“咔嚓”一声，天旋地转，满口咸腥，我本能地要用手去捂一捂伤口，但全身捆绑，动弹不得，只好愤怒地盯着他，朝他喷出一口血去，因为除了呜呜声之外，我已无法再发出清晰的语言了。

从此，我失去了两颗门牙。1974年秋，郭鸿志在补充《民主与法制》序言时写道：“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惊诧他怎么写得这样好，他告诉我，他指的就是我缺失的门牙和上述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提出了“团结、胜利”的路线，要求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讲政策，给出路。工宣队宣布了我的“解放”。

这时，上山下乡的高潮已经过去，知青大规模逃亡香港的浪潮已经开始，各地农民对知青的到来分薄了他们的已很微薄的工分啧有烦言，下乡插社，实际已经停顿了。学校要我“自寻出路”。这样，我离开了学校，从此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我和我的那一代人的蒙昧岁月。

七、广阔天地

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在一九六八年是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政策。连续三年的社会大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的破坏，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成为了城市中的剩余人口，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去，让他们操起最原始的劳动工具自谋生计，在他看来便成了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

学生知识青年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利益，与工人不同。文革中他们狂热的激情，其动力，完全来自于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因此，这种理想主义一落到了贫困农村那冰冷的，严酷的现实主义土地上，一旦他们必须用每天十几小时的原始劳动，来挣得仅值一、二角钱的工分，用以购买维持生活所最必须的牙膏和草纸的时候（甚至还可能超支或负债），一切理想主义都烟消云散！当年的热情立即转化为懊悔；当年引以为傲的革命史立即转化为羞与人说的上当受骗史；当年对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崇拜立即转化为压抑心中蓄时待发的反感和憎恨。如果说，直到一九七八年，上山下乡政策仍被视为必须坚持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话，那么全国数千万的知识青年早就成为了这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敌人，并且最终正是由他们给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致命的一击，把他们从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掀翻。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日，就是证明。

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山下乡到英德茶场的。

离校以后，为了找到能够接纳我的地方，我辗转先后跑了番禺、鹤山、惠阳等地，初步对农村问题作了一些考察。那时，我和我的一群同学们仍然是毛泽东主义者，我们相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取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首先是，对于愈趋严重的农民和知青偷渡，其性质是否属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一部分同学与陈一阳发生了辩论；然后，是普遍蔓延的包工分配与大寨式劳动分配孰是孰非的问题，更加激烈地在同学们中展开了辩论。有些同学（翟某）甚至向所在县委写信，宣布自己是“铁杆大寨派”而获得了县委的支持和赞赏。但对于这些，我总觉得自己发言权甚少。一次，陈一阳在向江西回来介绍情况的知青谈话中，这样说：“王希哲的学习方法是‘纲举目张’，我的学习方法是‘实事求是’。”我虽觉不妥，也无法反驳。

我的父亲写信给我，要我到英德茶场去。那时他也刚刚“解放”。他是前一年随珠影受审查的干部（“牛鬼蛇神”）下放到英德横石塘的“省文艺五七干校”的。我知道他为我受了苦，我母亲告诉我，为了我的事，十七中的人把他拉出去戴着高帽游街。就在那次我被打掉牙的批斗（武斗）大会上，工宣队曾向大会高高出示一枚冲有国民党徽记的铜纽扣，义愤填膺地宣布说：“这是从王希哲家里搜出来的，是王希哲家妄图变天的铁证！”我便知道我的家也被抄了，我把父母也连累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高级技术知识分子，四十年代初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电影专业。他属于中国第一代的左翼电影工作者。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在武汉参加了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著名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史东山、应云卫、

郑君里、赵丹、王为一、黎莉莉、王人美、陶金、金山等人共同参与了中共秘密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这个左翼电影运动，为中国的电影发展史留下了十分重要、十分灿烂的一笔，同时也为中共自己的电影事业准备了干部。当然，我的父亲没有上述明星们那么灿烂。他是搞技术的。在共产党人阳翰笙、罗静予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创办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的昆仑电影公司的整个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个被称为：“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才使得名著一时，并流传后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得以产生。

我只好到了英德茶场，但我不愿意到父亲干校所在的一分场去，而是去了远远的三分场。我天生的独立个性不愿在父母身边受太多的拘束。父亲借了自行车跋山涉水来到三分场看我。他见我带来了许多的书，便劝我不要在别的知青面前摆架子；要我最好不要穿呢子衣服，尽量朴素一些，这样容易和一般知青更融洽。他的话，被隔壁有心注意的知青指导员、五·七干部周鉴春听到了，很欣赏我父亲对我的教育。他放手地让我和孟宪宝抓知青连队的工作。

与我同来英德的还有22中东方红的孟宪宝、何志东以及几位中专毕业的女同学钱忆之、潘晓东、何燕薇等。孟宪宝便是我前面提到过的68年5月22中武斗的“祸首”。是他首先下了警司巡逻战士的枪，才引来了解放军和大批工人纠察队对22中和8中的包围和清剿。

我和孟宪宝等被分配到了七连，何志东被分到八连（后又转到七连）。

英德茶场原来是劳改农场。放眼望去，层层茶山，雾皱青黛，真有如一幅幅名家的山水。细看，各山头 and 要道却都筑有颇煞风景的了望哨楼。

八连的驻地是一座高楼铁网封闭的大院，显然，那原来是看押重犯的地方。七连驻地，则是一座开放的大统仓和几排平房，掩映在美丽的竹林中，清冽深幽的美村河水把它围成一个半岛，淌过一座二十来米长的竹扎的小桥，然后远远地流向一个叫做水濂洞的巨大溶洞，消失无踪，只留下轰轰的水声和洞口的一片桃花。

我们立即操起剪子跟随五·七干部上山剪老茶。所谓“剪老茶”就有如园林工人把那观赏的灌木修剪平。但我们是漫山遍野地剪，然后把茶梢收集起来，送到茶厂制成茶砖。据介绍，蒙族和藏族的牧民们都是离不开这些茶砖的。我们还担粪种菜；围圈养猪；最显消闲和浪漫的，自然是上山放牛——骑在牛背上顺着山道悠悠地走，可惜不会吹笛，但却能够唱歌。华侨补校来的知青黄建庭便热衷此道，号称“唐·吉诃德”。但他唱的却是：“杨子荣，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

由于我和孟宪宝的“资历”、组织能力和劳动的卖力，很快便成了七连知青实际的头头。但随着五·七干部的撒走和原劳改干部接替管理知青连队，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五·七干部更看重知青的能力和表现的话，劳改干部则更注重档案。因此，当营里正式任命知青班、排干部（连级干部一般由原劳改干部担任）时，我和小孟便名落孙山了。

对此，我无所谓。小孟却大不高兴，牢骚满腹。他的情绪影响了连队，甚至使受到了任命的班、排长也感到不好处。教导员方生为稳定七连，便任命我和孟宪宝为排的“政治宣传员”，含含糊糊地解释道，这个政治宣传员，相当于在排一级设了政治指导员。这么说来，我们便是排的指导员了。但名不正，言不顺，因人设事，倒使得知青连的内部关系更形混乱。何况，工资待遇上，排级知青干部月入29元，属“高薪阶层”，转正普通知青月薪26元，这三元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含糊的。

小孟不知从哪里弄到情报，说是副连长梁柏荣与他过不去。他便处处与梁作对，甚至“五·一”放假那天，组织了一次二十多人（都是七连的知青骨干）上分场告状。军代表崔政委接待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我对孟宪宝的这一套很不满意，但他听不进我的意见，反而要求我与他采取配合的行动。

我感到不能在这个无聊的漩涡里陷进去。我自命自己还担负着未来更重大的历史责任。英德的知青七连这点茶杯的风波算得了什么，值得我陷进去？

陈一阳来信告诉我，省革委以青年干部下放锻炼为名，把武传斌安排到了他附近的紫金碱厂工作。他本人在紫金古竹插社。六八年一别，久违了。我正想知道一下文革的“英雄人物”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便决定去趟那里看看。

我回广州，又去了紫金。

我和陈一阳、翟树言、苏江（即苏令仪）找到了武传斌。他管我们在大伙房吃了顿饭，便在一间破茅草房边的草地上蹲下，谈了起来。我本希望听听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及我们可能起的作用。他似乎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些，只是颇正统地说：“今后就看谁能和工农结合得更好了。”他说是刘兴元安排他下来这里锻炼的。这间碱厂边设计，边基建，边生产，已经创出了一条新路子。他说省革委要求学习陈郁。陈郁这样大年纪了，还能把茂名石油公司的工作抓得很出色，受到主席的表彰。

我问他67年8月那次，白云机场究竟有没有发生过绑架中央文革首长的事。他说，金敬迈是来了广州，他老婆的车突然不见了。部队红联紧张起来，通知了红司，司令部也紧张了，估计也可能发生“七·二〇”事件，马上要求下面作好营救的准备。这才发生了各校紧急出动，我校遭伏击伤亡十几人的惨案。呜呼，哀哉！

七连“告状事件”已经闹大了。它恰好撞到了“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的枪口上，分场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一起坏人在七连发起的向党夺权的政治事件。而且他们认为，这起事件的操纵者实际是王希哲，而孟宪宝等人不过是当枪使了。分场武装部曲部长带领的工作组已经进驻连队等我多时了。

共产党工作队的公式，无非总是“团结、争取、打击”这三部曲。但这次曲部长除了争取到了一部分乐昌来的知青外，大部分的广州知青却并不怎么理睬他们。一次，一群知青跟我和小孟去爬山游玩，刚过竹桥，曲部长便从后面踩着脚跳出来大喊：“要革命的回来！回来！”那意思是，跟着王、孟走，便是不革命的了。但除了一阵嘻笑，没有一人回去。

工作组只好使出了二个杀手锏，一是办我和小孟的“学习班”，把我们和七连知青隔离开来；二是举办“罪证展览”，促使“革命群众”觉醒。

我是太冤枉了。孟宪宝开始生事的时候，为了避嫌，我搬出了知青大宿舍，住进了菜班班长黄建庭的一间座落于半岛顶端竹林深处的茅草房。那本是菜班工具房，我是“排指导员”，似乎算他的上级，当然有这个特权，他也很欢迎我。

黄建庭是印尼泗水华侨，有很开朗的、乐于助人的性格。他告诉我，他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经常洋洋得意地对亲戚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自己留着，一个送给毛泽东。”六十年代真的把他送回来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才知道，“原来送回一条狗崽子！”

我把茅草房打扫干净，辟了一间书房，上首挂了很著名的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左右用毛笔批道：“世界是你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话，好象就是去安源的这位背着伞的主人公说的。

孟宪宝见我这里挺好，便常常聚一班喜欢吃喝的广州知青到此开小灶。那时知青生活极苦，每餐不过二分钱的青菜。小孟出身干部子弟，有家庭接济，因此，他和几位富裕知青的罐头以及美村集市上买回来的羊肉，那喷喷的香味确是吸引人的，有时，还会有一只来历不明的狗。

我自视清高，极少介入他们的聚餐，只是一些较有文化素质的知青与我相得。如谢良、梁海强等。此外，由于略孚清名，一些其他连队的知青甚至女知青也常来探望，女知青们流连四顾，颇有情态。奈何我心中已自有苏江，虽天各一方，然波澜不兴，洁身自持，有幸没有发生任何桃色逸闻。不然，揪斗之时，便有口难辩矣！

工作组封了茅草房，从各处的垃圾堆里捡来大批的酒瓶、铁罐、破勺、烂碟，又搬来板凳桌椅，故作零乱地在茅草房里布置停当，再将那些杂物狼籍置于其上，拍好照片，登在英德茶场报上，便是红卫分场七连王希哲、孟宪宝腐蚀知青聚众吃喝开黑会的据点，而“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二句画像上的批语更成了王希哲有反动野心，对毛主席大不敬的铁证。然后，开放参观，各知青连列队来到七连半岛茅草房前，鱼贯而入，瞻视一番，旬日方休。

学习班里，对我的批斗也同时开始。除了“煽动告状”、茅草房黑窝等罪之外，果然，重头戏仍然是抛档案。仍然是文革中“攻击毛泽东思想”、“怀疑和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的那些罪行。刘营长声色疾厉：“什么一分为二，这是混蛋哲学！”

这一次的批斗，我已完全不作争辩。我已觉得，在整个中国处于僵死的、极左的、形而上学的统治下时，与基层的干部辩论哲学，真不异对牛弹琴。

我已厌恶了茶场。这时我想用与苏江结婚的办法离开茶场。七一年一月，我未经批准回到了广州，打算去惠阳与苏江商量此事。这种行动在茶场干部的惯用劳改术语中叫做“逃跑”。在七连对“逃跑”抓回的知青，尤其是逃去偷渡抓回的知青，被指导员邓松生批斗后绑吊在篮球架上的，已是屡见不鲜。其实邓本人倒是一位很能带头苦干的共产党的好干部。20余年后，1993年的“国庆”期间，在广州当年七连知青的聚会上，这位老邓诚恳地向曾被执行“极左”伤害过的知青道歉，赢得了阵阵的掌声和欢呼，这是后话。

我把毛泽东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和其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材料”塞进了背囊，打算在惠阳住多一些时间。我乘船到了惠州，然后再转上了去淡水的车。

车到新圩。我知道这里是一个很厉害的检查站，是偷渡知青的“鬼门关”。一九七〇年我第一次到惠阳，居然被我从新圩混了过去。那次我一到新圩便下车，步行朝龙岗的方向走，再由一条小路向东折进秋长。但到了秋长，仍未能逃脱民兵的天罗地网。只是后来苏江找到了公社的干部作保，证明我来秋长的目的不是偷渡，这才放了我，让我在秋长住了三天。这次又到新圩了，我手里抓了一张涂改过的假证明，心存侥幸，不想下车走那一段很远的路。但是我失算了，检查人员上来甚至不屑详看我的证明，便把我赶下了车。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两男一女，都是知青模样。我怀疑就因为这模样，在他们看来，就是偷渡知青的嫌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一下车都争辩说自己的证明是真的，但检查人员仍然不由分说给我们串连着戴上了手铐。第二天，我们四人从新圩押到了惠州，然后又从惠州押到了樟木头。到惠州收容站时，苏江得讯来看我，但这一次她的公社已是鞭长莫及了。

看得出来，樟木头收容站是一间按现代文明方式建造的新式监押站，与淡水、惠州的不同，那里的拘所我怀疑是大清朝留下来的，粗笨的木闸栅里黑暗狭小，肮脏潮湿，马桶就紧靠在犯人的身边。樟木头则是数座宽大的白灰刷墙的平房，囚仓也较宽敞、清洁，厕所在远远的屋角。别人告诉我，樟木头的收容站，原来是宝安、东莞、惠阳所有偷渡知青的集散中转站。这确是新盖的，以吸纳愈趋庞大的知青偷渡潮。

每天上午，必须背诵了“老三篇”才能开饭。我们还要学习，根据自己的出身成分，深挖自己是怎样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才走上了偷渡犯罪的道路，并表示悔过。

我们还要去看图片展览，看清楚香港是怎样的一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那里有抢劫，有强奸，有暗杀，有富人对穷人的欺凌和打骂，而大陆社会主义天堂却没有这些。香港金钱至上，六亲不认，而社会主义则处处充满阶级的友爱……

仓里是不准吸烟的，但知青们有办法。他们不知从哪里捡来了烟头，将烟丝

取出，用草纸卷上，然后，从破棉袄或棉被里掏出一小团棉花，夹在两块木板中间使劲地搓，搓，一会儿棉花便冒烟了，就赶紧用手捏着棉条的两头不停地甩，甩，火就冒了出来，立即把叼在嘴里的烟点上。我惊奇地看着，目瞪口呆。这就是人类几百万年前“钻木取火”法吧？

他们相信我不是来偷渡的。我书包里的书可以证明。若是偷渡，书包里不应是这些，而应该是香肠、饼干、橡胶圈之类。当然，他们的这些东西，是早已没收了的。

他们认为我可能是知青的上层，“贵族知青”，这些都是能爬、能升，或是有其他的背景，其他的门路的。而他们则是知青的下层，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除了偷渡，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他们说，他们到了香港，也还是为人打工，作人奴隶，要在艰难的谋生中挣扎，但总有个盼头，总能有个出路。虽然他们自己已不可能再回广州，但他们总希望有一天能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回到大陆，与亲友一起，打着“的”，坐到南园酒家、北园酒家的“港澳同胞厅”里去，而留在大陆，做生做死，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不可能的。

他们教我下层知青的语言：香港叫“K城”；广州叫“大圈”；逃亡叫“较脚”；偷渡叫“督卒”，（这很形象，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正好隔一条“汉界楚河”）等等，这些下层知青的语汇后来竟成了粤语通用的语言。可见，在商业社会里，语言是下层侵蚀上层的。

我还很爱听他们唱的那些下层知青的歌谣，记得有一首是：

“爷爷（指毛主席）逼我下乡做农民，
今世作人真是够悲惨，
揸‘7’（锄头）确是无前途。
我唯独有，唯独有，流窜当‘兵棍’（扒手），
‘兵棍’四处求住食，
怎知街伯漏夜捉人……”

后面，便是说怎样冒着鲨鱼吞噬的危险游水到了“K城”。我听到这些歌，油然感到莫名的凄楚和悲凉，就象听到了拉兹的《流浪者之歌》。我问，你们苦，那里农民也苦，农民怎么办呢？他们说，青年农民哪个不想跑呢？倒是地富子弟不敢跑，因为一旦抓回来，就没命了。这是事实，我想起了苏江对我说过的，她们那里，若是哪一家没有跑去香港的人寄钱回来，就会被人看不起，头都抬不起来。

我天真地问“可不可以象大寨那样，大家齐心把生产搞好了，生活好了，就不用逃港了吗？”他们笑了，说：“这里的干部哪有那个水平，都是各顾各，好处自己拿，怎么学大寨？越学越衰。”

我无言了。我想起这两年来，我们各地的同学们围绕着的农村大寨式分工、

分配、包工、“六十条”所进行的辩论，而陈一阳反对大寨式分配，主张坚决落实农村政策“六十条”的意见越来越占上风，恐怕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樟木头收容所那二十几天里，我天天读着毛主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天天在思索着为什么这个社会主义那么难以战胜资本主义，为什么劳动的农民、工人们偏偏不愿意留在“天堂”而要冒死奔向“地狱”。民兵能够截住几个知青，又怎么能够截得住自发的潮流？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那么，在政策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茶场派人来樟木头把我接了回去。经过广州，苏江闻讯赶到车站来送我。这样的分别我们似乎已经历多次了。她目送我上车，默默地站着，显得很沉着，没有女儿家此时常有的哭态。接我的赖连长颇惊奇，在车上对我说：“你的这个老婆不简单，看她那个样子，你就是判刑二十年，她也会跟你的！”我心想，也许吧！

我作好了处理升级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次离队，我不仅是“逃跑”，而且难以洗脱偷渡的嫌疑，也许，场部已经把我当作偷渡来定案了。

英德大桥已经建好，过江不必再摆渡了。沿途风光依旧，仍是层层远去的茶山，茶行里，蠕动着头戴竹笠，身裹雨衣，肩挎茶篓的男女知青。我似乎能感觉到他（她）们雨衣里湿透了的一身汗水或一身雨水；能感觉到他们背带的沉重，手指的红肿，双腿的炎痛，能感觉到他们的疲乏、迷惘和对亲人的思念，对爱情的渴望。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

八、压迫中的升华

这倒出乎意外，回到连队，一切如常，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有点捉摸不透。志强、谢良、梁海强等告诉我，为七连的“一打三反”复查定案，总场派出了以政治处主任叶国忠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了七连。老叶看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下来调查没有带什么框框。他找了连里不少知青谈话，大家见他诚恳，也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们都反映了“告状案”与“茅草房案”与事实的出入，老叶一直没有表态。看来，他是想逐渐淡化这些事情。

没两天，老叶找我作了一次长谈。果然，他只是向我提到我父亲给连部来了一封信，对我来茶场半年后又出了这样的事感到痛心，要求领导对我严加教育。没有再多提过去的事情。

我注意到，他似乎对我出走前给分场牟主任的信中谈到的理论问题感兴趣。

那时，远离英德茶场的北京，一场严重的斗争正在蕴酿着。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林彪、陈伯达和林手下的大将们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都摔了跟斗。（当然，在这哲学的喧嚣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变动）。毛泽东对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所谓“上当受骗”极为震怒。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识别“政治骗子”。报纸正在连篇累牍地宣传着。

我对老叶说，我的看法已在给牟主任的信里谈过了，我坚持认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命题是正确的。刘营长、马副教导员把它骂成“混蛋哲学”是不对的，是他们没有认真读书学习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杨成武（我只能这样说）别有用心地鼓吹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就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了，其实，毛主席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老叶说，其实牟主任本人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他又问我，赵紫阳同志从内蒙回广东了，他说他欠了广东人民的债，这次回来是向广东人民请罪来的。叶要我谈谈对赵紫阳回广东的看法。我说，赵紫阳过去在抓广东农业上是有成就的，他1968年的那个检查，大多也都是农业问题，其实许多是没有错的。这次他回来，省委又已经大张旗鼓地号召学大寨了，树了罗定、佛冈、东莞几个典型，但我觉得，结合广东的实际，强调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六十条”还不够。我接受了陈一阳的立场。我的意思是，担心赵紫阳经过文革的批判，变得宁“左”勿右了。

叶国忠会意地点点头。两个来钟头的谈话结束，他官式地鼓励我放下包袱，也投身到茶场的学大寨中去。

茶场的学大寨比较简单，不牵涉任何复杂的分配机制。只是不断地“大会战”而已——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挖沟，深翻，积肥，开辟新梯田，增加新茶园。天不亮就起，夜深打着火把干，知青干部极度的疲劳。指导员老邓说：“这算什么，1958年我们还经常几个通宵连轴干呢！”

花白头发，中等身材的叶国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我多年来遇到的共产党的干部中少有的实事求是，平易近人，不以势压人的干部。七年后，我因支持和介入了“中国之春”民运，被判处十四年徒刑，押送怀集监狱。甫到，便听说有一位叶政委已调到省劳改局负责少年犯的改造工作了，他在狱中留下了甚佳的口碑。这位叶政委，便是叶国忠。

见不到叶政委，我颇为遗憾，但是即使叶国忠没有调走，他还能够对我表现出任何实事求是的态度吗？要知道，这一次不同于小小的英德茶场，它是共产党的整个制度动员了它的全部力量来对我实行压迫。它不会允许它的任何一个齿轮发出相反的运转的。哪怕叶国忠个人仍保持着多么正直的品格，也是无补于事的。适足以使他为难。所以，老叶调走了也好，起码可以在我的心中多保留一个共产党的好干部的形象，使我保存多几年共产党的“包青天”的幻想！

五月上旬，苏江来茶场探望我，前后五天。这真是愉快的五天。我带她遍访了英德茶场的名胜之地。我们探水濂洞，登观音岩，上桃花山，下翠竹林，泛舟清清北江，远眺莽莽马口。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真个是“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我又携她去横石塘干校面见了我的父亲，得到了他的认可。

乐极之后，也有小小的烦恼。我们无法作出马上结婚的决定。那时有一种普遍的说法：结婚之后，便只有“扎根”，难以回城了。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天安门的群众游行被取消了。电台只是反复地播送着西哈努克的歌曲《怀念中国》。我没有在意，以为不过是“节约闹革命”举措罢了。但随着国内外谣言的越来越多，内幕也就渐次清楚，原来，那位“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在党内的夺权斗争中失败，胁持飞机逃亡，已葬身外蒙荒漠了。

这个事件对中国人民心理的冲击，用天坍，用地陷来形容也是只能道其万一的。从此，神圣的共产党消失了，神圣的毛主席也消失了，人民看到了“路线斗争”帷幕后面的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政治仇杀。他们开始厌恶和远离官方的政治和道德说教，他们感到最应该关心的还是自己。以此发轫，形成了日趋泛滥的利己主义、保守主义潮流，社会从此走向自私，走向腐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雄心勃勃，试欲挽澜回天，亦已乏术了。

但是，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被打碎，也正是林彪事件历史进步意义的所在。中共的正史至今视林彪为“反革命野心家”，理由是他企图向毛泽东夺权。但我们想一想，中共领袖之一的林彪为什么不可以向另外一位领袖毛泽东夺权呢？毛泽东自己权力的来源，不正是向博古、张国焘、王明等人夺过来的么？毛泽东枪指挥党，以“挽救了红军”的军事领袖资格一手破坏了中共从一大到六大最高领导权民主过渡的制度（也是相对的，因还须经莫斯科批准。可见中共“里通外国”，“挟洋自重”，有例在先），用封建帝王权术去对付党内的同志，那末又怎么怨得他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投其所好，用阴谋的手段来对付他呢！

我们今天已不会再相信林彪一类人物上台，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根本改变共产党的制度的这些说法了。但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什么人掌握了它的最高领导权，确实能够决定这个政权会对人民更专横、更法西斯化一些呢，还是会比较地开明，比较地温和，比较地开放一些呢！

我一直盼望着林彪的垮台。我和陈一阳都相信，文革以后，中国社会的许多基本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更尖锐、更加不可调和了。如工农业政策的问题，参加过文革的群众受压的问题，大量血案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新贵”与老干部、一般干部的矛盾问题等等。总之，我们认为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浪潮还会到来。只是，我们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快地到来，林彪垮台使我们感到有些突然，感到理论准备仍然不够。

正当我仍处在林彪垮台带来的极度兴奋中时，茶场领导却向我发难了。

原来刘兴元、丁盛领导的广州军区难以适应林彪突然垮台给他们造成的惶恐不安，他们和他们派驻各基层的军代表定下的调子都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仍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黄永胜在广东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因此，11月4日，分场传达中央七个文件时，教导员方生便按上述口径作了强调。

这之后，车进（车学藻的儿子，九连知青）和三赖子（怀德，原珠海中和公司总经理，6·4后因营救吾尔开希去国）告诉我，总场领导陈忠玉在一营讲话，调子同情黄永胜。

这一切信息使我感到，林彪垮台后的局面，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在几次知青的学习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谈了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看法。

果然，11月13日志强对我说，方生在一次营的干部会议上点了我的名，说：“过去对王希哲，批一分为二是错的，但王希哲有野心，要翻案，说他过去把矛头指向林彪是对的。其实林彪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1月19日，方生又一次在营的宣传干部会议上说：“王希哲坚持要翻案，他还讲了个真假马列主义和真假猴王的故事，这其实是有意攻击党中央”。

前文说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要求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以免上所谓“政治骗子”的当。我却认为，以中共建党数十年，拥有大量理论研究专门家的现状来看，说他们都因不能识别假马列主义而上当，是说不过去的。根本是个勇气和反潮流精神问题。因此我讲了个故事，我说——

孙悟空有“马列水平”，它能识破妖怪的本来面目，而且他还有胆量指出来，不管唐僧怎么向他念紧箍咒，压迫他，他都敢拼命将妖怪打死。但后来遇到这么个事，有个妖怪也扮作孙悟空，闹了场“真假猴王”，打得难解难分，到地府去了。地府阎王有一头兽“马列主义水平”也很高，他一眼就看出谁是真，谁是假，却胆怯，不敢讲出来，因为这个假猴王很厉害，本事很大，讲出来身家性命难保，

只好装聋作哑，推给“上级领导”。结果，两个猴王又闹到西天佛祖那里才解决了。

在那天的日记上，记完上述故事后，我又写道：“不但要提高马列水平，还要提倡为坚持真理奋不顾身的精神，有了马列水平，又有了这种精神，才是反修防修最可靠的保障”。

不料，收到陈一阳来信，他反对我关于“林彪从来就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提法，认为如果今天我们还停留在当年那样，把一部分人先天地划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部分则“从来也不是”，那就太形而上学了。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林的一套为什么过去得到毛主席的欣赏，后来又是怎样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冲突的。

陈一阳的信说得很好，它启发了我，我冷静下来，重新开始仔细地考察林彪现象。终于一个月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清晰的思路：

所谓200多个中央委员跟着跑的“庐山大笑话”，所谓全党都受了“政治骗子”的欺骗，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勇气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民主问题。

本来，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它的内部关系与任何一个基层党委一样，主席、书记与委员都应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这在毛主席的《党委会工作方法》和《七千人大会讲话》都是阐述得很清楚的。但林彪为了取缔党的民主，却故意把毛主席绝对化，把他抬到凌驾全党之上的帝王的地位，提出了一个混淆两类矛盾的法西斯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样，无产阶级民主的党内关系就被封建化了。由此延伸，那么，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就统统要打倒了。从此，党内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也就不能讲话，也没有地方可以讲话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今后不再上当受骗，遭到法西斯式的蹂躏，就应该提倡恢复党内民主和广泛的人民民主。而要恢复民主，首先就必须批判摧毁他们的用以支撑自己的政治特权的那个“神圣原则”——“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这也就形成了我后来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的思想雏形。

我把这个新获得的思想写给陈一阳，他大为高兴，恰逢《南方日报》发表一篇“省电台写作组”的文章“增强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他立即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文章，发挥了我关于林彪事件的教训，主要应是民主问题而不仅是干部理论水平问题的观点。

我读了陈寄来的文章，感到说理仍不够，而且仍不敢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原则摆出来批判，这就难以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联系起来。而毛泽东说过，我们的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必须能够解释革命实际中的问题：“你把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解释得越广泛，越深刻，你的理论就越好”。

我考虑应该是动笔的时候了，而且，正好就《南方日报》的文章借题发挥。

文章完成了，题目叫《就南方日报 12·18 文章谈谈我对批林斗争的一些意见》。搁笔的时候，正是 1971 年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我划时代的文章，开始了渴望已久的我的战斗。我这一炮，是瞄准了统治中国社会思想达五年之久的林彪专制主义权威原则轰出去的，当然我是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希望它能对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有所贡献，希望它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所贡献。总之，我希望它能成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

第二天，1972 年元旦，我把文章给《红旗》杂志寄出。复写数份，给《南方日报》及陈一阳等诸朋友寄出。

果然，陈一阳读到这篇文章兴奋极了，他热情洋溢地为这篇东西写了个序言，顺着我的思路，把我们的这次思想突破，比之为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保守体系中彷徨摸索多年之后的那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他说，“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突破的标志就是宣布了自然界的唯物主义，就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那么，‘青年毛泽东派’的突破，就是摒弃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宣布从此不再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

陈一阳在他的序言里大段地模仿着恩格斯对这次历史事件的回忆和评价，恩格斯说：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边，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陈一阳要求立即把这篇东西连同序言翻印出来，分寄各朋友和知青小团体。

我不同意陈一阳关于“青年毛泽东派”的提法。我认为提“青年林彪派”为更准确一些。我的理由是，文革以来青年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开始大家都狂热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的，神圣的，因此大家都是林彪派，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本身就不是毛泽东思想，逐渐一部分青年在学习和革命实践中对此发生了怀疑，开始了独立的探索，这便形成了青年林彪派。最后像青年黑格尔派突破了黑格尔体系一样，“青年林彪派”也突破了林彪体系，掌握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毛泽东派。

从此，“林彪体系”便成了我们文章中的一个独创的概念，在后来的全部李一哲大字报中，对“林彪体系”的批判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是，《红旗》杂志没有任何回音。

4月18日，我再给《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没有广泛的民主，我们的政权会不稳》。6月14日，《人民日报》将此文原稿退回。

多么悲哀啊！我渴望战斗，却没有战场，我发出了战书，我的敌人却对我不屑一顾。我要大声呐喊，却没有媒体传达我的声音。

当然我明白，“舆论一律”的党报不会发表任何叛逆的声音的，但打破这一律的舆论，争取广泛的人民民主不正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么？我应该跳出这山沟，回到广州去，回到那个我可以积极地发挥我的影响的地方去。

也算是皇天有眼，政府此时有了个政策，知青中独生子女可以申请回城。俞连长知道我是独子，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他是一位新来的北方籍副连长，与我关系不错。此时他头上还缠着绷带，那是前不久七连知青与农民的一场武斗中负伤的。

女知青在野外的茶园甚至驻地不时都会受到农民的性骚扰，这类事件很容易激起潜意识中自认负有翼护女知青责任的男知青的英雄主义。

一天女知青黄某在驻地井台边洗衣，隔美村河的一无良农民竟对着她脱光衣裤拨弄其雄勃之阳器。此女失声大叫“流氓”，奔回宿舍。男知青闻讯蜂出，游过河去将此农民痛殴，“战争”由此启衅。二小时许，美村大路上，成群结队的农民手持棍棒、锄头，气势汹汹朝七连驻地杀来。七连知青见今次来势凶猛，不免有些慌乱。那时，孟宪宝已因咎调去四营，七连经历过文革武斗的只有我和何志东等数人。我考虑七连虽三面环水，无四战之忧，但仓促中已无法筑路障拒农民于营外，只得令知青迅速全数收缩进大统仓，封住大门，备砖石抵抗，以待分场警察到来。

农民将统仓团团围住，果以砖石进攻。一时间呐喊声大作，矢石横飞，统仓门窗墙壁被砸得乒乓乱响，四周菜地亦糟蹋得一片狼籍。

俞连长劝阻农民之时，不幸为“流弹”所中，满头是血，我即率人冲出，将其救回包扎。相持良久，分场军代表带警察赶到，鸣枪喝退农民，事态始告平息。

其实独生子女可以回城消息早有流传，我向俞连长了解真切并询问程序后，便即按程序写出请调报告，寄正在广州的翟树言，托其为我呈设于烈士陵园东平路的郊区革委会，然后静待消息。

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一九七三年的元旦，我与八连的王前进一起，获准回到了广州。

十、邂逅李正天与结识郭鸿志

1973年6月20日，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夜，从苏家归，遇李正天。多年不遇了，约明日下午来。”

我是1967年3月认识李正天的。那正是所谓“三月黑风”的时候。由于“珠影东方红”成分比较复杂，又积极参与了“1·25”冲公安局和“2·8”冲击广州军区行动，广州一军管，军方立即拿它开刀，宣布其非法。取缔了“珠影东方红”。那时，每天军管宣传车满街转，高音喇叭不停地宣布着“珠影东方红”和其他被取缔的组织“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站”、“红农友”、“中大工人赤卫队”及其被捕的头头的罪状。一片恐怖。

一天，我去中大看大字报，发现中山铜像旁的大字报棚围着一堆人。我凑上前去，只见一个穿绿军装，戴绿军帽，着黑色深统皮鞋的小个子，横眉怒目，硬硬地伸着指头与另几个人辩论着。围住他的人，也对他指指戳戳，闹闹嚷嚷。他们在嚷些什么，我听不大清，只听得小个子在喊：“你胡说！‘珠影东方红’是‘非法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把非法组织说成是反革命组织！”

我不禁一震——在那般高压肃杀的气氛下，直接面对着围攻，却能正义凛然，在这“非法”还是“反革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上为“珠影东方红”作绝望的辩护，真是一条汉子。他是谁？旁边有人告诉我说，“李正天，绰号大皮鞋，美院的。”

但我实在已经记不得我又是怎样结识李正天的了，只记得我曾邀他来十七中参加过一次座谈，由此，他也认识了陈一阳。

他是美院学生，但在美院内他似乎并不是造反派，而是保胡一川的。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便不以美院为基地活动，而是与徐文敏、邱克夫等人，再围绕一批中学生搞了个“红司呐喊”。大字报也很引人注目，1967年8月武斗前夕，写了《大战临头，前途何在？》后来最著名的，便是批佛山会议“改良主义”的《十大分歧》了。李正天本人又常以“美院延安”、“美院11·26”的名义刷出一些同样性质的大标语来。他把大标语的字及落款写得十分美工化，因此显得独树一帜，在大街上十分抢眼。

后来，他又找到郭鸿志、胡大钧等一些省直机关的干部在省科委二楼27号房搞了个“2·27串联会”。这个串联会并没有太突出的社会表现。据李正天说，他们只着重内部的理论学习和探讨，这也为他后来的介入李一哲，准备了条件。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和陈一阳亡命武汉，听说李正天也到了武汉，与《扬子江评论》搞在一起。“扬评”是反周恩来的，莫非李正天也公然反周了么？我便没有去找他。如此一晃便五年了。

他来到了我家。我父亲恰好正准备上班，一见他，便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来的是什么人？”

我答“朋友”。

“朋友？叫大皮鞋吧？你怎么才回来几天又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他有些不愉快。

我真没想到父亲也会认识他。那也难怪，文革中，珠影作为那么一个矛盾的焦点，自然少不了李正天的出没。我只好与李正天改期。

几天后的傍晚，我约他在赤岗的14路车汽车站见面。车站隔石榴岗公路是一片荒草地，倒卧着几条水泥电线杆柱子。这地方现在是海军127医院。我们坐在柱子上。

“这几年你怎么过来的，小李？”我问他。他年龄比我大，但个子小，故我称他小李。

他说，他从武汉被押回来后，便关进了西村监狱。由军方的专案组审查。重点是企图要他招认与军区湘伟、江民风的关系。他们认定“呐喊”在文革中的反黄是湘、江的指使，目的是搞垮黄永胜进而搞垮林彪。李正天拒绝承认，于是便招来了连番的殴打和逼供。我问：“你在西村见到武传斌了吗？”我听说那时武也关在西村。他说没见到武传斌，但知道赵紫阳也关在西村，狱警常常向他谈起赵紫阳的一些消息。

“你什么时候才放出来的？”我又问。他说，他的案子一直拖到“九·一三”后，才不了了之，把他放回学校，继续审查，一直到现在。

我问他对于“九·一三”后，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他茫然不知所对。说，我关的时间长，刚出来不久，不太了解情况，还是你谈谈吧。我只好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这几年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趋势，着重地向他介绍了批极左，还是批极右这二种批林方针在当前的冲突及其意义。他只是听，偶尔附和几句，没有什么交锋的意见。我感到颇为意外和疑惑：虽说他才出狱半年，但半年已自非短，一个有心的人不应对社会隔膜如此。

之后，我便没有再去找他。

八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当中班，习惯地去政办取了报纸来看。只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着《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按语，说的是辽宁兴城县的一名知青，高考不成功，便在试卷上就考试本身，发表了一通否定的议论。而按语则赞赏它是“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文革几年，荒废了千千万万万青年的学业。而所谓“工农兵学员”的推荐，早已成了走后门的竞争，遭人痛恨。周恩来批极“左”后，恢复高考，不失为一种挽救教育，给青年一个相对平等的上进机会的办法，是普遍受欢迎的。当此“十大”召开在即，毛远新抛出这么一个东西，企图扭转方向，把矛盾公开化，其政

治挑衅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工人们到炉房来打热水，我把这答卷和按语讲给他们听，没有一个是赞成的。他们要我写文章去批驳它。

我连续向《人民日报》发出了三篇短文，如所逆料，未能发表一篇。该报倒是用花边框出一篇文章，署名姚青新，（据郭鸿志后来分析，此名大概是暗示他们的后台是姚文元、江青、毛远新）题为《劝君莫奏前朝曲》，片面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些论点加以嘲弄。令我愤慨。

不是说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只是对反革命才实行“舆论一律”么？不是说“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么”？不是说“在人民内部，压制自由，压制批评是犯罪的行为么”？我现在是人民内部还是人民外部？究竟什么是“内部”、什么是“外部”？你在台上，你掌握了宣传工具，宣传你的主张，你当然认为你的主张是革命的，反对你的主张是反革命的，起码是错误的。你既然有权压制反对你的主张，不允许他们见报，那末，“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又怎么可能实行呢？人民民主又在哪里！

我把这几篇文章都寄给陈一阳看，征求他的补充意见。他阅后，建议我把这些文章也给李正天看看，听听他的意见。他已知道我会见过了李正天。

十月十一日，我去美院，再次找到李正天。他被安排住在教工旧宿舍楼地下的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等候分配。与他同时受审查等待分配的还有美院造反派学生头头简宣义，但他们没住在一起。

我把张铁生答卷的事对他说了，问他的看法，他又是茫然：“什么张铁生？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

我只好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他看了后对我说：“我介绍你认识个人，你一定和他谈得来，他是位电台干部，叫郭鸿志，很有头脑，很有学识。”我一听大为高兴，我正想结识电台的人。因为我那篇所谓“基督教的本质”，被陈一阳评价为标志着红卫兵青年林彪派与林彪体系彻底决裂的文章，就是冲着电台写作组的文章而发的。我一直想了解一下此文的内幕。我不熟悉电台的人，文革“三月黑风”前夕，电台“东方红”已受压，我曾带队翻过越秀山到电台参加过“东方红”的集会，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当时结识过一些人，但久无来往，人物姓名已全忘。

一周后，十月十七日。李正天带我去连新路见郭鸿志。

连新路在中央公园的西侧，我见郭心急，走得飞快。李正天大为惊讶，说：“我走路别人都说我快，你走路比我更快！”

我们进了连新路的一座小院，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妇女。原来这是电台编辑李秀芳的家。她的丈夫徐伯平是原省高教厅干部，李正天“2·27串联会”的

成员。文革后期“清队”中跳楼自杀，邓拓式的悲剧人物。李秀芳很和气，胖胖的，戴副眼镜，经常要用手背向上推推眼镜，问你“吃过了吗？”后来的“李一哲集团”中人物一律称她“李大姐”。

老郭已经在书房里等我。几座接天花板的大书柜藏满了书，大多是历史人文书籍。老郭更胖，大腹便便，也戴一副眼镜，满脸是笑。他说起话来总习惯用手虚掩着嘴，好像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有可笑的东西使他笑不可遏。我注意到他脚步有些蹒跚，一问之下，原来他当年随41军急速入朝，冬装不足，被冻掉了十个脚趾，算是残废军人。

郭鸿志读了我的评省电台写作组的那篇文章，非常赞赏我关于林彪事件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是民主问题而不是什么马列主义水平问题的看法。他抓住这个话题，一下子把它深入展开了。

我原来还仅认为，中共的民主问题，是从1958年的庐山会议批彭才开始严峻起来的，我对郭还是这样说。但郭却毫不犹豫地立即把这个问题追溯到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斗争。那时我们自然还未能清楚地看到，西路军的覆亡实际是毛泽东翦除异己，借刀杀人的结果，但郭鸿志已清楚地指出，党内后来的一整套压制民主，残酷批斗干部的方法，就是从整“张国焘路线”开始的，四方面军干部被整得很惨，甚至逼得许世友造反。以后党内斗争只要一上纲上线，立即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说话，但人心始终不服，毛主席他老人家心里也清楚。所以解放以后，徐向前、李先念虽然有职无权，也得在国务院、军委里安排一下，以平衡四方面军。

他又说，中国党是这样，苏联党、国际共运也是这样。苏联的不民主，也不仅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列宁的第三国际整孟什维克，骂第二国际就是派性。只许搞布尔什维主义，不许搞社会民主主义。说人家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但人家一直存在到现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越来越多，可第三国际自己早就没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完蛋了。共产党内的不民主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障碍，搞到现在快60年了，还赶不上美国，若到本世纪末还赶不上人家，就只能证明第二国际是对的，十月革命多此一举。

老郭的这番话对我真个是振聋发聩，耳目一新。我们受着共产党的正统教育，多年来我们只能读到正统的党史，我们无法知道掩藏在这党史后面的实际的阴暗面。而只有真实地了解过去，才可能真实地了解现在。郭鸿志对我的启发实在太大了。我立即给陈一阳去信，热情洋溢地向他介绍说，我结识了一位久经锻炼，思想极其精湛的老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我已把他视为我的导师。

我十分希望陈一阳能早点回来参加我和郭鸿志的探讨。李秀芳则担心，他不希望我把太杂的人带到她家来。我坚定地介绍说：“陈一阳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同志，遇事你们宁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也许我会动摇，他决不会动摇！”

这之后，我几乎隔一、二天就要与郭鸿志、李正天聚会一次。中午，李秀芳为我们烙饼煮白菜汤吃，完了，我便骑上自行车，返回二十多公里的新洲去上班。

我们讨论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项明也曾来参加过我们的讨论。他对“革命样板戏”的越改越“左”颇有微词。他说，他不敢听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因为一听那音乐，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们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讨论到了法制的问题。这是由好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正值高潮的批林批孔运动，越来越抬高了先秦法家的地位，把它说成是延续中国二千多年封建时代的“革命路线”的正确代表。虽然我们知道这里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但无论如何，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口号我们是接过来充分利用的。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始终认定，杨荣国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着他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文革以来的中国已经根本无所谓法制。另外方面，我们讨论了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以后，苏联理论界对贝利亚、维辛斯基破坏苏维埃法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批评。更重要的当然是实践，是文革中对林彪、黄永胜在广东制造的大量冤案、血案。

那时，原中南林学院《红色暴动》报编辑郑庆和与他的助手陈湛明（文革中，陈湛明与汪岷是中学红卫兵广州兵团报的编辑）对海南大屠杀作了大量的调查。他们整理了大量材料，拍摄收集了几大本屠杀证据的像片（项明为他们提供了摄影技术上的帮助），企图向中央说明原海南军分区司令员孙干卿在林、黄的指挥下在海南干出了多么惨绝人寰的坏事。

他们的活动据点在光塔路68号，我和李正天常去。郑也不时来莲花井会见我们（李大姐家的后门便是莲花井）。我对郑庆和所作的工作极为赞叹，他的实干精神和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材料非常详细，像片惊心动魄，连每一具已化为白骨的尸体，弹洞所在的位置都用箭头标示得清清楚楚，更不必说血案的经过，尸体埋藏、挖掘的位址了。

他来到我们这里，总是害怕“窃听”，要求开着收音机谈话。说是这样录下来的音会一片嘈杂，听不清楚。但对这种事，我历来的态度总是，警察要听就让他们去听好了。

他似乎并不看重我们的理论探讨，他捏紧拳头对我说：“最重要的是材料，材料就是炮弹。他们最怕的是这个！”“他们”是什么人？我们针对的是哪一些“他们”？我感到，我与这些文革势力的代表人物们（其实李正天更多的属于这些人）之间，已有了道深刻的沟壑。他们仍停留在文革的斗争目标上，把那些仍然压制着他们的某派官方势力，视作自己的主要敌手。而我，则把整个国家的不民主制度，视作自己的改革对象。

当然，我也重视他的材料，在后来的批林揭黄运动中，李一哲甚至仿效他，组织了调查组，调查一些广州的重大假案。但我坚持认为，没有国家全局意义上的政治改变，个别血案，无论多么惊心动魄，它的揭露，也是不会有什么动摇的意义的。不过我们还是达成了共识，就是要求中央加强法制，对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人物，无论他已经下台，或是尚在台上如韦国清之类，都必须依法对他们实行追究，不能搞“刑不上大夫”。

十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1 1月5日，也就是在我与郭、李不断地切磋一个月之后，郭鸿志提出，是否三人各写一篇文章，把这段时间我们的讨论都各自总结一下。我们都很同意。

一个多星期后，我的文章写出来了。写这样的文章对我已是轻车熟路。

我的文章写了五个部分，我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复辟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外衣下掩盖的封建性法西斯专政，解决它的主要方法，是“广泛的人民大民主”。第三部分后，是对林彪体系的阐述和批判。这些都是我英德茶场时期的文章已有的思想，新的发展主要是两点：一是我发现被共产党视为“反动”、“反革命”的人民的反抗，往往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右派进攻”等等，因此我在历史的外衣下，主张对那些“打着反革命旗号”的人民起义都应给以“崇高的地位”；二是我评论了“十大”以来时髦的“反潮流”口号，认为没有民主的前提，“反潮流”不过是一句空话。我说：“古往今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其实，鲁迅极少通过日本朋友发表文章，他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北京、上海的刊物上或自行结集出版的。我这么说，除了可以略避“共产党时代不如国民党时代”的风险外，还因为我心中已萌发向海外投稿的打算。这段话，不过是试探的气球，可以为我今后的行为辩护。当然，我真正向外发展的实际操作，已是六年之后的“中国之春”运动中。

郭鸿志自己没有写，我没有怪他。李正天则拿出一篇提纲式的东西给我们看，里面，他对加强法制，追究血案提出了一些看法。

我不喜欢李正天的文字，觉得太干巴，没有逻辑的说明，也没有特别的创意。李正天也感觉我不大满意他写的东西，便皱着眉头解释说，他现在写不好东西是因为脑袋被打坏了。他用手捶了捶脑袋。

郭鸿志建议把我们写的这些东西给毛主席寄去，他认为毛主席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支持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的。我们也都赞成。

我由于是第一次与李正天合作，又由于引见郭鸿志毕竟是李正天，不好太否定他的东西，便主张把他的那个提纲附在我文章的后面作为第六部分，总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接着便是署名。一开始我主张“洗犁”（希、李之意）但又觉得不像真名不好，那时时兴“梁效”、“罗思鼎”之类姓名化的笔名。“王一天”也不好，既不好听又有霸气，易受攻击，最后还是我决定用“李一哲”。我对他们解释说，我还要征求陈一阳的意见，因为我的许多思想包含陈一阳的劳动，若他也同意此文，那么“李一哲”的“一”便是陈一阳，若他不同意，这个“一”便是破折号。

李正天一听用笔名“李一哲”大为高兴，连说“好，好，好！就这样办。”此事便议定。

然后，我又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两个年青人。
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学生。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振奋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也振奋了我们，林彪法西斯党徒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镇压了我们。

从那时起，我们的命运便和整个中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的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一起了。

几年来，我们挨过打，我们挨过抓，我们挨过斗，我们也挨过饿，我们挨过了难以计数的折磨。

那时候，望着铁窗外秋后的落叶，我们苦苦地想也许我们是犯下了什么罪过了吧？

后来，当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到工人中间，农民中间，干部中间，走到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中间去时，

当我们仔细地倾听到他们沉重的呼声时，当我们从他们的呼声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愤恨时，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想错了。

革命有什么罪？大民主有什么罪？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有什么罪？

为什么要抓他们？斗他们？甚至杀他们？

没有了他们甚至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哩！

敬爱的毛主席：

成千成万的先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给社会主义的未来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给社会主义的未来了。

您告诉我们，实现这灿烂的希望，肩起这沉重的委托，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历史的责任。

于是我们决心写了这篇东西来谈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这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是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斗争才能生成的问题。

无产阶级的专政应当怎样巩固，社会法西斯主义应当怎样反对？人民只有人民才能真正懂得。

于是，研究它，解答它，实行它，各种的思潮便是任何东西也压抑不住它的涌现了。这是马克思主义求得发展的多么好的营养呵！

敬爱的毛主席：

也许文章尚未达到您的手里我们便横遭镣狱之祸。我们是准备着的。民不畏死，抓奈何哉？

但是我们相信，文章终归要达到您的手里的，因为革命总是自有后来人的。

如果愚公能够感动上帝，难道我们就不能感动上帝了么？

顺祝您老人家

万寿无疆！

郭鸿志一看连说“好，好，嘎然而止，余韵无穷。”问他要不要也署名。我考虑他是老干部，文革中动不动就揪黑手，为保护他，还是算了吧，便建议他不

必署名。于是这封给毛主席的信，便由“广东水产制品厂锅炉工人王希哲 广州美术学院尚留校审查学生李正天”连署了。

信复写出来，给毛主席的一封连同《民主与法制》，由李正天交铁路上的朋友刘赤带到北京去寄，一封给省革委丁盛收，由我寄出。时间大约是一九七三年的十二月上旬。

“光塔路68号”帮我们将此文刻印了出来，然后散发。不料此文却首先在广州各大学正在留校受审查的原造反派头头那里遇到抵制。

首先是中大的黄意坚反对批极左，对我们的文章站在批极左一边大不满意。无论我怎样向他解释我们今天已不能囿于造反派的狭隘圈子来考虑国家政治形势的问题，他都仍然坚持说“批极左就是批造反派的。”他对我们的民主思想也极力反对，认为我们每一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接着，李正天又告诉我，他无法说得赢华工的吴枚和华农的马锦郁，只好对他们说文章是王希哲写的，要我直接去与他们交锋。

我到华农，见到了他们两位。吴枚很随和，没有太多的挑剔，马锦郁则有一种派头，似乎总在告诉你：“你算什么？你能懂得多少东西？”他不赞成“林彪体系”的提法。他说：“什么林彪体系？林彪有什么体系？林彪不过是个小丑。你们提林彪体系，是把他抬高了。你们读过多少黑格尔？……”李正天笑了笑，望着我。我回答说：“现在林彪垮台了，轻描淡写把他说成是小丑是容易的。但要承认这个小丑曾经统治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并至今还具有大影响就不容易了。而敢于向他的这全套东西发出挑战和批判，就更不容易了。”

“不错，黑格尔体系博大精深，林彪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林彪的专制政治思想，既然涉及各个方面，你就不能不承认它已成了一种体系。”

我不断地与马锦郁辩论着，虽然不能最终把他说服，但他已不能再对我傲慢。批判李一哲后他改变说，他喜欢我的文章。经常带着一些所谓我的文章的“崇拜者”来找我。

在原广铁总司头温仲其那里，中山大学工人头头周胜军那里，我也作了解释的工作。

转眼便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一天，政办潘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最近你是否写过一篇什么东西转到上面去？”我说是，“写给毛主席的。”他又问与什么人一起写的。我答美院的李正天。没有提陈一阳，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陈一阳，不要提他。虽然陈一阳这时已来信盛赞这篇文章，预言它发出去后必然有如中子轰击原子，产生难以估量的核爆般的效果，并同意介入此文。潘没有再说什么。

但风声却越来越紧，到处有人来告诉我们说，省里很重视这篇文章，可能要

抓人。果然没几天，我们便看到了一份材料，是孔石泉、赵紫阳召集的省革委的一次会议。那些结合到了省革委的原两派的头头们刘继发、梁锦棠、刘均益、孙亦武、武传斌纷纷表态反对李一哲的文章，表示划清界限。武传斌还揭发了李正天曾怎样鼓吹白专道路云云。这些上层头头除了武传斌之外，与我并不熟悉，他们文革里知道李正天多一些。于是便想当然地把此文的主谋和肇事者认作了李正天。从此，李正天便成了批判李一哲的主要打击对象。

《民主与法制》并不是派性的文章。但它的作者在文革中派别的身份和它的问世首先在某派的层面上流传，使它不能不蒙上了一层派性的色彩。

赵紫阳显得很老练，一定要先获得各派头头们与李一哲划清界线的承诺，这是他实际重新主政广东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刘兴元早已调职四川。丁盛代表的军方势力，林彪事件后，也在渐渐地退出执政的第一线。责任全在他身上。他小心翼翼，生怕踩响派性的地雷。因此，对李一哲的打击，一开始，也只是试探性的。

李正天在美院开始遭到围攻。《李正天何许人也》、《不许李正天逍遥法外》的大字报在美院教学大楼四周张贴。

那天，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研究后，决定拟文反击美院的围攻，我起草。李稍有惊吓，颇有失措感。现在只有鼓励他顶住。”

是这样的，由于李正天对《民主与法制》一文并没有很深的思想基础，过去一个多月遭到朋友的批评，已感绌于应付，现在突然遇到了敌对的压迫，威胁和围攻便更显得有些慌张，不知所措了。

郭鸿志把我叫到中央公园，坐在石凳上很生气地对我说：“怎么搞的，小李这个人又不是没经过世面，单印章略施小计，就把他吓成这样！”——单印章是广州军区政委，在省革委主管广东宣传文教。郭鸿志认定，他也是批李一哲的主管。

我问，你听说老人家对我们的文章表了态了吗？郭说没听说。我说那好，告诉小李，咬定我们的文章是写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没有表态，任何人无权给我们的文章定性。”

我赶到美院看了所有的大字报，根据他们的问难以李正天的名义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记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阐述我们为什么反对美化秦始皇和秦皇朝的封建专制。李正天将此文抄成大字报，贴在美院大楼外侧的墙上，引来了校内外师生和许多群众的围观，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李正天得到了支持，显得坚定了起来，在他的据理争辩下，美院批判的声浪居然日渐沉寂了下去。

我的日记这样写道：

“美院形势好转。故斗则进不斗则退。李始喜形于色，略有骄气。”

当然这次打退美院的围攻，还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沉着应战，寸土不让，它主要是因整个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一个批判揭发黄永胜的高潮在赵紫阳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

十二、赵紫阳与批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没有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在其复杂性上，可以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相比的了。

林彪集团的突然垮台，使中国社会各家政治力量都激动了起来，他们都企图在“批林”的口号里，插进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使批林运动按照自己的愿望走去。

毛泽东批林。他最关心的是不能翻文革的案。他看出批极左的目的就是要翻这个案。他不允许批极左，周恩来是“右倾翻案”的总根子，他心里有数。因此，他赞成批孔以借古讽今，他甚至纵容默许了江青对周恩来的含沙射影或明火执仗的攻击。但有个最后的界限，他不允许江打倒周恩来，因为周扮演着共产党的红脸，它是被压迫的下层人民和被打倒的上层官僚们在受到委屈时获得保护和解救的最后指望。如果这红色的面具最终被打破了，那么大乱也就临头了。

江青批林。她最关心的是打倒周恩来，她一心要把周恩来算计成“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批林就是批“周公”，这对她是毫不含糊的。她不允许批林批孔离开攻击周的方向和轨道。周恩来批林。他是真批林。他知道只有真批林才能解放大批上、中层干部，使国家从长期极左的束缚中略松一松，喘一口气，以待复苏。他的愿望是接近人民的愿望的，因此最终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周的批林，在形式上是求稳保守的。他非常不愿意再出现他实际不能控制的大规模批林批孔群众运动。

王洪文批林。他是江青的一帮，但他不等于江青，周恩来并不是他的主要敌人，他最紧急的不是打倒周恩来。他出身上海，是“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唯一代表，势孤力单。他最紧急的是要把全国被林彪军管势力镇压，消灭了的造反派重新扶植起来，把他们的头头们提拔起来，以巩固自己刚刚在“十大”得到的副主席地位。他最希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东新到任的赵紫阳，许世友更要批林。不批林，就无法驱除黄永胜在政权，在军队的强大势力，他们在广东就立足不稳。要彻底揭黄，就需要发动群众，这点上他们接近王洪文；但发动群众，他们又怕惹起派性控制不住，这点上作为官僚本能他们又接近周恩来，而最终他们又害怕江青。赵紫阳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一九七四年广东批黄运动的摇摆不定，虎头蛇尾和最终滑稽地以批李一哲收场。

一九七四年元旦前夕，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这是中央发起批林批孔的第一个报告。他指责有人“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到现在对群众还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还说造反派没有好人”。他要求“读书班的同志去组织斗争”。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江青连续在京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煽风点火，要求批孔“联系现实”。

二月，中共中央发布七号文件，点名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成果”。

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联系实际揭死党”。

王洪文更是在多次讲话中，要求解决“十次路线斗争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发动群众揭盖子，“一，点火。二，敲。三，敲不开就砸”（三月中在上海与马天水、王秀珍的谈话）。这个讲话，立即传到了广东。

批林批孔必须“联系实际揭盖子”在广东立即有了特殊的意义。

广州军区是林彪旧部。文革以来从黄永胜、闫仲川到刘兴元、丁盛、任思忠、孔石泉历任军管首长都受到林彪的支持。他们在广东干了许多的坏事，这些坏事在过去是不会被追究的。但九·一三后，在中共中央的眼里，他们干的坏事都是在为林彪政变南逃，搞南北割据作准备。在这之后的长达二年半里，广东的军管当局竟没有任何向中央揭发内幕，检讨错误的表示，反而统一口径，声言林彪“在九·一三之前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全盘否定林彪”等等，并进而压制一切企图揭黄的造反行动。这就不能不更加深了中央和广东干部群众对军管当局的怀疑和不满。

在王洪文“敲不开就砸”的讲话鼓动下，三月十八日，省革委副主任，原红旗工人头头刘继发发布了一份小字报《团结起来，打一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这就是群众运动。刘继发提出来了，赵紫阳接不接受？这对他是个考验。但这时的赵紫阳还没有站在第一线。形式上，他仍排行第三。迫于形势，广东省委不得不接见造反派。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两天，孔石泉、王首道、赵紫阳、林李明、单印章、焦林义、雍文涛、张根生、刘田夫、寇庆延倾巢而出，接见了刘继发、丘学科、周炎、罗泽权、丘长卿、潘承德、钟铝光等。（据说，钟铝光已经与王洪文的秘书有了直接的联系）。冤家路窄。这是孔石泉1968年后与这些“阶级敌人”的第一次再见面。就在那一年七月的省革委第二次全会上，孔石泉根据黄永胜的指令，把现在面前的这些人几乎通通送进了监狱。

可以想见，气氛不会是轻松愉快的。省委的官员似乎只是带着耳朵，倾听代表们的揭发和诉苦，没有作任何表态。

造反派们只好搬出了王洪文：

“有人甚至把中央7号文、9号文和王洪文副主席在中央读书班的讲话也说成是小道消息”。

“王洪文副主席的讲话，各省都传达了，广东为什么不可以传达呢？本来是中央讲了的，你不传达，这是极其错误的”。

他们并不掩饰他们的目的：

“在外省，都有造反派当选中央委员、省委常委的，唯独广东没有，这也是广东与外省不同的”。

当晚，善变的焦林义向刘继发、丘学科表态：“看了王洪文的讲话，促动教育很大”，“对军区过去的宣传，我受了很大的欺骗。……从化会议（丁盛捂盖子会议）是要批判的。刘继发的小字报是正确的，有推动作用”。

但孔石泉领衔的这次接见，已经是他在广东的“最后的晚餐”了。第二天，中央11号文件下达，孔调回部队，广东的党、政、军一切大权归赵紫阳。这显然是为了搬开石头，让赵紫阳放手揭发广东军方的问题。

广东的批林批黄运动大踏步前进了。

四月九日，李一哲贴出了广州街头的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炸开了广州沉闷的空气。

赵紫阳决定支持群众运动了，但他唯一害怕的是派性爆发，闹不好，他就要在这个上面翻船。他小心翼翼地征求孙亦武、梁锦棠对平反《批陶联》的意见。梁锦棠不敢表态，孙亦武则表示不计前嫌，坚决支持赵紫阳为红旗派的平反。赵紫阳紧握孙手，热泪盈眶！

四月二十三日《南方日报》发表原广东两派工人领袖刘继发、孙亦武联署文章《团结战斗，向林彪及其死党猛烈开火》。

赵紫阳又是这样，稳定住广东两派之后，他才大干起来。

四月二十四日，《南方日报》整版的社论就像一张大字报《放手发动群众，揭开广东阶级斗争盖子》。

四月二十八日，赵紫阳第一次身兼四职亮相，主持召开省、市八万人批黄大会，大张旗鼓。这时，他完全把广东的批孔变成了批黄。《南方日报》连篇累牍都是揭黄的文章，已几乎没有了玄而又玄的“批孔、孟之道”的踪迹了。但请读者不要忘记，江青的批孔，目标是为了批周，这就潜藏了危机，她是不会允许广东运动长久偏离了她的轨道的。周一派显然也不会允许，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但广东的批黄运动，继续向它的最高潮发展。

四月三十日，新到任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赵紫阳一起，接见了已联合起来给他们写信的两派头头。

接见时，许世友的情绪非常高涨，他说：

“刘兴元、丁盛、任思忠不是死党，也是死党！”“你们在地方上揭，我们在军队揭，要发动群众揭盖子”。他拍着莫竞伟的肩膀说，“你们是革命的宝贝”。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把他从张国焘的马前争取到自己麾下时对他说的话。许世友一字不漏记了一辈子。

他一举为黄永胜打成反革命的军区文年生、郭成柱、相炜、江民风、陶汉章平了反。

五月十日，许世友、赵紫阳出席省、市总工会召开的十二万人大会，把广东的这场揭黄、批黄运动推向了顶峰。这次大会，由参加过中央读书班的中央委员、原红总头头梁锦棠主持。前几天许、赵接见过的两派头头全数参加，真正实现了大联合。但是，这次大会是在王洪文的影响下发动的，它违背了江、周的意志，立即引起了反弹。一年后的1975年5月，王洪文在邓小平、叶剑英的打击下有个检讨，他说：“我对批林批孔是不理解的，特别是关于广州召开十万人大会问题，当时查清楚是对的，但由于我自己不理解，也说过一些错话，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请注意，这次许世友、赵紫阳出席的大会，“在政治局也进行过争论”。

“争论”的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广东的揭黄运动急剧降温。

6月，赵紫阳匆匆宣布了广东的盖子已经“初步揭开”，批黄运动“基本结束”。好像一夜之间，报上的揭黄文章不见了，重新恢复了一篇又一篇各大学（特别是中大）批孔的文章，在历史的烟幕下，在闪烁的言词后面影射周恩来，吹捧江青。广东运动回到了江青原来设计的阴谋主义的轨道。不对，已经不是阴谋主义了。6月以后，江青的“批林批孔”已经阳谋化了。从6月12日到6月28日，情绪激动的江青在北京、天津的一系列公开讲话，干脆戳破了这层纸。她直截了当地说，批孔就是要揪“现代的大儒”，就是她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与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斗争。我们看到，就在这时，赵紫阳向江青表忠心。7月14日，他在省直机关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说：

“九大以后，林彪就向刘、丁、任面谈，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广东原宣传办负责人李树夫，可以在许多大会上公开骂江青同志，而这样一些行动受不到制止，没人追查，而且当时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就知道这些事。这不是偶然的，他还可以继续当主任，而且继续升官，这是什么政治气候？这是非常严重的。攻击江青同志的话可以到处去讲，所以，广东的反革命舆论那时是搞得很厉害的。”

他又说：

“广州有一股反上海风。反上海决不是反上海，是借口反上海反张、姚，……这个问题要再查清楚”。

显然，赵紫阳是在向江、张、姚讨好：

“林彪在广东搞你们的事情我都在查哩！所以我在广东揭黄永胜对你们是有利无害的呀！”

就在这次表忠的会议上，赵紫阳向江青的布署妥协了：

“研究法家的革新思想，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很好地发动干部群众，很好学习儒法斗争史”。

“学习儒法斗争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我们必须紧跟中央（？）的战略布署，把这场运动引向深入，进行到底”。

江青批孔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赵紫阳已经不能再装糊涂了。这对他确是一个两难。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使他明白他不能违拗江青的意志，他必须使广东的运动与江青保持一致，但他又不敢承担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风险。赵紫阳毕竟是赵紫阳，他有办法。这就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7月18日，广东省、市委，广州部队召开更加声势浩大的十六万人大会，主题是：“研究儒法斗争史，深入批林批孔”。赵紫阳在会上按照江青天津讲话的口径说道：“二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但在发布新闻时，他却隐去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只以“省委负责人”的名义见报，从而缓冲了大会的影响，减轻了个人的风险，为自己留了条后路。充分表现了他此时首鼠两端的矛盾遑遑态度。

李一哲“救”了赵紫阳。

就在此时，李一哲大字报出现了。李一哲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把他们去年已被省委定为反动的写给毛主席的信加了洋洋的序言又一次抛了出来，复盖了北京路与中山五路的几乎整个十字路口。他们毫不含糊地把矛头指向了江、张、姚，他们不允许广东省委背离广东的揭黄去紧跟上海帮，把火向周恩来烧去。这一回的影响，真的有如《基督教的本质》；这一回的震动，真的有如“中子轰击原子”了！毛泽东对这份大字报的表态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共政治局决定把这份大字报印发各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并下发到全国各党、团支部以供批判。这在当时，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首肯，是不可能的。

赵紫阳不是表了态，广东决不允许反江、张、姚么？

赵紫阳立即抓住了李一哲大字报，发起了一场规模决不亚于揭黄批黄的批李一哲运动。这真是金蝉脱壳之计：赵紫阳一方面把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变成了批李一哲运动，可以向江青交帐，又可以躲开了不得不把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尴尬处境。一石二鸟，赵紫阳何其有心计！李一哲几个小人物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广东省委如此高规格的批判礼遇，秘密就在这里。

十三、李一哲与批黄运动

现在回头再叙述一下我自己。

自美院形势好转，刘继发小字报发出之后，李一哲几人更频繁地聚集莲花井，研究下一步形势可能的发展。

这时，陈一阳已经常回穗。我带他到莲花井见过郭、李诸人。见后，他竟对我说：“以后还是少去李秀芳家吧！”我惊讶，问他为什么。他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很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他还满脑子这么些世故，便说，“算了吧，你少来这么多毛病！”那时，只觉得他过于谨小慎微，但也只有在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在男女关系方面，有多么虚伪！

我们分析了广东目前的局面，认为自王洪文“揭盖子”讲话后，全国可能很快就会动起来。广东自1968年以来，已潜伏着相当复杂的矛盾：

军管当局在各地区制造的大量冤案，血案；

军管当局为搞南方党，排挤地方干部而制造的大量冤案；

军管当局把《批陶联》打成“5·16”，在当年的造反派和老干部中制造的大量冤案；

大批的工人，市民在清队，备战和历次运动中受到的无端迫害等等。这些矛盾相当尖锐，只要一具备外部条件就可能爆发。目前，广东军方对林彪、黄永胜的保守态度显然令中央十分怀疑，赵紫阳也可能利用这一形势来重新树立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因此，李一哲应当站在运动的前面。必须看到，批孔运动是江青发动的，她的目标是周恩来，她不会允许广东运动长期脱离她的轨道。这样，能够给赵紫阳放手揭黄的时间必然是短暂的，我们李一哲必须抓紧这个时机，使广东人民在短暂的揭黄中，尽量多得到一点自己实际的利益。刘继发小字报后，原造反派头头也在动，特别是那些“在野”的头头。我们必须把对广东基层群众运动的影响权迅速抓在自己的手里而不能消极地把它让给那些头头，他们眼光狭隘，急功近利，他们的思维习性还没有摆脱中央文革的影响。这样，他们就会把群众运动引导到跟王洪文、江青走，这是很危险的！我建议大字报立即上街。

正当我起草李一哲的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时，中央十一号文件下达，赵紫阳任省委第一书记。我正在锅炉旁写文章，炉火熊熊，气压上升，于是我在文章里也写道：“革命的气压迅速上升！”

在这篇文章里，我以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蓝本，分析了文革以来广东的政治状况，指出了各种潜在的尖锐矛盾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为了鼓舞广东人民，我写道：“可以说，目前广东是布满了‘湿柴’。柴可以燃烧，但湿柴却难以燃烧。现在有‘北风’，有星火。‘北风’可以把柴吹干，星火可以蔓延并把更多的柴烤干”。

“李正天在美院打破了‘围剿’并转入进攻，为各单位的革命群众向林黄路线挑战提供了经验。它说明无论各地林黄路线的实行者怎样气势汹汹，总不能不

慑于整个社会的革命潮流的。李正天在美院能办到的事，各地区、 各单位的革命群众也能办到。”

我又以刘继发的小字报为例，告诉广东人民，一场批林揭黄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展开了，广东人民应当为了自己的解放立即行动起来， 投身到这场斗争中去。

四月九日，由项明拍照并“保驾”，我和李正天、陈一阳三人上街，在中山五路贴出了《广东怎么办？》六日之内，中山五路北京路口人山人海，喇叭乱鸣，交通几为之中断。其中还发生了一起恶性流氓案，污辱少女的主犯之一卢金添，直至八年后我在怀集监狱见到此人，他向我讲述了怎样在拥挤的人群中将少女推倒，肆意污辱的过程。我发为之冲冠。

那几天，全广州市到处都在问李一哲是什么人，他有什么背景？都在议论《广东怎么办？》

果然，原造反派头头对我们的行动抢在了他们前面而大为光火。温仲其当面对我和李正天问罪：“你们算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把你们和刘继发并列？你们有什么动机？”他气呼呼的。显然，是有人指使他来问罪的；黄意坚则抽着烟，干脆要我们把大字报撕下，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干扰了朝里那些人的部署和计划。又说是我们的行动会使赵紫阳产生戒心，不敢再放手发动群众云云。

对这些指责，我们当然拒绝。但四月十四日，也就是六日之后，大字报终于被刷去了。

第二天，四月十五日，我们研究后，仍以王希哲和李正天署名给赵紫阳一信，承认街头大字报可能会对交通和群众的安全发生影响，要求开辟“大字报特区”。

同时为了回答造反派头头的责难，打消赵紫阳的顾虑并竭力不使这场批林批黄带上派性斗争的性质，我又起草了一篇《现在谁最希望挑起派性》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

五月十日，许世友、赵紫阳参加的省总工会十二万人批林揭黄大会召开。

大会五天之后，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同意了我和李正天及其他群众的意见，决定在市一工人文化宫、中央公园、海幢公园等七处设大字报区。

但是大字报并不多，海幢公园几乎没有，大字报棚白搭了。人民疯狂的革命热情已经过去，他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旁观者。他们仍然非常关心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但要他们站出来，象1967年封《红卫报》，省革联夺权前后那样，已经不可能了。

市一宫大字报集中一些，郑庆和在那里抛出了海南部分地区血案材料，又和马锦郁一起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黄永胜》；黄意坚发表了纪念炮轰黄永胜七周年的大字报和一评、二评“三军联委战报”的大字报； 珠影何宏盛公布了孙

效林在关押中受迫害惨死材料；七所卢宗谟发表了论“批陶联”平反的大字报，还有揭发军区“31办”的材料和各系统工人受迫害材料等。这些材料吸引了许多的市民。

但几天后，风云突变，省委又突然宣布大字报不开放。这显然是赵紫阳受到了前述中央反群众运动力量的压力。大字报棚开始拆除。

省委运动办负责人张作斌到美院会见李正天，要求我们执行省委的决定并作好他人的工作，使大字报不上街。

我的意见是坚决抵制。我认为大字报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武器，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未能牢牢掌握住大字报这个武器。一九六八年已经被剥夺了一次了，现在不能再随意剥夺，大字报一定要上街。这样，贴大字报与撕大字报之战便爆发了。

我们提出了抗议。黄意坚、邓元贵、钱鉴、林凡、张志强、梁锦豪、樊大九等也都纷纷提出了抗议。

在整整十多天里，我们和其他群众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地写，官方则在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世杰的“前敌”指挥下不断地撕，后来更组织了撕大字报的专门队伍。半年后，在《民主与法制》贴上街头的序言里，我们这样追述了当时的这场斗争：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的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也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当被镇压下去了的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写到这里，我几乎要流下泪来，因为我想起了在此六年后的一九八〇年，李正天对大字报的态度。他是怎样向邓小平投降的。这是后话）。

工人逐渐发动起来了。五月三十日夜。原红旗工人头头邓元贵在北京路储运公司三楼召开各大工厂头头会议，商议向赵紫阳请愿，递交备忘录。正在此时，中央十八号文件下达的消息传来了。毛泽东主张开放大字报，允许外国人阅览，拍照。一时间群情振奋。邓元贵要我们立即为会议起草一个声明，我马上草了出来：《旗帜鲜明，继续前进》，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决定，批评赵紫阳叶公好龙。陈一阳和诗人李士非作了润色。然后由邓元贵、叶振光等领衔，与会二、三十余人全部签名，贴上了街头。同时我们发出了在中央公园召开演讲会的海报。

这时，轻工系统的工人，在叶振光的带动下发动起来的特别多。六月一日的中央公园演讲会，整个会场的布置和保卫基本由他们负责。我演讲完后，便由缝纫机厂和保温瓶厂的工人李功生、朱文智等保护离开会场。李正天也作了演讲。演讲会相当成功，听讲的群众拥满了公园前的丁字广场。当我报名说“我就是李一哲”时赢得了一片热烈的鼓掌和欢呼。

会后，各工业系统都邀我们去参加演讲会或动员会。李正天和我碌碌奔忙。

但我也注意到了一个苗头，就是工人头头们在对工人动员时，都要强调王洪文的讲话，给人的印象，广东的这场运动是直接紧跟王洪文和江青的。我感到这对运动的发展很危险，我们必须尽力地在群众中纠正广东运动是跟王洪文走的印象。

某日，在沙河的一次农民动员会上，邓元贵又一次传达了王洪文讲话。这次会议很重要，原“红旗贫下中农”司令樊大九和广州北郊沙河、新市、人和等地的农民头头方容溪、刘世荣、江振洪、黎沛华等都参加了。农民与工人、学生不同，他们在他们的乡村有长期的稳定性。同时，他们的有影响力的头头，也就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我很注重这一点。我在发言时向他们介绍了九·一三后，对林彪路线是极左还是右的争论。我强调李一哲认为林彪、黄永胜是在极左的旗号下镇压广东人民的。周总理是反极左的。“三月黑风”中周总理是解放了广东造反派的。“你们有什么冤案材料可以交给我们呈送给周总理。”其实，那时我们手中的材料一般也是交给省委运动办的，因为省运动办的负责人张作彬、肖洪达此时已与李一哲（通过李正天）建立了经常的联络。

轰轰烈烈的群众发动过去后，便转入了各系统、单位揭发，批判阶段。一位侨属工人把他立新路442号的一套空置房无偿借给我们使用。此后，这里便成了李一哲的“据点”。号称“442”。住在邻近的民政系统工人陈锦禄作了这个据点“总管”。他是文革中芳村工业区的工人活动分子，是民政系统头头谭友林介绍来协助我们的。李功生、郑锦林、甘仲文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也成了“442”的义务工作人员。

我们把“442”略布置了一下。我要李正天书写了一幅我十分喜爱的传闻是毛主席纪念鲁迅诗贴在屋厅（即会议室）首面的墙上。诗曰：

“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
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

李正天的字是有他的特点的，一眼看去，浑厚飞动，颇有气势，但笔划终嫌生硬，与其性格略合。

来“442”的工人川流不息。他们大多是来索取我们编辑印刷的运动简讯资料的。也有来找我们谈话，寻求帮助，反映情况的。翟树言将一位香港同学赠送的一百元港币转给我，我们买了一台卷筒油印机，印刷资料。原工联最早期的头头叶振光也经常来，在“442”召开各系统工人会议。

我们抓紧时机把《民主与法制》再刻印了出来，供工人们讨论，座谈。这篇东西，许多人听上面的头头说了，说是很反动，万勿与李一哲接近。他们没有看到，有些神秘。

那时，上面的头头们，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叶振光除外），已经对李一哲很不耐烦。刘继发在许多的场合对李一哲影响着广州社会层面的运动表

示了愤怒和憎恨。他们感到危险，他们害怕出现广东的“省无联”，他们非常担心李一哲会把运动引导到与江、张、姚作理论对抗的方向上去，从而干扰和破坏了他们的“大好时机”，“大好形势”。

他们的“大好时机”是什么呢？就是“提升”，就是“补台”。

王洪文在他对批林批孔作原始发动的“中央读书班讲话”里，就反复批驳了一个江西的所谓“老师归位，小兵回营”的谣言，说是毛主席将它改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带路，小兵提升”，说这一改，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

刘继发等念念不忘这个“小兵提升”，一有机会他们就要重提这个问题。3月28日提过一次后，6月8日刘继发又一次提醒赵紫阳：

“紫阳同志最近在省革常委扩大会上指出，要解决各级党委和革委领导班子中代表性不够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

于是赵紫阳也就承诺：

“有些（机构）代表性不足的，也要作好充分准备，对他们进行考验，到运动后期进行补台”，“把他们放在领导岗位”。

为此赵紫阳在越秀宾馆组织了省、市革委工农委员学习班，开办了“刘、孙办”（刘继发、孙亦武办公室）。但不幸运动后期对李一哲的大批判，果然“错过了时机”，使得这些“工农委员们”“提升补台”的希望大多成了泡影。

他们继续等待机会。机会终于又来了。这是1976年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江张姚王最得志的时期。这时他们紧跟江青、王洪文跑已不必再受到李一哲的牵制了。他们又一次提出了“提升，补台”的“组织路线”问题，最后是一网打尽，再也爬不起来了。刘继发郁郁而死，孙亦武潦倒尘埃。这是后话。

刘继发等之外，还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黄意坚领导的一群。74年的批林批黄，他们也是一支很重要的批判力量。但他们是仇视《民主与法制》的。他们也竭力与李一哲划清界限。在《民主与法制》第一稿的辩论中，他们早已迫使李正天承认了错误，向他们表示“不再坚持《民主与法制》中的许多观点”（见黄意坚，李仁兴《射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箭》——评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把《民主与法制》加上序言抛上街头惹恼了他们，他们认定这是“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一次全面的猖狂进攻”，“为林彪反动路线开脱”，业已“破坏和干扰”了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同上）。因此，当赵紫阳发动的对李一哲的大围剿一开始，他们（包括广重谢遇安、珠影钱鉴等）立即响应，挥动板斧，也向李一哲恶狠狠地杀来！

在英德茶场的那段对文革的反省时期里，我已朦胧地感到，所谓“造反派”，实际是最大的保皇派。现在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黄意坚是最典型，最忠诚，最

坚决的造反派，而他也正是最顽固，最反动的保皇派——他们造反，要保卫的就是“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专制制度。他们和宣集文一样，敏感地发现了李一哲萌生的自由化民主思想，他们甚至是比官方更加不能容忍的。

现在回到“442”来。

这时，我们的工作重点，已逐渐转到了深入调查材料的阶段。由李正天主持，由我指派十七中原井岗山公社的老同学莫庆梁、陈慧珊、苏江等具体负责，抓住黄永胜孔石泉军管下最著名的“登峰南60号案”（即所谓渣滓洞案），“沙河饭店案”开展了调查。

在受害和知情群众的配合下，我们很快对两案有了调查的结果。我们在财厅前召开群众集会，请受害人上台控诉，然后游行至市委，由广钢工人头头商铭代表请愿群众将材料呈递出来接见的运动办负责人。但此案的实际解决，仍是在三中全会召开，李一哲平反后了。

同时，莫庆梁对军区“31办”在粤北监狱迫害致死的饶彰风、林铿云案，也开展了调查。

原来，广东在陶铸的把持下，1952年、1957年两次以“反地方主义”为名，对冯白驹的海南系干部和古大存的东江（西江）系干部进行过打击，牵连叶剑英和方方，造成了不少冤案。（包括所谓南方党的张发奎部“特支案”）文革中，1967年4月周恩来到广州，继续以毛泽东定了案为由，严厉警告和压制了“地方主义”的翻案企图。

但这批被打成“右派”的“地方主义”干部正因为受压迫过深，始终不甘屈服。尹林平、林铿云、吴有恒等为代表，在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直接的高压下一直没有停止过翻案伸张的努力。尤以吴有恒最为倔强，最为优秀。

1968年夏季，广东军方大镇压后，这批“地方主义”干部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批林批黄一开展，他们的家属通过关系找到“442”，请求我们为他们揭露真相，伸张正义。莫庆梁就着手了这方面的工作。但由于批黄运动的迅速降温，时间短促，调查尚未得到最后的结果便被迫停顿了下来。虽“李一哲集团”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未有结果，终究遗憾。

差可告慰的是，一九八一年最高法院对林彪集团的审判，在大量的证据面前，黄永胜不得不招供了对这批中共老干部令人发指的迫害罪行。饶彰风、林铿云等冤案，终得了昭雪。

七月底，赵紫阳宣布盖子已经揭开，批黄运动“基本结束”不久，张作彬、肖洪达把我和李正天召到省委，要求我们立即撤去立新路442联络点。这是我们意料中事。赵紫阳的批黄是短命和不彻底的。但是，我们已经把握机会，尽可能地向前推动了运动，林彪、黄永胜血淋淋法西斯专制的真相已暴露于天下，没有人再敢否认它，这就是今后进一步前进的基础。（甚至连焦林义也承认了。他

说，关于提出“全省杀害七千人问题”，“当时在省委会上我是反感的。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看到中央调查组对儋县海南调查的情况，确实是惊人的。光是这地区的杀人问题就超过这个数字。这个问题对我教育很大。”）现在，我们也可以见机而退，同意“基本结束”，但“4 4 2”联络点不能轻易退出，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回来，我起草了《论基本结束》，就运动的仓惶收摊，揶揄了赵紫阳一番。但我也没有掩饰这张大字报实际是李一哲向广州市民的告别，像《广东怎么办？》一样，李一哲表示坚信，既然广东的运动未能彻底，旧有的基本矛盾未解决，那么，下一次的革命高潮，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一个时机重新到来。

十四、李一哲的宣言《民主与法制》

这之后，我被水产局调去了“儒法斗争学习班”，再之后，又被调到北郊石井的农林水战线干校的“工人理论学习班”。在那里，我与其他被培养的官方“工人理论家”一道，几乎成了专业的古籍研究者，认真地读了《左传》和《史记》，平静地度过了二个月。

但是我忧虑地注意到，广东报纸批孔的矛头，已愈来愈具有向周恩来发难的性质；更严重的信号是，广州市委按王洪文的要求成立了广州民兵指挥部，焦林义在成立讲话中明确指出，广州民兵指挥部是“按上海的模式”建立的，它将“不折不扣”地按上海的经验来建设民兵。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明白无误向江青一帮投靠的宣言了。

十月中，中央下达了两个文件，一为贺龙平反，二为通知将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郭鸿志把我叫了去，还没坐定，劈头就说：“小王，四届人大要开了，我们把《民主与法制》抛出去，你看怎么样，可能会有些用。”

我没想到郭会有这样的建议，坐下来沉思良久，没有回答。

李一哲与市民告别已两个多月了，现在再站出来，有这个必要吗？风险是非常大的。与五月份不同，那是批林揭黄，是打死老虎，是群众运动。而这一次，我们大字报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只能是四面受敌，孤军奋战。今年二月，虽说我们曾打破了美院围攻，但那是非常局部的，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但现在我们要把大字报贴上社会去，公开下战书，再次激怒他们，那就要准备面对全部政权机器和全社会的围攻，我们能顶得住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怎样？我们一直未能摸底。我和李正天曾专程去黄文育家打听，但也不得要领。这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只是说，他个人不赞成我们对秦始皇的态度，我们的大字报确是会很使一些人害怕的哩……（我们万万没料到这次的拜访黄文俞，害他不浅，竟使他成了我们的“后台”而遭殃。）

我问郭鸿志：你是怎样认为的，你觉得现在把大字报抛出去很有用，理由是什么呢？

郭鸿志见我有些犹豫，便说：你可以和小李、陈一阳先商量一下。我看中央现在一起下这么两个文件不象是偶然的。贺龙一平反，一大批老干部也会跟着平反出来，四届人大就要安排他们，江、姚肯定不乐意，因为这样一来，周的地位反而更巩固了。所以这段时间，中央肯定有事。我们给老人家的信，去年没有公开，什么传说都有，干脆拿出来，让大家都清楚。

老郭倒似乎没有多考虑风险问题。不过，我觉得老郭的分析还是正确的，四届人大前后，中央会有一场斗争爆发，李一哲应该鲜明地表白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当广东目前越来越趋向向上海靠拢，赵紫阳、焦林义越来越表现出向江、张、姚、王讨好，妥协的倾向时，李一哲应当让他们知道，广东人民并不都是好欺负

的，并不都是只会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他们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掩尽天下人的嘴巴。个人风险性命可以不必多计，何况这一年来，李一哲在广东已小有影响，赵紫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我表示同意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但我说经过一年的运动，有些事已经向前发展了，有些事新发生了，可以加个序言把各个问题再说透一些，再扩展一些。另外，李正天写的那部分，我原来就不满意，最好让陈一阳和李正天商量一下，改写过，序言就我来写吧。

我与陈一阳商量，陈毫不考虑就高兴地答应了。他因为顶着“李一哲”“一”的称谓，去年却未能在这篇文章里贡献一点自己的才华，颇感遗憾，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踊跃一试。

不久，我把序言写好，拿给老郭过目，一周后，老郭回给我时，竟已成洋洋万言长文！这不禁吓我一跳：除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我还没见过可以长过正文如此多倍的序言。我一气读下去，那个顺畅，那个美妙，那个幽默，那个精湛，真有千里江陵，奔流而还的痛快！特别是“我们是不畏虎的年轻人”那段，我讽诵再三，不忍释手，读过的人，都赞叹不已。直到批李一哲高潮起，不少人争睹李一哲风采，据他们（还有她们）说，就是冲着“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来的。

恩格斯在评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时说“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它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郭鸿志美文学的序言先声夺人，为李一哲赢得了重要的一分。

陈一阳也在吸收李正天原文关于健全，加强法制的思想的基础上，改好了第六部份。

接着，便是统一的理顺和润色定稿。我们以为四届人大近在眉睫，大字报必须抢在它的前面上街。于是郭鸿志把他的两个小女儿移往他处，我们三人干脆吃住在郭家，通宵达旦地改稿。增补越来越多，稿子越积越厚，颇有些失控。我提出了“谁执笔谁定稿”的最后决定权原则，大家都同意。由于“李一哲”文章几乎全部由我执笔，（只有《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全篇由陈一阳写成）我便当然有了最后决定权。（陈一阳对第六部分，郭鸿志对序言都只算作增补修改）。

关于林彪体系的一节，陈一阳也写得相当漂亮，充分发挥了他文章声调高亢，恣肆汪洋的行笔风格。一九七九年李一哲平反，《中国青年报》发消息的同时选载了《民主与法制》，编辑青眼独钟，就是陈一阳的这一节。

当然，更重要的不是它的美文学方面，而是它对统治中国政治、思想的那些牢笼的摧枯拉朽的冲击，震撼和挑战。

我们第一次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介定为“维护封建礼

治的神圣支柱”，主张必须打翻这条支柱。后来，广东省、市委为李一哲罗列的罪状，这是第一条。

我们主张“恢复大字报的革命权威”，主张人民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牢牢掌握这个重要的人民民主的武器；

我们主张宪法确认“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

我们主张，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这就是说——宣集文也看出来了一——我们主张取消“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因为不取消“反革命宣传罪”就根本不可能有言论自由；

我们主张反对腐败，限制特权，主张用法律保障工人、农民的物质利益；

我们指斥“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理论家，你们的“研究儒法斗争”“到底想把火往哪里烧？”鲜明地亮出我们保卫周恩来的立场；

我们呼吁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包括赵紫阳、焦林义），不要跟江青走，不要忘记了庐山大笑话的教训。

我们在中国，作为民间的反对派，第一次公开讴歌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我们预言，“一个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这就引起了官方极度的敏感和恐慌，他们为李一哲制定的第二条罪状就是：“妄图煽起一个‘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他们说对了。大字报一年之后，这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终于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发生——这就是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使君临中国二十七年，以为十亿人民都是只会喊万岁的毛泽东在他临死之前领教了一次人民的打击。从此，挣脱了官方控制的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就不顾任何的阻挠和镇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了！

定稿在十一月七日。我决定把它署作第三稿。因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制》无论去年稿还是今年稿，都只是我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那篇对《南方日报》12·18文章批评的延长和发展。为了表示对林彪垮台日的庆贺，我将初稿日期署为：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但那时，我实际尚未认识郭鸿志，与李正天也是文革别后初见一面。

我把稿交陈锦禄，由他组织人在“442”紧张抄写。按后来市委运动办统计“共六十七张白报纸，二万六千多字”。然后又交水产系统工人张家齐刻印。李正天书写标题。

“442”的工人活动分子，大多读过《民主与法制》，现在听说要把它公布出来，都非常积极。张贴大字报的那一晚，“442”倾巢出动，建工局工人踩来了几辆三轮车，装载浆糊和梯子，人们一涌而上，浩浩荡荡开向北京路。李正天负责指挥张贴。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拦。张贴完，已是凌晨。我回到“442”休息了一下，天一亮，便骑车回到了石井农林水干校。

十五、迎战数百万人的围剿

第二天，农林水干校就听说了北京路出现了一张很轰动的大字报的消息，人们纷纷议论，并不知道我就是肇事者之一。但大多其实还没有看过，只是从听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题目中想像它的内容。众口一辞地说：“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不久，水产局政治处的负责人专程来找我，他是来告知我，李一哲大字报已被省、市委认定为反动大字报，即将开展对我们的批判。他问我的想法。我现成地回答说：“好，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他倒笑了，说：“现在不是跟你们争鸣的问题而是批判的问题了！”看来，他以为我尚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质。但是，他不了解王希哲。对王希哲来说，这等的批判早已是置之度外了。在决定把大字报抛出去的前夕，在莲花井的一次讨论后，陈一阳问我：“你有坐牢的思想准备吗？”我答：“布朗基能够为法国革命坐38年牢，难道我们连这点精神也没有吗？”陈一阳听完后说：“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不但王希哲如此，也许是经过了半年批黄运动的锻炼吧，李一哲核心分子以及团结在它周围的“442”工人，面临即将到来的压力和风暴，每一个人都显得那样从容和自信。他们到筲箕窝游泳，他们到植物园怡情，谈笑风生，没有一丝的恐慌情绪。

不但如此，意料之外的是，李一哲团体还因批判迅速地扩张了。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除了署名“梁断元”的批判文章外，周围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支持小字报和纸条，批满了各色要求的字句。群众急切希望得到文章的油印本。但是我们没有经费，没有纸张，我们只得贴出布告，呼吁捐献，“多多益善，少少不拘”。捐献地点和人物为美术学院李正天。我们不能让“442”过于张扬，刺激省、市委早对他下手。这样，李正天便成了李一哲对外的公开联络人。

李正天美院宿舍每天门庭若市（他的第一位女朋友张果娃便是此时相识），雪片般的书信也向美院寄来。李正天把这些信件都送给我过目。我选其中有知识有见地的信件要李正天给他们复信，并邀请他们某时到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召开讨论会。他们大多来了，相熟以后并经常向我们提供消息和参加讨论，结果在省委32办（李一哲审查办）的眼里，他们也变成了所谓“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分子。雄鹰糖果厂女工龚小夏就是这样来到我们中间的一位优秀的女孩子，时未满二十岁。今天她是哈佛大学博士学者，著名人权活动家。

杨万翔也参加了讨论会，他怀疑我们对18号文件的评价过于乐观。在我们的大字报里，似乎毛泽东批示了18号文件后，大字报这个武器在人民手里便必定成为了绝对的、永远不可剥夺的了。杨万翔说，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这个权力是共产党给你的，那末它就随时还可以收回去。这是真知灼见。我也并非不理解，但那样写是为了在贴——撕大字报拉锯战的关头，尽量夸张18号文件的地位，助我声势，借以打鬼。

杨万翔有幸言中。六年后，修改宪法，最彻底、最干净地剥夺了人民手中贴大字报权利的，倒不是被咒为反民主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分子的林彪、四人帮，倒是号称为开明改革派的邓小平。

杨先生今天是广东省著名作家。

另外，还有许多今天不便指名的优秀的“李一哲分子”，他们今天都各自在共产党肯定的或否定的国内外社会岗位上，为祖国民主、光明的未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虽然大批的纸张已经送到李一哲的手里（特别需要感谢的是员村工业区工人头头黄铭新、张志强等），但现在已经用不着油印了。李一哲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成千上万册李一哲大字报已经漂漂亮亮地印刷了出来，伴随着省委宣传部化名“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下发到了全省全市的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街道和农村生产大队。广州市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不甘于后，也加了按语大量印刷，下发到基层。人们的记忆里，这般规模印刷小册子下发基层，除了1966年的《毛主席语录》便只有此了！广东省、市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一夜之间成了“批李一哲办公室”了！

言犹在耳，口唾未干，赵紫阳不是刚说过：批林批孔要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孔老二么”？究竟周恩来是“孔老二”抑或李一哲是“孔老二”？

一九七九年二月，广东省委为李一哲平反时，某些人为自己辩解说，那时因为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决定批判李一哲是为了稳住广东局势”。

好一个“稳住广东局势”，那我要问，李一哲大字报“出笼”之前，批判之后，广东局势你们自然是稳住了的了。但在这“稳住了”的广东局势下，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特别是广州市委焦林义们干了些什么？你们在你们控制的《广州日报》上向四人帮作了多少“反革命的呼应”（用你们喜欢用的词汇）？

李一哲大字报揭露四人帮的“反复辟”、“反回潮”，第一条证据就是：

“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前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进入‘复辟的年代了！”

然后，四人帮树了个黄帅，你们就亦步亦趋树了个辛若愚，“大乱”广东教育；

四人帮批“黑画”，你们也跟着批“黑画”；“大乱”广东文艺；

四人帮树了个“反潮流”的钟志民，你们也跟着树了个要求上山下乡的王东，“大乱”……；

四人帮吹捧武则天，你们也在报上大捧武则天，鼓吹女人当皇帝，“大乱”……

四人帮批孔影射周恩来，你们也影射周恩来；最后，王洪文搞第二武装，成立上海民兵指挥部，你们也声言以上海为模式成立广州民兵指挥部，你们跟得好紧！

李一哲不准你们“大乱”广东，揭露了你们，警告你们不要跟四人帮走，你们恼羞成怒，为了向四人帮表忠，你们才按照他们的指令，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发动了那样大的规模来批李一哲。所以，我们说，如果赵紫阳的转向批李一哲是为了向四人帮搪塞交帐，焦林义的批李一哲则完全是为了向四人帮的表忠和献媚。在批李一哲过程中，我们切身感受到，凡来自市委系统的批判，都特别凶狠，都带着报复式的咬牙切齿的仇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赵紫阳一离开广东，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焦林义就要与那个同样被李一哲痛斥过的广西屠伯韦国清勾结，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了。

铺天盖地的批李狂潮终于迎面压过来了。从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三月，广州的各机关、工厂、街道、学校，甚至从红色的宾馆到黑色的殡仪馆，都气势汹汹地拉开了批李的架势，到处可见批判《民主与法制》的墙报。“民主与法制”本身似乎成了“反动”、“复辟”的同义语。面对几个孤立无援的青年，宣集文在他的《再批判》一文中欢呼道：“‘李一哲’今天受到广大人民理所当然的反击，几十万、几百万人民起来批判李一哲的反动大字报，就是好得很！”

先是李正天，然后是陈一阳，被上百次押送到各大厂、各大学、各机关进行批斗、“辩论”。赵紫阳下令允许他们讲话，允许他们反驳；下令大学驳不倒李一哲不许毕业，——“辩不过李一哲不要紧，输了好好读书，再辩，再读书。”于是，武斗殴打倒不多见，多见的是批斗前一次又一次的彩排，一次又一次地闹笑话。

部队也参加了批斗，但却拒绝呼喊“打倒李一哲”的口号。因此，凡有部队参加的批斗会，气氛便不甚激烈。这可能曲折反映了许世友的态度。

奇怪的是，王希哲却被放了过去。除了本系统的几次小规模批判会外，只是办“学习班”。这是因为赵紫阳发了话：“对王希哲小会帮助”。广东省委对李一哲组织批判的一个机密的策略指示，被热心人送到了他们手上：省委要求对受李一哲蒙蔽的群众，要尽力争取（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李一哲核心人物也要尽量分化。王希哲便是分化对象，因为王希哲的成分是工人，工人介入了李一哲的核心，在他们想象很可能是被裹胁的，受蒙蔽的。

省委错误地判断了王希哲在李一哲中的地位，制定了一条注定碰壁的错误的方针。也许是它的情报部门的失误，也许是它根本不相信王希哲这样一个锅炉工人会在李一哲中处于决定性的领袖地位（后来习仲勋又一次犯了这个错误，他以为抓住了李正天就抓住了李一哲），无论王希哲怎样向省委声明，自己应首先向大字报负责，省委都不改既定方针。后来，王希哲企图以大字报声明的方式，公

布自己应对大字报负首要责任，受到了陈一阳的劝阻。他认为王希哲保留下来也好，可以有充裕的时间起草反批判文章。我只好在第二线不停地挥动我的笔作战。

宣集文的文章一出现，我便起草了《反挑战书》，表示应战。

一开始，我打算以中共对苏“九评”的方式来进行全面作战。它可以抓住一个个主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写了一评《吓人战术》，利用毛泽东引用的鲁迅的话“辱骂恐吓决不是战斗”，先声夺人，剥去了宣集文可以依靠政治权势压人的优势，在人民面前迫使他与我们进行平等的论战，否则便是“辱骂恐吓”。此法大有奇效。果然，宣集文的“再批”，“三批”，政治帽子便大为减少，理论驳难显著增加。这为我们争取到了主动。

然后，我起草了二评《请君入瓮》，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让他们也尝尝“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滋味。因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中”和“中国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是毛泽东说的话，一个出自《井冈山斗争》，一个出自与斯诺谈话。宣集文和市委批林批孔办可能没有看过，可能看过忘了，竟批判为“胡说”和“恶毒攻击”，被我捉住。这是为下篇文章作铺垫。第三评，也是最重要的一评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回答的就是李一哲大字报的头条大罪：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介定为封建性的礼教原则和维护林彪体系的神圣支柱。

第四评《杜冈的把戏》揭露宣集文先歪曲我们的论点再加以“批判”的伎俩。

第五评《论无产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权阶层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上述几评之后，各处传来了信息，得知省、市委很快就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不让我们再讲话，再发布反驳文章了。那时，我正在沙面医药工业局办学习班，（鱼肝油厂划归为医药局），为了赶时间，抢在“封口”的前面，我只得一面“办班”一面赶写《二十五个问答》，作一揽子的打算。这些问题，都是李正天、陈一阳开完批判会后，回来把会上提的问题交给我和郭鸿志，过滤后，择其要者作答的。

主持学习班的是局党委书记方扬和厂政办主任潘宏连。应该说，潘主任心里对我是同情的。他从来没有表示赞成过我，但也从未压迫过我。即使奉旨办事，将台湾赞赏我们大字报的报道拿给我看，作我的“感化”工作，（那时我才知道，外界把我们视作林希翎的继承者）也并不强迫我表态。他发现我一面“办班”，一面写反驳文章，也只是摇头笑笑，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后来曾告诉我说，自“九·一三事件”后，他便什么也不再相信，只相信他自己了！

《二十五个问答》，我全面回答了宣集文和大批判的责难，我还坚决回击了对李正天个人品德的发难。

原来李正天大批斗里忙里偷闲竟携张果娃去街上“拍拖”，地颇偏僻，是否

确有亲昵表现，各有说法。不料被尾随人员拘入派出所。宣集文时已伎穷，闻之大喜，即造谣，说是李正天的“流氓行为”事件，企图从人格上涂污李一哲。我愤怒地反击道：

“李正天与一位女同志在街上走，你们若不是孔孟贤孙，又为什么说不可以呢？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李公朴，造谣说是‘桃色事件’；你们绑架了李正天，也造谣说是‘流氓行为’你们不喜欢国民党，但你们为什么总要学国民党特务呢？”

从各处传来的批判会的消息，大多反映良好，但也有不少朋友的评价，说是很不好，李正天、陈一阳常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扯皮，有时迹近无聊。只是人民群众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者的天性，才总在传说中为他们增添上胜利的光环。我很着急，每当碰头都劝他们不要纠缠枝节问题，什么坐凳问题、喝水问题，什么“五谷是哪几谷”的问题，沾沾自喜，而是要抓住还能说话的机会，把理论问题展开去，就象我们的那些反批判文章一样，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心，李正天较能接受意见，陈一阳则很困难。这时我逐渐发现，陈一阳我看错人了。他并不是一个坚定无畏的战士，而是一个痞气很重的人；李正天虽然坚定，但由于《民主与法制》毕竟不是他本人思想逻辑的产物，故也难以应付裕如，滔滔雄辩。我几次潜伏进会场（如中大、党校）企图伺机跳上台亲自答辩，却都不幸被人认出，押出会场去。

但无论怎么说，广东省、市委发动的对李一哲数百万人的围剿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它不但没有屈服李一哲，相反，随着这一围剿，李一哲大字报在南粤各专区（包括海南）、县都张贴，流传了开来，并很快传遍了全国。它不但鼓舞了人民与四人帮斗争到底的勇气，甚至，它的序言加正文的格式，也成了后来许多志士仁人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的写作范本了。

七月中旬，省委发布了对李一哲的处理决定：李正天发配粤北石人嶂钨矿接受工人再教育，陈一阳发配九佛农场接受再教育，王希哲留本厂劳动，接受工人监督教育。就此，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半年之内，政府率数百万人挟万钧雷霆之力与三、二个小人物论战的奇观，降下了帷幕。

四年后，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在李一哲、宣集文双方都到场的一次座谈会上对宣集文主笔林江说：“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

十六、沉默中的期待

李一哲被处理前夕，“4 4 2”便被警察查封。六月，陈锦禄遭到了拘捕。他是“李一哲集团”第一位被难者。

“4 4 2”对李一哲大字报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了它，李一哲才可能联络各方面的工人、干部，取得他们的帮助。并扩展自己的影响。陈锦禄从头至尾负责“4 4 2”的全部事务，首先选择从他下手，显然，政府企图以他为突破口掌握李一哲更多的“内幕材料”。

当然，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的全部活动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是说要做“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吗？但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光明正大，问题在于，只要共产党的审查机关认为有必要，他们总能从他们的猎物口中按照他们的意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除非这个猎物是一位极其少有的非常坚强的人士。我后来那样赞赏香港刘山青先生，也是因为如此。

陈锦禄就是这样一位坚强的工人。我们能够感受这一点，因为李一哲无论在狱外、狱内的那几年里，从未受到过来自陈锦禄的假口供的压力。但我们无力营救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刚动完肾结石大手术的朋友，遭受炼狱的折磨。这一年的四月，苏江终于从惠阳山村招工回到了广州。自一九六八年六月，我与她在红花冈建立爱情后，旋即流亡武汉，七年过去了，流离颠沛，终得以聚首。虽然，苏江曾利用回广州度假，短暂介入过李一哲的专案调查活动，但在农村，则是保密的。不料，批李一哲浪潮刮到了这个贫穷、偏远的山村。她的老同学，同食同住七年的好友甄某被迫交待了她本人，特别是苏江与我的关系。结果，朋友反目，苏江也留至最后一人才回到了广州。

李大姐建议我们“把婚事张罗了”。陈一阳从九佛逃亡隐匿北京，行前也留下信，祝我们幸福。但我们无法结婚，因为没有自己的窝。那是一个住房空前紧缺的年代。珠影曾盖了二幢新楼，但那时正在批李一哲高潮中。我父亲对我说，“儿子没地方住”这个问题，他甚至连提都不敢提出来。不过，他还是很热心于我结婚。在他看来，我成了家后，也许便可以“安定团结”一些了吧。他愿意出钱帮我们买一套房子。但广州之大，哪里有房子可买？我们在河南、东山、西关都看了几处，都是贫民窟似的旧屋，肮脏不堪。此事只好搁置下来。直至1975年底我们结婚，仍是无房。

这一年的中甸，以电影《创业》编者张天民给毛主席信肇其端，中共中央发生了调整与反调整文艺政策的争论。跟踵而来电影《海霞》又起风波。导演钱江不堪忍受江青的欺侮，愤而南下广州，以到从化疗养为名避难。

钱江夫妇到了广州，住进了珠影招待所，吃则在我家。

钱江和他的姐姐黎莉莉与我父亲虽是远亲，但在三、四十代，因共同的电影事业和共同的艰苦生活，早已结成了兄弟姐妹般的亲密关系。他们的下一代，都

互称对方为干爹妈。我儿时亦称钱江干爹。1966年到京，因久不见，不甚习惯，改称钱伯伯。此次他们来广州，自应住进我家，但以我家之蜗，哪里有他们住的地方，只好移尊招待所。

钱江沉默寡言，不善多谈。戴一顶呢干部帽，耐心坐着，等待吃饭。他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史平则滔滔不绝，多所教诲。我父亲已与他们谈过我的事，故史平是开门见山：

“我们早听说过你的事了。……造反精神还是应该有的，你钱伯伯就有造反精神。他认为江青同志对《海霞》批评不对，一封信就写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同志说他没良心。怎么没良心？八个样板戏搬上银幕，一大半都是你钱伯伯拍的。想了多少办法来拍好它！……不过，要有个界限，这是党内问题。你可能没有掌握这个界限，有点越了界！是不是？以后要多注意一点哩！”

我乖乖听着史平阿姨的话，没有作一点声。他（她）们是长辈，我不能太唐突了他们。在长辈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何况他们也自有他们的道理，不妨虚心听听。

广州几天后，他们便去了从化。之后，北京不断地有人来催他们去。回去的目的自然是接受批判，二人不肯，就这么拖着。

1976年4月，由南京发轫迅速向上海、北京蔓延的一场伟大的四·五运动发生了。官方称之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海霞》原来的支持者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垮台，原来的平衡被打破，北京方面对钱江的态度严厉了起来，催他回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北影厂长汪洋与珠影领导数次找到我父亲，要求他去动员钱江回京，说是钱江就听他的。我父亲没有主意，回家问我怎么办。我说：“他们催钱江回去，把底交给你了没有？”父答“没有”。我说，“那好，你就装糊涂，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先答应下来，张罗钱江回去。到真该回去的时候，就跟医生打个招呼，说钱江病又重了，动不了。反正钱江的事，医生多少知道，会同情的。然后，你又去跟汪洋求情，推说医生说病重就行了。”

我父亲果然照办。就这么又拖了三、二个月，直到汪洋在电影局严令下，带着医疗人员，配备氧气袋，亲自把钱江夫妇押上飞机送回北京为止。他走后，留在我家里的，还有他在从化搜集制作的根雕和他告诉我准备送给“小海霞”的礼物。

钱江夫妇的遭遇，更加深了我对江青一伙的憎恨。他的儿子八一来广州探望父亲和他的干爹，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他向我谈起了周总理的死和焚化，说起了江青的跋扈以及北京人民的悲哀和愤怒。他向我讲述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天安门事件的故事。他说的许多故事我后来都淡忘了，但有一句话我一直都记住了，他说：“你看着吧，快了，快了，很快就要变了！”这震撼人心的期盼我知道并不是八一个一个人的，它代表北京人民的盼望，全国人民的盼望！

但是，这期盼只能如岩浆，在地下运行。地面上，仍是一片白色恐怖。天安门事件后，“打倒邓小平”，“愤怒声讨反革命”的声浪甚嚣尘上，全国各大、中城市上亿人次连日示威游行，拥护四月七日中央的两个文件。焦林义的“上海”民兵游行之外，荷枪实弹，巡逻警戒，严防着“阶级敌人”的动向；报纸、电台、文艺演出，中共控制的一切宣传机器都在呼喊镇压。我最能记得的是姚锡娟、陶令昌在电台的一首对口朗诵，愤慨激昂，高音大喇叭把它送进了每个工人、市民的耳里，大意是：

“快，快，快集合起来，
拿起棍棒，
我们奔向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毛主席检阅亿万革命大军的地方，
岂容一小撮暴徒逞凶狂！
……”

姚锡娟不说它，陶令昌是一九六八年底护、资助我北上避难的恩人。他的这段朗诵，格外令我痛心，就象那棍棒，棒棒都打在我的头上。

厂子里也加强了对我的控制，我不时地被叫到政办问话，告诫我“认清形势”。批李运动中，他们早已了解我拥周反江的政治态度。一次，又把我叫去，问我是否看到过“总理遗嘱”？

我说：“看过”。

他们紧张了，问：“在哪里看到的？”

“在越秀山上”。我答。

“越秀山上？怎么看到的？”又问。

“中山纪念碑上刻着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李一哲已被遣散，“4 4 2”工人也已星散。我无处发泄自己的愤懑，更无法发出任何抗议，举目四望，到处是随波逐流的人群。但是，地火毕竟是在运行。这时，有一个人给了我惊心动魄的鼓舞。此人无论寒暑，每天大清早，都背心短裤，在新港路上长跑。他叫刘国凯，原红卫兵广州兵团司令刘国旋的哥哥。一天，他忽然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对我说：“改良是没有用的了！要学孙、黄，不要作康、梁！记住！”他不待我作答，便又远远地跑去了。

——“不要作康、梁。李一哲是康、梁么？孙、黄又怎么作？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可能么？”

但那时，因天安门暴力镇压引起的心理抗拒，在一些青年秘密小团体中，确实流行起了一种以暴抗暴的情绪。珠影老导演蒋锐的儿子蒋学峰带我习武，说是

现在民兵警察手持棍棒是随时可以打人了，“官府在远，拳头在近”不能不习武相抗。他介绍我认识一位青年功夫教头于某，于和我交谈，很赞同用暴力来推翻毛泽东。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极右的团体，与我不合。但学点防身术，确有必要。便拜师于某学拳。

于的家门是“北少林”。他教我说：“拳是两道门，全靠脚打人。”他摆好架势让我扑上来，然后飞起一脚踢中我的腹部，我哎哟一声，半天不能站起来。他一般带我在越秀山“总理读书处”和流花公园练拳。同时，他还经常带他的一群徒弟、徒孙与其他家门的团体下了注在兰圃清真墓比武，戴上自制的护甲和手套，常打得牙齿脱落，满脸是血。打赢了，得了钱便大吃一顿。而他的“北少林”是经常赢的。我过去的学“龙形”、“白眉”的朋友听说后不服，来约于某较量，却都为他轻易击倒。

这之后，我的一些“李一哲”朋友徐向东、郑锦林等，甚至我的一些工友也跟着我向于某学起拳来。我们利用渔轮厂的钢板，也自制了护甲。这一来，工人中流传起了笑话，说是“李一哲转向武装斗争了”。我一听，心知不妙，官方的秘密警察是决不会把它当笑话的。赶紧离开了于某。徐向东等则继续跟他学拳。后来，于某去香港开了武馆。蒋学峰、徐向东则去了加拿大开了武馆。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我的儿子船船降生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谣言”还在紧张进行。我为船船取名“怀舟”，取怀周之意。父亲得知，赶忙压低声音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千万不要说出去！”但这个名字，我儿子后来似乎并不喜欢，因为我也没有料到，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一夜之间，咸与怀周，这个名字便颇显直白和通俗了。于是我答应：“你高兴改什么名字你就改吧。”

十七、转折的牺牲品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骄横颀颀的四人帮终于走完了他们的末路。但他们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叶剑英收拾了，使我意外。毛泽东临死前说，“恐怕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他把拥护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四人帮也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他们恐怕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竟会在一夜之间被叶剑英一锅端。事实表明，他们的“武装上海民兵”“与走资派斗争到底”不过都是虚张声势，适足为他们的敌人提供把柄，证明其后发制人罢了。

不过，人民对四人帮的垮台是高兴的。欢呼的大标语、大字报立即布满了全城，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四处传抄。许世友挥着小纸旗，摇摇晃晃，快快乐乐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虽说游行仍是官方组织的，但人们内心的兴高采烈则是无可置疑。即使在“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下，暗示为邓小平不平甚至为李一哲说话的大字报，也渐渐地出现在街头。

莲花井又一次热闹起来。虽然郭鸿志、李秀芳随省电台工作队已去了增城搞社教，但李老太太在。她并不妨碍我、龚小夏、杨万翔、张家齐、莫庆梁等又经常地在这里聚首了。陈一阳也从九佛回到广州。我们考虑在目前形势下，李一哲是否应站出来，对去年广州的批李运动作一个评价。

新“李一哲分子”都很兴奋，希望站出来。我也倾向站出来。我认为，华国锋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了四人帮，但他的地位是不稳的。他的地位的唯一合法性的依据是毛主席写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但是四·五以后，人民对毛主席本身都不放心了，又怎么能根据这一点对他放心呢？因此，华国锋势必要在宣传自己正统性的同时，竭力扩大支持自己的力量。这就必须要放弃批邓。批邓和批四人帮南辕北辙，势如冰炭，根本不可能同时进行。但放弃批邓，又要使他冒放弃“按既定方针办”的风险，这又势必影响他的正统地位，两者权衡，他可能还是会逐渐放弃批邓。李一哲若站出来，就应该声明我们的立场，坚决主张为邓小平翻案，以推动形势的发展。

我的分析很得杨万翔的赞同。陈一阳则不太同意，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国家政治形势急剧转折时期，历史上任何一个转折时期都是要杀人的。我们现在对华国锋了解不够。他到底对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他可能更看重毛主席的“遗诏”对他的保障作用。他可能正要找主张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开刀以证明他粉碎四人帮并不会动摇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故我们现在不宜轻举妄动，而应再观察一段时间，千万不要在这个关头，作了转折的牺牲品。

他的话令人毛骨悚然，但也不无道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共确在毛逝世后一段时间里，下达所谓《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对大批优秀的批毛人士进行了屠杀，著名烈士有王申酉、史云峰、苏选禄等人）故我也同意先观察一段再说。

我与他去了一趟增城，见到了郭、李。郭听了我的意见后，提醒我们还要多

注意叶剑英对华国锋的影响。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这个人年纪大了，老眼昏花，太宗死了后，他把真宗扶上龙床，还要左右再看二遍，看清楚没错了，才走下龙庭磕头。所以现在对待这个批邓问题，叶剑英肯定是很谨慎的，也赞成我们先看看。

他又建议我们去看看李正天，现在形势松动了一些，大概去一下也没什么问题，不会遭到拒绝。

李正天自去年七月送去石人嶂后，在批斗中被打得很厉害，到年底，简直失控了，他感到生命没有了保障，便深夜逃出，翻山越岭回到广州，直奔新河浦省委书记李坚真家，反映了被打情况，要求省委人身保护。李坚真闻知后说：“怎么能这样打人？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打人嘛！何况李一哲省委并没有定性是反革命嘛！”她即打电话给该矿党委书记林松，禁止矿里再打人，要他们派车将李正天接回去。

李正天这次潜回广州，又是黄铭新收藏了他。黄号称员村工人“及时雨”，名不虚传的。

李正天这次回去后，批斗从此便结束了。

莫庆梁恰好要去韶关探亲，便与我和陈一阳结伴而行。我们到了韶关，看到新闻，华国锋为毛主席纪念堂奠基。我们乘车到了始兴，却没有车去钨矿了，只好步行，跋涉二十多公里，黄昏时分到达石人嶂。

向矿上的人打听，得知李正天正住在医院。我们到达医院时，李正天正在吃晚饭，旁边一煲穿山甲。李正天见到我们，喜出望外，连忙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随便弄点吃了，没有吃他的穿山甲。知道这是他的营养补品。

他没有向我们谈这一年来，特别是去年他被斗、被打的苦况，这些对我们来说已是无需多谈的了。他特别感慨的倒是这里矿工劳动条件的险恶，劳动保护的落后和生命没有保障。“经常死人”，他说，“掉到井里摔死的，被石头砸死的。我都好几次差点死，好在还是工人保护了我”。他又说：“去年我跑回广州，李坚真不是让矿上派人来接我吗？就是来接我的那个叶培提，他是矿里专门负责管我的党委委员，回来不久就被矿里掉下来的大石头砸死了。我都在场。”我和陈一阳都倒抽一口冷气，这些是我们没有想像到的。

他又兴奋地说，李坚真说了话后回来，矿里的干部、工人都对他好了。四人帮垮台后，工人就对他更好了，简直就好像他已经平反了。他来这里住院，是医院朱院长主动要他来疗养的，朱院长也是矿党委委员，一直很保护他。这些穿山甲，也是医院的工人送来，帮他煮好的。“你们吃吧，吃吧！”他说。

看来，这里的干部、工人能够理解我们，这一年来，李正天与他们已经建立了信任的感情，我们也十分高兴。

朱院长听说我们来了，热情地为我们安排住处，邀请我们去聊聊。朱院长说，他能理解我们的大字报。现在矿里很信任李正天，已经不让他下矿，专门安排他做一些宣传工作了，现在就准备让他画一幅巨幅的毛主席油画肖像，开大会用的。过去一直没有人能画，李正天来了也不敢让他画。现在可以让他画了。

我们感谢了他对李正天的保护，他十分客气。

第二天一早，我们向朱院长和李正天告别。我们也告诉李正天，我们已与老郭商量过了，决定再看一看形势的发展，暂不采取什么动作。他没有意见。

我的厂里，也处处显现出“平反”的气氛。现在不但工人，连干部也开始从正面来理解“李一哲大字报”。潘主任告诉我，厂党委对我毛主席逝世以来的表现是肯定的。九月九日，全厂大会收听中共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是我带头起立向毛主席老人家致哀。厂党委认为我对毛主席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鉴于我过去早有入党申请的要求，他再次建议我参加党课学习。

我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在北京路一张不知名群众为李一哲伸张的大字报旁，我用小纸条批道：“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李一哲”

十八、黄华监狱的囚徒

陈一阳的预言是对的。华国锋在他转折的关头确是需要牺牲品。但我们都没料到，我们那样沉着，那样不动声色仍不能逃脱“牺牲品”的命运。一九七七年三月二日夜，我们三人，另郭鸿志也未能免，分别于各处遭到了逮捕。

我是回厂上中班时被捕的。有人来通知我，白厂长要我到厂部去。我上楼刚拐进大厅，埋伏门后的便衣警察猛扑上来，喝一声：“不许动！”将我按在地下，扣上了手铐。我第一次戴上这个著名的玩艺儿，一九六八年的那次，还没有领教过它，所以在等待他们搜查的时候，便很奇怪地欣赏它。它是不锈钢的。棘条的锯齿有如狼牙一般，可以一级一级收紧。当紧得我感到有点痛时，侍立一旁的制服警察笑了，说：“太紧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松一下？”他很客气。我也对他笑笑说：“谢谢，不必了。”

搜查完毕，我被黄夜送到了广州北郊的槎头看守所。

我珠影的家也遭到了搜查。甚至，我岳母的家也遭到了搜查。因为苏江生了船船后，珠影根本不可能住下，只好回娘家坐月哺乳。船船这时仅八个月，见到熟人，便咧嘴嘻笑，小手脚乱舞。苏江一家疼爱异常，特别是小姨。这小姨生性内向，讷言寡语，因王哥哥事遭此惊变，又继之以迫害，恐怖不已，遂致疯颠，这是后话。

关在槎头几天，没有人来问过话。静悄悄的整座大楼死一般沉寂。偶尔会传来“咣啷”一声响，那是上楼的铁门开了，有人来了。屏息听听，他会走到哪个仓口？即使不是自己的仓也好，因为总算听到了一点人声。孤独地关押在这囚牢中的人，是多么盼望听到一点人声啊！不但人声，哪怕窗外飞来只小鸟，瞪眼望着你，喳喳叫一叫，然后飞去，也是多么高兴！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抓我呢？肯定是李一哲的事无疑。但又为什么不来提问我呢？难道是为了灭口，要让我永远地消失在这监狱中么？李正天呢？陈一阳呢？他们也抓了么？还有郭鸿志。

家里人都怎么样了？父亲急病了么？还有苏江，她多么苦哇，还带着船船。船船学说话了么……

天黑了下去。第二天又亮了起来。

我究竟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早点看破红尘，象别人那样，作个逍遥派，去谋求个人的发展呢？是的，刚投身运动的时候，我很天真，不惜一腔热血，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现在看看，这个江山变不变色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何苦为它奋斗？何苦为它牺牲？算了，向他们投降了吧！写个投降书……但是，怎么写呢？

另一个王希哲起来反驳了。

怎么，你软弱了么？动摇了么？你要投降？你不是从英德茶场起，就认清了中国应走的道路——民主的道路，并决心为一个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么？这个民主的中国干“红色江山”什么事？你后来的反对林彪，反对四人帮，已不是因为什么“红色江山”而是因为人民的疾苦，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口号和政策下，受到的那样残酷的压迫和痛苦。为人民奋斗，为人民牺牲，为人民解除痛苦，难道不值得么？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都能作这样牺牲，你就作不起了么？你才关了几天？如果你也投降了，逍遥起来，对得起那曾跟随你投身文化大革命而去世的七位同学么？你怎么向他们交代？用什么告慰他们的亡灵？他们会诅咒老天太不公平，为什么不安排你去死让他们活下去？你就当作你早已死去了吧！当自己死去了，现在活着已是多余的，就一切无所谓了……

十二天后，一辆吉普车把我带到了黄华路看守所。我被关进二楼的第89仓。

和仓边路看守所一样，黄华看守所也是一座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老监狱。共产党接管后可能略事修整，但仍显得沉重、古老、黑暗。它座落在省公安厅的后面，西面是我的母校十七中，街对面则是著名的八一中学。

八一中学最严重的一次武斗发生在1968年初春。那天，一位梳短辮的外校女同学喘着气匆匆跑上井岗山大楼来找我。她叫王勇，也是“革命钢杆”的，原名苏穗英，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汉华的女儿。她说，她校的造反派已被主义兵包围了，正在攻楼，十分危急，她是突围冲出求救兵来的，要我赶紧派人去解围。说完便“腾腾”地跑回去了。我即令“文工团”（即所谓“飞虎队”）骑上单车赶去，大队随后到。但这却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仅二十分钟后，我们赶到时，主义兵已撤走，留下的只是她的尸体。在她翻墙冲回学校时，被凶手从后背插了致命的一刀（此人据说参军后被逮捕）。看着她浮肿的遗容，我深悔当时没有劝她随单车队出发。我立即派人把正在演出《红卫兵战歌》的乐队“劫持”过来，为她致悼送葬。那几天，我一直很悲伤，她生前最后一刻的影子老在我的眼前浮现。“飞虎队”的人甚至怀疑我是否爱上了她。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潜意识吧。

但这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我现在面对的是苏汉华下属的审讯。

二个审讯员，一高一矮，一个方脸一个尖脸。姓甚名谁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很热心地向我交待政策。“你还很年轻嘛！三十还未出头吧？小孩还小嘛！早点把问题讲清楚争取早点出去”。“讲清楚了，没什么问题了，就可以出去了嘛！”。

但后来我才知道，“问题”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材料是永远也写不完的。

当我不耐烦甚至略加抵制的时候，他们就会变过脸来：

“怎么，想顽抗？想把牢底坐穿？我知道，你是想学布朗基，坐三十八年牢是不是？”

嗯，这是谁交待的？是李正天，还是陈一阳？交待是什么意思，是想说明我们早已义无反顾了呢，还是想把我抛出去，说明我的顽固以邀功？

接着，又有一段政治“私房话”被抛出来，而这是只有陈一阳才知道的。我明白了。我对他们说，我早已交待清楚了，李一哲大字报从头到尾，负主要责任的是我。请你们从严处理我，宽大了陈一阳、李正天吧！

他们问，为什么你不把这些情况早告诉省委。我说，“我早告诉了，他们不信，有什么办法。你们搜了我最近的日记。但过去的日记，从英德茶场以来的，你们没有吧？在苏江那里，你去问她要好了。我写一张纸条给你们。”

仓里每天早上有广播听，中央台的新闻。也有报纸，《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二种。

从报纸上，我注意到，在我们入狱之后广州已经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那几个人”运动。即官方所谓的“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运动。“那几个人”报上一直没有点名。但我知道，那显然是梁锦棠、刘继发、孙亦武、周炎。赵卓云等人无疑。

这两派原势如水火的头头在一九七四年五月许世友、赵紫阳接见之后，便开始合流了。梁锦棠、孙亦武眼见王洪文以造反派出身升任副主席；批林批黄，许世友、赵紫阳的态度又特别倚重曾受军管压制的刘继发、莫竟伟等，深知原依靠的军管势力大势已去，孙亦武便声言，自己是“原东风派中的造反派”，要求与刘继发等“摒弃前嫌”。赵紫阳顺势为他们开办了“刘、孙办”。

“在野”的头头们也有联合的想法，他们在人民桥南洞天酒家吃饭，号称“洞天会议”，实现了沟通。这一行动，也确实保障了广东74年的批林批黄没有爆发派性的争斗。

这场清查运动从三月中旬开始，到七月中旬二次百万人大会达到高潮。从报纸的报道和连续的署名评论文章看到，这次清查有几个特征：

一，这次清查完全没有涉及李一哲，没有提到李一哲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黄运动中的表现。说明他们很清楚，李一哲不属于他们，即所谓“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只是到了年底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焦林义在广东省革委工作报告上方把他们与李一哲绑在了一起，说“他们还同现行反革命分子狼狈为奸”，“他们中有些人同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早有勾结”。“他们在省委、省革委捣乱，李一哲就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等等。这样，李一哲性质是反革命，他们不过是帮派分子，与李一哲“勾结”本身成了他们的罪状。

二，清查“那几个人”“大乱广东”的行为都发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前后，而不是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而全国各地帮派头头“大乱”某地，首当其冲便是一九七四年。原因就在于广东一九七四年批林批黄社会层面的运动，实际上被李一哲控制着，不允许跟江反周。这才引来了焦林义的妒恨。而一九七六年，李一哲已被打击得星散，无法对上层头头的错误施加影响了。

三，从整个清查看来，“那几个人”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言行，也

没有特别卖力批邓，他们不过是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趁势而起，企图在省委、省革委中多捞几个位置，巩固一下自己本来不太巩固的地位罢了。

但是，焦林义又干了些什么呢？前面我已历数，他在一九七四年亦步亦趋地紧跟四人帮，他在一九七六年又是发起游行示威，（许世友拒不参加）又是大会讲话，卖力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更是“大乱了”广东。可是在他的报告里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省委领导七六年的斗争也有缺点和错误”。一九七四年的反周错误呢？不提了！他为自己辩解说，他的小错误，是因为“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工具”。但是“那几个人”犯错误，不同样因为“四人帮控制了舆论工具”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他焦林义向四人帮献媚争宠，不许他人趁势向他争权，正如他批判别人那样，焦林义也不过是个“看风使舵”，“灵魂肮脏”的机会主义官僚罢了。

饿，饿极了。饿得想吞蚂蚁，想啃石头，想把一切可能压制住肚肠鸣叫的东西，都塞进口里。有几次，一转身，馒头不翼而飞。到哪里去了呢？仔细想，才怀疑很可能已吃下肚里去了！没有书读，每天就盼着那两张报纸，只有报纸来了，才能略为忘记饥饿的难捱。

李正天也许跟我一样。经常地都能听见他打门：“报告管教开广播”或者“报告管教发报纸！”他在第85仓。

傍晚，天渐昏黄，还没有开灯，我喜欢踱步，拉开嗓门一字一顿地朗诵：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李正天也常以陆游咏梅词大声相和。出狱后，他赠我一首诗曰：
“久与君相共，同仇斗玉龙，
开怀天下事，明辩九洲风。
宁舍新婚美，岂容老牝凶，
咏梅发肺腑，会意有亲朋。”

郭鸿志和陈一阳则很乖顺，从不发出任何声息。但我知道他们关在哪里，从他们的脚步声，我可以知道他们的提堂和回仓。

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审讯仍在不厌其烦地进行，而且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一位花白头发，中等身材的人常来审讯室压阵。他姓关，被称为领导。究竟是什么领导，始终不得而知。我问他，你们已经审查那么久了，问题应该是清楚的了，我们究竟在哪里犯了法？他答：“你们是在和共产党作合法斗争。”

这个回答很意外，也给了我很大刺激。过去，我们总是想，我们是在和林彪作斗争，和四人帮作斗争，从来也想不到我们会和共产党作斗争。我们是在和共产党作斗争么？共产党有缺点，有错误，出了坏人，人民就只能听天由命，不能和它作斗争了么？共产党过去骂国民党，不就是说国民党连人民的“合法斗争”也不允许，所以才是法西斯么？

但我没有用上面的想法来驳他，我还不敢。我问：“既然我们是合法斗争，你又凭什么来抓我们呢？”

他们哑然无语。

报纸上，新出版的《毛选》第五卷正在热热闹闹地宣传，我极力要求得到一本，终于如愿。

那时，出版毛选是华国锋地位正统的象征。毛选五卷在华国锋的鼓吹下又一次恢复了“红宝书”的地位。“英明领袖华主席”送来的纸版一到广州，郭荣昌、肖洪达便像藏民捧佛龕一般，在人群的簇拥下，从白云机场一直捧到了红旗印刷厂。

好了，这下我有书看了。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毛泽东仍保留在我心中的伟大地位，便轰然坍塌。

毛泽东对胡风案的专横，对梁漱溟的跋扈，对“右派”用计的阴险，都是令我震惊，令我难以置信的。我总以为毛泽东私心是一个崇尚民主的人，而文革以来把他神圣化、绝对化，把他变成一个不受批评的人，则完全是林彪和其他党内肖小的过错。虽然一九七五年底，对刘冰信件的批示已经引起我的怀疑，因为这是我看到的毛第一次公开宣告，他本人是不可侵犯的。但我仅认为，这是他晚年走向衰老后的难以避免的昏聩。现在我明白了，此人一登紫宸之后，便已是予智予雄，人莫予毒的了。固然，毛泽东思想也自有他的精华。他的精华几乎全在他的1935——1940年的文章中。那是他刚刚长征到达陕北，外尚立足未稳，内尚未最终确立自己党内的地位之时。他此时的文章多为论辩性的，是与人平等，充分讲理的。国内国外，条分缕析，非如此，他不能驳倒实力雄厚的党内反对派，不能赢得全党同志的信服而跟他走。此时毛泽东的文章，既已达到了它成熟的顶点，又没有一九四五年后的领袖气，更没有一九四九年后的霸道气和帝王气。

的确，“权力是能腐蚀人”的，它甚至连毛泽东的文风都腐蚀了。但是，为什么权力不能腐蚀华盛顿，不能腐蚀孙中山，却偏能腐蚀斯大林，腐蚀毛泽东呢？

四月八日，我略为注意到了《南方日报》上的一则消息：在国家领导层中消失了近二十年的习仲勋复出，担任了广东省委的第二书记。我没有过多地设想此事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因为除了知道他曾与彭德怀一起领导过西北野战军外，其他就太陌生了。

但五月的阳光已在悄悄地照射进来。

十九、冰川下的春潮

五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了党内改革派向凡是派斗争的第一步。从文章的矛头所向，我能够感受到它的份量。它是一九七二年以来，在中共的宣传阵地上，改革派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发起的第二次冲击。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曾经欢呼过一九七二年的那次冲击。无论如何，这一次新的冲击，其结果，必然对李一哲有利。

六月初的一天，变化开始发生了。我被通知收拾行李转移他处。

吉普车沿麓湖路转今天的广源路向沙河方向驶去。一年多没有见过这外部的世界了，啊，多么美丽——那山、那水、那草、那树！还有那左顾右盼，准备横过马路的姑娘，她们飘曳的裙裾，高耸的前胸，能使一个长年不见异性的囚人多么心醉！

车过了植物园，又过了龙洞，直到群山深处的一座监狱门前停了下来。这是柯木朗的广东省看守所。一九七四年批林揭黄时我就听说过它，受审查的高干就关在这里。

这里的仓房比黄华大得多，仓里还有一个水泥砌的浴池，这是黄华没有的。但蚊子也比黄华凶恶得多。大院和周围种满了各色蔬菜。整个看守所似乎没有关几个人。这从开饭小车停下的次数可以判断出来。院里有几个人在耕作，大概是留场劳动的“福头”。

当天我便知道了李正天也来到了这里，就关在我的左近。我估计郭、陈也必然来到了，只是他们仍不发出什么声音。

七月七日，王宁来柯木朗找我谈话。他是老资格的公安厅长。文革时，叶振光出任省革联接管公安厅的代表。他便是从王宁手里夺的权。那之后，砸烂“公、检、法”，黄华路随处可见“揪出王宁”的大标语，今日才得以识荆。他很胖，估计会有高血压，戴一副银边眼镜。

“怎么样？这里还可以吧？……嗯，总比黄华路那边好些。我也在这里关过呢！哈哈！”他说。

他在这里被关过我不知道。但他在被关的时候，饿得偷甘蔗头吃，我是听说过的。但是你在这里关过，难道我们也得在这里关一关么？

“王宁同志，我们被搞到这里来，也不审讯了，是干什么呢？审查那么久了，应该有个结论了吧？”我试探地问。

“让你们来这里好好学习一下。生活也改善一下。我让他们给你们增加点伙食费。有报纸看吧？亮亮的文章看了吗？”他指的是前二日报上发表的陶斯亮的

文章，《一封终于发出去的信》。

“看了。陶铸同志死得太冤枉了。其实，广东人民对陶铸同志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党中央已经决定为陶铸同志平反了，还有彭德怀同志。”

“哦！”我颇为诧异。因为就在前不久，我还读到罗瑞卿的大块文章，说是长征到会理的时候，林彪曾打电话“勾结彭德怀”向毛主席夺权，遭到了他和聂荣臻的当面抵制。“这形势发展得真快！”我想。那么，王宁为什么要向我提到陶斯亮的文章呢？是否一种对我们也将平反的暗示？我说：

“王宁同志，关于我们李一哲的问题，我想向你简单谈一谈，”

“好吧，谈谈吧。”他说。

回来，我反复思索这次王宁会见的意义。是谁派他来的？看来，象是习仲勋在进行干预了。但是，焦林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他不会那么容易让步，善罢甘休。我们还是要作最坏的打算，作长期的准备。学习？好吧，我早就想读《资本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读《资本论》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写信给苏江，要她即为我送一套《资本论》来。

关某为落实组织我们学习的指示，第三天把我召到了办公室。跟着，满脸胡子的李正天也进来了。我们高兴地握手，拥抱，互道问候。石人嶂一别，倏乎两年了，真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没有特别注意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也走了进来，戴着眼镜片用细绳子绑着，裤子也很拖沓。他脸无表情，木然地在我们身边坐下。我有点奇怪，这是谁呢？怎么也来这里？也许是个关了很久的老犯入吧？

陈一阳也进来了，又是握手，问候。

关某说话了。“前天，王宁同志找你们每个人都谈了话，要求组织你们学习。以后，你们可以经常出来一起学习一下，还打算适当安排一下你们的活动……”

他的话使我敏感起来：怎么，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头就是郭鸿志？那个肥胖得不亚于王宁的老郭到哪里去了？我愕然地死盯着这老头，辨认着。老头忍俊不禁竟“噗”一声笑出声来。这一笑露出了本相——他习惯地又用手虚掩了嘴，眼里闪出狡黠的光亮。

“老郭！”我激动地喊一声，捉住了他的双手。

陈一阳大惊失色，骇然站起：“啊？啊？你就是老郭呀！”

李正天则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倒是关某，若无其事地抽烟，注视着这场奇妙的“会师”。自那次数百万人的围剿后，这四人是第一次的会聚。

下午以后，形势就不同了。我们纷纷向关某提出了立即平反，释放的要求。李正天更激烈，声言若再长期关押，就会绝食抗议。

关某显然见这样“学习”容易出事，汇报上去了。从此，便没有再组织“学习”。

但就在那天下午，郭鸿志偷偷向我的裤兜里塞进了一张纸条，我至今珍藏完好——

“（我对韦国清提出申诉）上书、上街，出于对主席信赖，对广东存在的反周、叶黑线，至今怀疑”；

“五年来，我谈本是因多方面反了四人帮而受打击、迫害的案件”；

“看来，一直焦（林义）把持，变成一根搅屎棍。在省委内并非集体解决，而在市委则是一言堂”；

“现在可能是习干预的第一个步骤，……焦不脱手不会彻底解决，平反，最后难定，可大可小……”

他的分析和对前途的估计，与我还是不谋而合的。问题是习仲勋的背后还有什么人？习仲勋沦陷二十年后初到广州一、二个月，就敢过问、处理李一哲案，是否他南下时，胡耀邦或邓小平对他有过什么交待？（此事到现在我仍不大清楚）

最后，他附了几首诗，最好的是一首古体：

民主法制似幽灵，
飞出岭南回荡行。
万象纷纷归辩证，
眼前风景当年梦。
势不两立广州帮，
横拼一煲烹五羊，
瓦碎却飘贝叶香。

但是，当我正在大声讽诵“民主法制似幽灵，飞出岭南回荡行”的时候，一个简直难以置信的消息被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并登载在各大报上了。这就是七月十三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

这篇文章批评了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抨击了四人帮把专政指向人民的罪行。

这些年来，“民主法制”已经成了李一哲的识别符号，成了“反动”、“反革命”的同义语。但一夜之间，它成了正面的、革命的口号，成了中国人民理应争取之的理想！阴霾很快会被扫除了，正义很快会被伸张了。我想。

李正天按捺不住，宣布绝食，要求立即释放。四天后，他才在郭鸿志的劝说下复食。陈一阳则莫名其妙地疯狂起来，每天在仓内大喊大叫，胡言乱语。不久，被送去了槎头犯人医院治疗。

兴奋的消息继续传来。中山纪念堂召开因反四人帮入狱工人庄辛辛平反大会。李坚真接见了他们，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李坚真透露说，庄的平反遇到了极大阻力，直到“省委主要负责人亲自过问”，才得到了解决。

果然是习仲勋！

大局已定，我反而感到太紧迫了。因为我要求自己务必在出狱前，读完四卷《资本论》。我全身心地埋下头去读这本书。

伟大的马克思。这部书对我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是我从“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岭。如果说过去我还是被共产党驱迫着走的话，那末在此之后，我则是自觉地向黑暗走去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中所写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实际上，不过是我这段时间读《资本论》的笔记罢了。

决定我思想变化的主要几点是：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建立它的动机多么崇高，试验多么伟大，在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面前，它们都是要最终失败的。

二，“一国社会主义”或“数国社会主义”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斯大林设想的二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专政职能的基础是经济管理的职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个职能由组织生产的资产阶级来执行。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官僚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党官僚是这个国家生产的计划者和组织者，它就当然掌握了专政的职能。这个专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专制的，秘密在于它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须强制地去组织生产和分配，就在于它一开始就是用强制才建立了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改变这个制度，哪怕一个真心希望民主的“开明的”共产党领袖，也是无能为力的。而正因为越开明，他的结局也就越悲惨！监狱外面，冰川已开始消解，春潮已日渐澎湃。李一哲被捕后，被官方认作“李一哲分子”的成百上千的人士受到了牵连。他们或“办班交待”，或隔离审查，或拘押逮捕。习仲勋主粤后，特别是庄辛辛平反后，李一哲骨干分子们又开始在莲花井聚合起来，他

们上书习仲勋鸣冤，甚至再次把大字报贴上街头。但这已经是浪花了。真正的春潮发生在北京，发生在离中南海不远的一个叫“西单墙”的地方。

西单民主墙运动是四五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的骨干大多经受了一九七六年白色恐怖的考验，成熟而坚强。现在，为打倒凡是派和争取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他们又站立了起来，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姿态，不屈不挠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面前，从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她消灭了。啊，我当时要是跟他们在一起多么好啊！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终于走出了监狱。

二十、习仲勋的阳光

还是那么巧。十二月三十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开唐诗便读：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回环诵读，兴犹未尽。所长开门来了，要我收拾行李准备走。

“走？出监了么？”好，走吧，也该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车，送到了东湖公园的省委招待所。一会，郭鸿志、陈一阳也到了。

省委安排工作人员王大力住进招待所，负责我们的生活和联络。新华社记者雷力行也住进来负责进行追踪采访。

王宁到了。他不是召我们立即开会，而是坐在一边闲聊；美院院长胡一川、我厂政办潘主任、广播事业局局长李超、省委宣传部原宣集文负责人林江等，也都来了。

终于，省委书记吴南生走了进来，他矮矮的个子，布鞋，一身十分朴素的旧中山装，态度和气，说话带着显然的潮汕味。他满脸带笑地与我们握了手，问了姓名，便带我们进入了一间小会议室。

服务员送上茶和香烟。

吴南生先看看我们，说了点笑话：“我是在河南的时候，看到李一哲大字报的，那时想，不知写这些东西的又是何方神圣。想不到，现在亲自来处理这些事。”

他宣布，省委研究决定，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报平反。吴南生一条条地列举了李一哲大字报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议论。他还特别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责李一哲“为海瑞（彭德怀）落实政策”的要求。他说：“现在我们不是为海瑞落实政策了吗？……你们宣集文打不过李一哲。”他对林江说。我忍不住插话说：“南生书记，我们感谢省委为我们平反。但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大字报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反对四人帮，但也不可避免也会受到四人帮的影响。我们从大字报的一开始就宣布我们愿意听取任何人对我们的批评甚至批判。我们反对的，仅仅是用行政强制的力量，不让人说话，把人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抓起来。现在我们平反了，但我认为宣集文仍可以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继续辩论。”

吴南生点头赞许。他说：“对，共产党的耳朵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可怕的不是群众有不同意见，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原来是邓小平的

名言）。”

吴南生继续说下去。他解释了当初省委对李一哲性质作出错误判断的若干原因。我不满意的是听他说，批判李一哲是为了稳住广东。这显然是焦林义一帮的托词，先姑妄听之。

他特别提到国民党方面曾企图介入李一哲问题，曾派人来广州联络陈一阳相机策反，逃亡香港。

我闻之大骇（那时，这是杀头之罪），惊异地望着吴南生和王宁，说：“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王宁不动声色。吴南生说：“你是不知道，所以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如果你们是知道的，我们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这里了！”陈一阳默然不语。

这事，十几年后我才从叶振光那里知道真相：

国民党方面确曾通过1968年大镇压后逃亡香港的一些造反派人物，在一九七六年企图把我们李一哲接出去，作为“敌后代表”列席他们的第十一次大会。他们派叶振光的一个朋友到广州，在长堤的大公餐厅约叶振光会面，以同情我们遭遇为由，动员叶振光去探听一下我们是否愿意偷渡去港。但并没有把他们的真实背景告诉叶振光。

叶首先找到陈一阳。陈没有拒绝，说还需考虑一下。要求叶振光暂不要将此事告诉我和李正天。

安全部门获知情报，紧急收审了叶振光，然后逮捕。但我和李正天一直蒙在鼓里。甚至李一哲平反时，还有叶振光因我们事系狱，尚未获释，也不知道。李正天曾说，在广船殴打最厉害的那次批斗会上，有人前所未有地发言说，李一哲阴谋逃港投敌。李正天大怒，斥其造谣，与之争辩。但现在看来，此人发言，并非空穴来风。

吴南生说，现在正在搞右派摘帽，地富摘帽，很忙，下一步，准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问我们的意见。

我说，省委是为李一哲平反还是为李一哲集团平反？焦林义在省革委报告中把我们定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必定牵连很多人。因此，我主张平反的名义必须是“集团”。至于平反形式倒是其次。太忙，开个记者招待会，发面布个新闻，让我们讲讲话，都是可以的。

吴南生肯定这个意见，表示平反名义应该是“反革命集团”。

我又说，我不明白，焦林义在省人代会上把我们李一哲说成反革命集团，为什么下面的人大代表就通通举手，没有一个怀疑的，没有一个要求焦林义对李一哲为什么是反革命集团作出解释的。这样的草菅人命，他们是怎么作人大代表的。现在我们平反，他们同不同意？我想问问他们。

吴南生笑了，说：“王希哲，你怎么这么认真。那时的报告一读完，什么时候不是一窝蜂举手拥护的？谁还会去问个为什么！”

我固执地说：“这就是个教训。不然，以后还是这样么！”

吴南生一时语塞，打量我一眼，说：“王希哲，《水浒》上有个没遮拦穆弘，看来，你也是个‘没遮拦’！”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出去走动，以保证安全。

晚饭后，我们遵命没有出去，便相约到湖边走走。

东湖就象广州的“北海”，是一个向市民开放的公园，碧波一泓，垂柳习习。斜阳映下，九曲桥蜿蜒生姿。它的“中南海”则在东湖的东端，与二沙岛隔涌相望，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就驻节在那里。

我们兴奋地议论着过去的两年，商量着平反后下一步可能的情况。我发现陈一阳一直默默无言，显得萎靡不振，这才想起他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问陈一阳，为什么在见到了曙光的情况下，才精神失常。他说：

“搞政治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下决心洗手不干了！”

我一听颇为生气，责备说：“难道搞政治的可怕你是现在才知道的吗？难道你不是早已有了精神准备的吗？《民主与法制》里，‘林彪体系在威慑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弹等待着他们’，这些话不都是你亲笔写的吗？你洗什么手？难道我们的手是脏的吗？”

他仍是一声不吭，站在一边，裹了一件旧棉袄，可怜巴巴。

我感到心痛。想不到他会变成这样。我知道，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同学们面前，永远表现得少年倜傥，意气鹰扬，长歌当哭的陈一阳了！

为永远纪念那个少年热血的陈一阳，特录其一九七〇年《月下歌》一首以志之：

“少时与尔两人行，滔滔长言漫无间。几次沿江露大志，一夜沙面谈此生。话里都是热和血，心中最耻小人诀。

尔曾握我手，道是同向天下走；我曾扶尔肩，意欲革命同向前。谁知风雨里，哪里曾相识？珠海本来无大潮，湿身何必怕淹死！漫天任由风长吹，群山怎阻云横行？山号白云有几高？跌倒如何不爬起？

我辈总在斗中乐，一步一步坚向前。雄心勃勃欲何为？红旗之下一代人。昨夜梦中大笑醒，一片月色几颗星。”

第二天一大早，我决定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趟，不然，根本不了解外面同志们情况，怎么与省委谈判。

郭、陈尚未醒，我约李正天一起出行。前面说过，自我儿子船船出生，苏江便住回了娘家。她娘家在大东门，著名的农讲所对面。

我直向大东门奔去。李正天跟在后面非常吃力。我“腾腾”上了楼，敲门，报姓名。门一开，苏江扑过来，我们拥抱在一起。二岁的船船在一边，睁大了眼睛惊诧地望着这个闯进来的陌生人。

内室一瘸一瘸地走出一个病态的胖女人，面孔苍白，浮肿，向我傻傻地笑着，看得出非常快乐。这是什么人呢？我正疑惑，苏老太太在旁催她说：“快叫王哥哥啦！”我毛骨悚然。这一惊，决不亚于柯木朗初见郭鸿志。原来她是苏江的妹妹苏红。

苏红二十刚过。两年前是一个留着长辫，苗条美丽的女孩，中山五路百货商店的售货员。遭家不造，天降横祸。姐夫入狱，姐姐“办班”，不但即刻牵连她不能入团，还不时地上面来人逼迫她揭发姐夫和姐姐。她生性胆小，不禁风浪，怎受得起这般惊吓。不久便告精神分裂，日夜癫躁。家人忍痛将其送进了芳村精神病院。禁闭捆绑，服药打针。直如霜雪摧花，两年一过，美少女即成疯癫妇矣！熟悉苏家的亲朋都叹道，此事本应苏江当之，孰料桃代李僵，疯者竟是无辜的苏红。

事尚未止此。数年后，我再度入狱，苏红病又大发，痛苦不堪，遂仰药死。我已在《春寒》“祭红妹”中记其事，不赘。

我和李正天向苏家略介绍了情况，李正天便回东湖，我骑车到莲花井去。李大姐见了我非常高兴，说是已估计我们近日要出来了。她告诉我，因直接受李一哲牵连入狱的除陈锦禄外，又有杨万翔、郑庆和、黄铭新（后来知道，还有梁志泉）等。受审查的则有数十人。我让李大姐通知大家下午到东湖去。

我回来经中山五路时，看到满街的大字报。推车浏览一下，大多为要求平反冤案的。只有一份署名“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要求发展民主的讨论纪事，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怎么，广州已经有了这样的学会，并敢于公开发布自己的活动了么？他们又是“何方神圣”？形势发展真快啊！

下午，吴南生第二次与我们商谈时，“李一哲集团”远远近近数十人在外面已挤满了东湖招待所二楼。

我向吴南生描述了苏红的遭遇和惨状，他大为不忍，即表示回去指示商业局关心苏红，尽力为其治疗。

我进而说，受李一哲牵连遭到迫害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些可能比苏红更惨，请省委务必作好平反善后工作。还有杨万翔等尚没有释放，请省委立即释放。吴爽快地答应了。出来，吴南生握着杨万翔妹妹的手说：“你回家准备一下吧，你哥哥马上出来了。”

当晚，“李一哲集团”欢欢喜喜大聚餐于东湖招待所。饭费记在公家帐上。

我们以为春节前不会有什么动静了。不料，一天晚饭后，省委办公厅主任陈仲旋、秘书居立铭来东湖通知我们晚上不要出去，有首长要接见我们。

陈仲旋亲自前来通知而不是通知王大力，郭鸿志感觉很不寻常，他甚至猜测是否邓小平本人。在他看来邓小平在此气氛下出来见见我们，也未必是不可想象的。但我想还是习仲勋的多。

对习仲勋，我已是心向往之的了。不仅这次平反显然是他“解放”了我们，而且，他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红太阳照亮了陕甘高原》我在狱中看到，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有这样一个观点：不要轻易把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不满言论打成反革命。相反，要从这些不满中，把握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以改进工作。这样高级的领导人，在中共党报上主张这样的观点，是我所未闻的。读罢这篇文章，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位和彭德怀一样的少有的正派的共产党人。

在文中，他引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故事：一次，子长县打雷把县长打死了。农民可高兴了，但又惋惜：“怎么雷没把毛主席打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此话的“反动”、“反革命”是百死莫赎的了。但习仲勋提到，毛主席正是从这些不满言论中，发现了共产党政策的偏差——公粮征得过重，予以纠正，才重新赢得了人民的拥护。

其实这是习仲勋借毛泽东的口讲他自己的话。因为毛无论当时是怎么说，怎么处理的，但他一直对此事是耿耿于怀的。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合作化，他还好几次从负面提到陕甘宁农民对征公粮“哇哇叫”，要求“施仁政”的往事。他的意思，农民是不应该“哇哇叫”的，更是不应该诅咒让雷把他劈死的。

但习仲勋记住了这个故事，乐于提起这个故事，说明他心里是有人民的。所以我非常喜欢习仲勋，非常盼望习仲勋的阳光也能照亮一下南粤大地。现在，他的阳光就在新河浦那边，马上就要照过来了，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习仲勋满脸堆笑，一个一个和我们握手。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显得体格硕壮宽大。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陈仲旋才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省委东门外会议厅。但习仲勋仍然精神爽朗，红光满面。

吴南生向他介绍了我们。习高兴地说：“怎么说你们是反革命呢？我看你们都是好同志嘛！”

郭鸿志一笑说：“习书记，你看我们模样像好同志，可别人怎么看我们都像反革命呢！”

郭鸿志见到习仲勋显得有些激动。令我惊诧的是，他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孩

子。他几乎是抽泣地向习申诉了宣传部和广播事业局某些人近年来对他的迫害。他说：“刻骨仇恨。是的，我对他们就是刻骨仇恨！”习只得以自己因《刘志丹》小说，遭迫害事来开导他。

习很健谈，而且似乎很愿意炫耀自己的过去。他很高兴我们的年轻。他提到他也是十七岁时，就担任了陕甘边苏维埃的主席。

我向他提到了那篇《红太阳》的文章，提到了那个打雷的典故。他更高兴了，说，“是嘛，是嘛，怎么好随便把人说成是反革命呢？过去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应该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

他又说，“最近区庄那里有人贴反动标语，要打倒共产党。我说把它撕下来就行了，不必去追查。贴这么个标语就能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啦？共产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我听得津津有味。

我和李正天向他谈到了一九七五年的“批李运动”，我说，赵紫阳同志实际是保护我们的。我们打算在正式平反前给紫阳同志写封信，表达我们的谢意。习非常赞同。

这次接见愉快地结束了。

对于省、市委中必然存在着一种抵制我们平反的势力，这是我们预料到的。我故意避开焦林义向习仲勋赞扬赵紫阳，实际也是一种试图减轻这种抵制的努力。但也许是郭鸿志的哭诉还是激怒了他们罢，他们不高兴了。另外，一种新出现的形势也在促使反对派们极力压低和限制李一哲平反的范围和影响，就是“李一哲集团”概念的内涵在滚雪球般地无限扩大了。它不但事实上在清查中牵连了全省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批林批黄和批李时，那些极力和李一哲划清界限，大骂李一哲，声言跟江青、王洪文走的人，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中翻了筋斗，挨了整的人，现在也极力向李一哲靠拢，声言自己是受李一哲牵连的了。

这也确是有些搞不清。焦林义的报告里，不是把梁锦棠、刘继发等都说成是与李一哲“勾结”的么？邓小平倒霉时，不是连一切“地、富、反、坏”和劳改犯都被说成是与之勾结的“社会基础”了么？

于是，在释放了陈锦禄、杨万翔之后，我们被告知，郑庆和还不能放；接着我们又被告知，原定平反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开的计划被取消，改在友谊剧场开。

消息传出，“李一哲集团”分子议论纷纷。——庄辛辛平反都在中山纪念堂开，李一哲案的影响是庄案不能比的，为什么反要降在小小的友谊剧场开？显然是蓄意压低平反规格。这样一来，李一哲平反，还能落实到基层么？他们强烈要求我们抵制改变会场的决定，他们甚至提出了直接见习仲勋的要求。他们最耽心

的是我们几人只顾自己在上面平反，不去尽量地照顾他们的利益。过去，他们因为跟着我们或受我们的牵连吃了苦，现在他们觉得有直接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李正天也坚决主张必须释放郑庆和。郑庆和的太太吴枚抱着儿子小星星天天来东湖找我们，非常着急。我们决定应该向省委反映意见（是否有书面意见，已记不清）我们表示，如果不释放郑庆和，不恢复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我们就拒绝参加平反大会。

春节已经来临。吴南生吩咐王大力给我们一人发了二斤猪肉，先回家过年。

我告诉吴南生，我已无家可归。珠影因“李一哲案”没分房子给我父亲，使我三口住到了苏江娘家，为此牵连苏红被逼疯。丈母娘已明令不许我再回去住了。吴南生思考再三，让居立铭打电话告诉梁湘，请梁湘帮我解决。

东湖招待所每天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值得记的是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和记者邢泓远。

这是我第一次的“外事活动”。温先生为了解除我们的疑虑，介绍自己说，他原也是《文汇报》系统的，只因不满原《文汇报》唱四人帮的调子，才离开了它另起炉灶。

他对我们四人原籍都不是广东人颇有遗憾。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大字报的思想，毕竟是广东的水土养育出来的。

我们向他介绍了我们各方面的情况。

我特别向他提起了一件事情。

原来，上次习仲勋接见时，我曾向他提出了与我们这代人息息相关的偷渡知青问题。我说：“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他们都是爱国的，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他们是很悲惨的，以为一辈子离乡别井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一听便赞成说：“好啊，你写个报告来，我来批。”

我不懂机关工作程序。误解了习的意思，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调查报告。

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宣传一下，收集一点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上呈。

温辉先生真的照办了。香港同胞得知这一消息，如蒙大赦。适逢春节假期一到，原偷渡人士回乡大增，政府果然未予干预。

后来，习老再接见，责备我说：“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我这才明白，他是要我写一个呈批的报告。但习也并未深责。

还值得一记的是我们会见了法新社记者德龙，共同社记者荒井利明。德龙各送我们一本法文版的《民主与法制》，荒井利明则和我辩论起“四·五”的意义来。

春节几天，我们四人到处拜年，美院胡一川家、关山月家也没漏过。但烦恼的是二岁半的船船不愿跟我，一不见母亲便嚎啕大哭，软硬不吃，令我束手无策。

春节一过，二月三日，习仲勋又把我们召了去。这一回，又是深夜。他一身戎装，领章红得耀眼。显然刚刚开完军事会议。对越作战的部署正在紧张进行，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他握我的手，劈头就问：“王希哲，怎么春节也不到我家来给我拜个年呵？”我一想，糟糕，还真没敢想到这一点。只好答道：“你家门卫森严，我们不敢随便打扰。”

习说：“你们就说来给我拜年，能不让你进么？”

坐定，习略问春节各人家庭、父母情况以示关心。便说：

“你们平反的事还要抓紧。我们过几天准备开一个几十万人大会批斗武传斌。主会场在中山纪念堂。武传斌这个人很坏，做了许多坏事，我有材料！”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然后又转向李正天：“李正天，那个什么八·五‘特急通令’是你写的吧？你怎么也写这些东西？”

李正天脸涨得通红，局促不安，说不出话来。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李正天。

我心里“扑腾”了一下。这是为什么？习仲勋对我们提这些干什么？是颠倒过来，像过去批李一暂时让武传斌们表态划清界限一样，现在要我们表态与他们划清界限么？或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获平反，但须记得自己在文革中仍有错误么？无论如何，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我说：

“习老，我不同意这样批斗武传斌。武传斌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文革中的错误是受中央文革影响的问题。但他和我们一样，在认清了江青、四人帮的面目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走了。武传斌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从未反过周总理。不看当时的历史情况，非要算红卫兵文革时的帐，是不能服人的……”

习仲勋并不熟悉广东文革情况，听我这么一辩，也无话可说。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这场几十万人的批武大会终于没开。（事后，武传斌告诉我，原定这场批斗会后，便执行逮捕的。除了我们的力争外，中大党委的反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习又告诉我们，海南方面不同意放郑庆和。他们坚持郑庆和有许多问题，郑自己也写了“认罪书”认了罪。

我和李正天一起反对，力辩郑庆和搞海南屠杀材料是针对黄永胜的，我们希望习能亲自看看那些材料，那是惊心动魄的。海南的态度，说明那里还有人在保林、黄路线。至于郑庆和的“认罪书”，更是无稽，在残酷的拘押、审讯下，写这些东西，何足为奇。不足为证。

习仲勋听罢问李正天：“好，放郑庆和出来，你来担保？”

李答：“可以，我来担保！”

习仲勋只得对梁冀（省公安厅副厅长。时王宁因病缺席）说：“你再去对海南说说，把郑庆和放了吧。”

随之，又谈会场问题。

习说：“你们怎么能说在友谊剧院开平反会就是降低规格呢？友谊剧院是广州最高级的剧院嘛！你们不是过去还说过，开个记者招待会就行了吗？”

我答：“说开个记者会就行了，那是因为我们刚出来，还不知道李一哲案原来牵连了那么多人。友谊剧院虽然高级，但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中山纪念堂。怎么不是降低规格了呢？除非平反大会习老您亲自参加，否则，群众只能理解为降低规格了。”

习仲勋见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不禁大怒，他抓起皮包，推凳而起，离席走几步，说：

“王希哲，你这样的态度，我就不跟你们谈了，我走！好不好？”

我猛吃一惊，真没见过这样的“事变”。但瞟一眼，吴南生、陈仲旋等都端坐在那里，如司空见惯，猛醒悟，这大概是高级干部开会，常会出现的戏剧场面，也便装作处变不惊，声色不动了。

静场几秒钟，习仲勋复又回头坐下。我想，该让步且让步，不要逼习过甚，有些事恐怕也真由不得他，便主动说：

“习老，既然省委坚持友谊剧院那就友谊剧院吧。但习老可否见一见受牵连的群众呢？他们很想见您！”

习有点动心，问：“有这个必要么？”

“很有必要，习老。”我说，“他们见见您，向您反映一下他们的意见，心情会舒畅一些，也能给基层的平反一个推动。”

“但是，恐怕很难安排时间。”他望了望陈仲旋。

“就见十几二十分钟也好。”我说。

“但是，我总要和他们一个个握握手吧？……好吧，那就明天下午吧。”他又与陈仲旋商量了一下后说。

我松了一口气。

接见结束。这时已是凌晨近四时了。

我们赶紧草拟了一份接见名单交陈仲旋，由省委办公厅负责通知。

省委办公厅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上午便把一百多人都通知到了。须知那时既没有CALL机，也罕有电话。

这一百多人把招待所大会议厅坐得满满的。

我想先传达一下昨晚与习仲勋会谈的经过和达成的谅解，以便大家发言掌握分寸。但刚介绍到习仲勋批评李正天“八·五通令”，李立即满面怒容，红着脖子嚷了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来讲！”大家莫名其妙，我也只好刹住。心想，这李正天怎么这么扬不得短。其实，有什么？文革中，谁没有过这类的错误？我本人就担任过红警司副司令吗？

服务员为每张桌子摆上了中华牌香烟。我已经知道，它代表了这次会议主角的级别。

习仲勋的黑色小轿车驶到了门口。我迎接他出来，走进会议厅，大家起立鼓掌。

这一百多人，除少数干部，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习仲勋显然真心喜欢青年，他一见大家，眉开眼笑：

“哎哟，你们原来都这么年轻啊！你们吃苦啦！”他招呼大家，一个个地握手。

他简略介绍了几句省委决定为李一哲平反的经过，又作了官式的鼓励，便请大家发言。我坐在他的身边。

意外的事发生了。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家齐。他展开一张纸，以“李一哲集团分子”的名义宣读一个向省委的要求。李大姐坐在他旁边，面露得意。显然是以他们二人为主策划的。

全场立即紧张起来。

前面二条记不得了，当读到第三条（？）坚决要求平反大会仍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时，习仲勋跳了起来，全身转向了我大骂：“王希哲，你绑架我啊？你是绑架我到这里来要胁我啊？”

我脑袋“轰”地一声。会场气氛紧张得要爆炸。我看见门口的便衣警卫也站起来，警惕地望着我。

但我已有了昨晚的经验了。我立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我叫仍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小张坐下，然后对习仲勋解释说：

“习老，昨晚我们讨论的东西，还来不及向他们传达，他们不知道；他们搞的这个东西，我也并不知道，请习老不要误会。”

李秀芳、张家齐见状，也插道：“是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搞的，王希哲不知道。”

习仲勋这才转过颜色，坐了下来。我立即指挥大家鼓掌，初步扭转了气氛。习抽出一支香烟，我立即凑上为他点火——当众讨好地为领导点烟，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但为了挽救局面，我必须这样做。

我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平反，不是没有阻力的。大家都愿意到中山纪念堂开大会。但平反能不能彻底不在开会规模而在省委的决心。现在习书记亲自来接见大家，就是表示了省委的决心，我们应该欢迎。现在大家再提点意见和希望吧。”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了。但把习仲勋请来，对基层来说已是拉了大旗，下面是可以讨价还价了，这样，我心略安。

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苏江也发言了。有人来催习仲勋了，他只好起身告辞。他最后留下了话：

“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人顶住不给你们平反，你们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坐车到那里去！”

大家欢呼鼓掌。

车门打开，他正要跨上去，又转身对我说：“王希哲，就这样定了，可别又

变了！”他仍对我不放心。

我说：“行，习老，放心吧，不会变了。”但心里想，谁先变的呢？不正是省委自己吗？

第三天后，二月六日下午，平反大会正式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

大会安排发言的是寇庆延（宣布平反决定）、吴南生、李正天、王希哲和胡喜凤。胡是梅县地委书记的女儿。她的发言显系龚小夏为她起草，对打成反革命颇多愤激不满之词。吴南生找我说：“算了，改一改吧，这些不要了，她爸爸难道打的反革命还少吗？”于是激愤之词删去，发言四平八稳。

《争鸣》记者邢泓远向我要发言稿，我说，没什么意思，这是协商稿，以后看我们的大字报吧。她要求采访大会，这是没有先例的。我请示吴南生，吴说：“《争鸣》我知道，都是我们的人，可以嘛！”

于是这次平反大会最活跃，最引人注目，也最产生效果的，就是这位身穿“奇装异服”的不时上窜下跳掀动闪光灯的香港女记者了。

但是这个《争鸣》，不久就成了共产党最憎恨的杂志了。

我的发言，仍多少坚守了一点我的独立性。我不承认外界所传的李一哲是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派”。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持相同政见派”。这个提法，各报都作了报道。也许他们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里有二层意思：一是，我和共产党人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政见相同；但是，更重要的，我宣言了我是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派，不过政见相同罢了！《民主与法制》中，我们主张合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现在，我的平反发言里，我在实践它。

官方的鹰犬们很快就将其嗅觉了出来，并加以讨伐了。

但是我没有回头。我坚持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大脑，独立的派别，为实现《民主与法制》的理想走下去。

二十一、李一哲的旗帜

我们走出东湖招待所的时候，北京的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被捕为标志，正在日渐地向下滑落。

从监狱出来的第一天，感受到街头强烈的民主运动的气氛，我就认定，这场从北京发端，蔓延全国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李一哲向往已久，呼唤已久的民主运动。它要实现的目标，正是李一哲大字报的理想。我们的平反出狱，极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它的推动。我们应当积极地支持它，辩护它，投入它，而不应该回避它，更不应该站到官方的立场作官方的工具去指手划脚地批评它甚至污蔑它。

如果平反前，我们面临的是怎样实现彻底平反问题的话，平反大会后，我们面临的则是李一哲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魏京生？魏京生是什么人？他在反四人帮的时候作过些什么？现在党中央已经在着手改革了，他们才出来跳，是有些投机吧？”——郭鸿志说。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老郭”——我说，“不是说革命不分先后吗？就算魏京生过去没有站出来反对过四人帮，难道今天就不能参加民主运动了吗？这不有点‘赵太爷’的味道了吗？何况参加民主墙的，许多人过去还都是介入过‘四·五’的，它是一脉相承的。”

李正天说：“这样吧，以后写东西就各自写，不要用李一哲名义了，李一哲不存在了。我对习仲勋都这样说过了。”

我坚决反对：“不！李一哲代表了一种理想，它是一面旗帜。现在平了反，全国民运都在望着我们。你们可以退出李一哲，但我必须举起李一哲的旗帜继续前进。”

我虽然坚定地回答了他们，但心里还是矛盾的。我知道，我与李正天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来，但是，它会在外界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这不过是李一哲平反后，王希哲与李正天在私人荣誉上的一场争执。

不！如果李正天确是一个如外界传说的那样，理论功底十分深厚的人，更重要的，如果他确是一个有深厚思想基础的坚定不移的民主战士，哪怕他实际并没有在李一哲所有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我也是决不会与他争李一哲的这面旗帜的。何况在那数百万人的围剿中，虽然他的表现并不能令我满意，但他毕竟是勇敢的，吃了苦的，他被人民认作李一哲的代表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问题是，他是一个虚荣、好吹，甚至有时不惜背叛朋友，背叛理想去邀宠求利的人。他主张李一哲不存在了。但他心里清楚，外界仍会以为他是李一哲。他可以既吃李一哲的名誉饭，又吃官方饭。他是会败坏李一哲的名誉，糟蹋我一

生的心血的！是的，我必须把李一哲的旗帜接过来，继续前进。

这番在莲花井的争辩，很快就进入了习仲勋的耳朵。它加剧了官方对我的警惕和不满。

陈一阳仍置身事外。他已坚决地“洗手不干”了。他对官方新安排的工作——哲学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十分满意。经过整十年的插社，批斗，流放和监禁后，现在才终于有了一个安定舒适的环境。他对我说，他有一种“幸福感”。但由于历史上，他毕竟与我有着较深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他的同情往往在我一边。

界限越来越分明，裂痕也越来越大。为了使我感到孤立和威胁，习仲勋不时地弃我在外，召见李、陈、郭三人甚至李正天一人谈我的问题。

郭鸿志对李大姐说：“不要紧的，反正我们已经向省委讲清楚了，以后小王有什么事，哪怕他投靠国民党，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一天，我在陈一阳的小客厅里，与他作两人谈话。我告诉他，通过在柯木朗对《资本论》的学习，我已对过去的理论作了彻底的反省。我已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实现民主。在政治上，我可以说已经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

刚说到最后一句，李正天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听见愣了一下，然后才进来坐下。

几天后，陈一阳在参加了排除我的习仲勋的召见后，对我说：“你要小心，习仲勋那里的有些材料对你很不利！很不利！”他不肯深说。

省团委的干部也问我：“最近你说过什么话吗？针对共产党的？”

我明白，这是那个“决裂”无疑了。我同时也感觉到，共产党从此再次对我实行了秘密的侦察。是谁报告习仲勋的？是陈一阳还是李正天？在怀集监狱的那十二年里，我也一直在想。

一九七九年的四月五日即将到来。这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发展以来的第一个“四·五”。广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发出海报，倡议该日在烈士陵园正门召开纪念集会。

原来，这个学会及它的刊物《人民之声》，主事者正是那位当年劝我“要学孙黄，不要作康梁”的刘国凯。据他后来解释说，四人帮垮台后，重新燃起了他对共产党的幻想，因此，又回头来作“康梁”了。

他向我约稿，我答应了。

我考虑写一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我们知道共产党赖以支撑他们专制统治的，有四个理论命根子，即所谓“四项基本原则”，要改变它的专制统治，

如果你主张用温和、理性的改良方法的话，首先就必须尝试与虎谋皮，就必须试探说服共产党是否可以用民主的思想去重新解释和改造这几个原则。

我想先写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再写篇论党的领导的。

当我正在蕴酿之时，四月一日，广州各大学的文学社团发起，在东山侨光中学召开了一次纪念“四·五”的座谈会。参加了华师大《未来社》的汪岷来到我岳母家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侨光中学在东山培正路口，现为培正中学。汪岷主持了这次讨论会。他是否作了发言，我已没有印象。

李正天没有出席。郑庆和倒出席了。这是他在我们的坚持下被释后第一次亮相。他再次向与会者展示了海南屠杀的材料和照片，因为儋县的问题，1974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除了争看照片时有点骚动外，与文革隔膜的青年一代们已对它没有兴趣。他们兴趣的关注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及民运的命运等等。郑庆和也感到了学生的冷漠。从此文革的具体遗留问题便永远退出了民主运动的视野。

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毛泽东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铁托。

因为毛泽东坚持斯大林主义，并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作出什么创造性的贡献。而铁托则打破了斯大林主义，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形式——工人自治社会主义。

二，毛泽东政治、经济极左理论的集大成是他一九五九年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什么“越穷越革命”，“社会越落后过渡越容易”以及用大规模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进行所有制的不断升级改造等理论，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根源。因此，必须批判毛泽东的《读政治经济学笔记》。

三，要使国家官员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就应尝试进行这样的改革：让他们的收入，直接来自纳税人的税赋。否则，“人民公仆”对他们来说，永远不过是一种哄哄人的笑话。

四月二日，即发言的第二天，习仲勋便在省委点名批评了我，说我的发言是“煽动性”的，甚至是“反动的”。

紧接着，四月三日，共青团广东省委便出面召集各团体民运活动分子，接受习仲勋、杨尚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训话。

由团省委出面在第一线处理民运问题是习仲勋的决定。在三月份的一次接见时，他已向我们李一哲介绍了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吩咐我们今后向省委反映意见可以通过李海东进行。

也正是在那次接见会上，我还得知了习老正在直接过问着李正天的婚事。

原来，李正天在一九七五年批李高潮时定下的女朋友张果娃，没等得住李正天两年的牢狱，已失身于人。出狱的那几天，在东湖招待所，李正天每天对着一大堆他在狱中为张果娃画的素描，悲痛欲绝，伤情到极时，便两眼发直，全身痉挛，陈一阳赶紧上来替他按摩。我也为他伤感。心想，小李对张果娃这般深情，此心一伤，恐怕这一、二年不会再找女朋友的了。

孰料，仅一、二个月，便传说李正天打点家俱要结婚了，且女方是佛山军分区司令陈坚石的女儿。我大吃一惊，颇有错读元稹《遣悲诗》的感觉。但好事多磨，这位陈司令似乎不愿将女儿下嫁给这位“民主人士”。

郭鸿志为朋友慷慨上书习仲勋，请习老牵其红线，成其好事。果然，那次接见，习仲勋高兴地对我们说：“我在各军分区干部会上说了，李正天与陈坚石的女儿恋爱，是好事嘛！作父母的不要干涉嘛！”习老是热心肠的人。

“军令”如山，陈坚石敢不从命！这样，据说那边张果娃还在悲痛中时，这边李正天已洞房氤氲，喜得佳人了（这对夫妇1995年离婚，生有女儿一名）。

被召来接受训话的还有刘国凯的《人民之声》诸同人。他们是扬言坚持要在四月五日如期召开烈士陵园纪念集会而被召来的。另被召来的还有前天侨光中学讨论会的华师大《未来》社，中大《红豆》社等等。

习仲勋和杨尚昆进来了。

习一进会议厅大门一眼看见了我，还来不及循例各个握手，便一口陕西腔大嚷了起来：

“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他作着高举的手势。“你怎么说铁托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不错，铁托是很伟大，但你怎么能拿他来否定毛主席啊？”

兜头一阵暴风雨后，他和杨尚昆才同与会者一一握手。

杨尚昆坐下。习却并不坐下，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继续向我嚷道：

“王希哲，你还说‘新的号角已经吹响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莫名其妙。只好辩解道：“习老，什么号角？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一位团干部也说：“习老，前天的会我也在，王希哲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说过就好，这样的话是破坏安定团结的。”他继续说，“还有郑庆和，他怎么也参加这样的会了？我上李正天的当了！李正天自己没有参加，这就好。王希哲说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我看李正天就是好同志！”

我从未说过李正天不参加是叛徒的话。我知道，是有人在背后凭空奏了我一本了。

杨尚昆说话了。这位当年以对毛泽东搞窃听之罪打入地狱的中共领导，我是久已闻名了，今日才得以从近处一睹芝颜。

他咳一声，顺手从一位小青年面前抓过一包劣质的“飞鹰”牌纸烟，抽出一支，小青年赶紧高兴地给他点上。他抽了一口，正要发言，不料，这事立即引起了会场的一阵骚乱。

书记李海东，宣传部长赖际煌等发现他们的会议准备工作出了纰漏了，事先竟忘了在二位首长面前按规格摆上中华牌香烟。赶紧催人去找，但已是夜深，不知何处可觅，为此进进出出，坐立不安。

我看在眼里，暗自思忖：看来，某些大人物自己倒未必对某些特权时时在意，而抬轿子的人，则诚惶诚恐，生怕服侍不周的。

杨尚昆把“飞鹰”又抽了一口，对《未来》社的姚学正说：“你们那个社叫什么？叫《未来》？我们讲‘现实’。现实要求安定团结。”

姚学正争辩说：“我们开这个会事先征求过吴南生意见的，吴南生同意的。”

杨尚昆一听，不好再说什么，又对刘国凯说：“你们叫《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四月五日的会你们就不要开了嘛，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措施的。”

李正天站起来发言。他刚刚受到了“好同志”的赞扬，头脑可能还有些热。他大声斥责了《人民之声》，提到李一哲平反后也曾设想在烈士陵园召开一次与群众见面集会，但在习仲勋干涉下，早已决定不开了。于是他说：

“我们李一哲都不开了，你们还开什么？”

这话太蛮横，我几乎想站起来驳他。但又不愿当场拂逆习、杨的意志。习仲勋毕竟是一位把我们从狱中救出的恩人。在省委，是他力排众议，甚至不顾韦国清、赵紫阳的反对，向邓小平写出为李一哲平反的报告。因此，我也深知，每当我一有事，习必定要首先承受焦林义派反平反势力的压力。我只好把发言尽量园转一些，找出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台阶。

我强调举行纪念四·五集会，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但面对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混乱，如果中央不适当强调安定，很容易被凡是派利用来攻击党内改革派，这对改革是不利的，我们应当体谅到党内改革派目前的难处，暂不举行这样的集会。

想不到，杨尚昆竟对我的发言大加赞赏，连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李海东则建议把四·五纪念会改在省团委来开，由省团委主持（即官办化）。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之声》也只好表示取消原定的集会。（据刘国凯后来的回忆，他们在来前已决定取消了这次集会）

四月五日，东山寺贝通津团省委会议大厅坐满了各色青年。他们的服饰虽仍以正统蓝色为优势，但得风气之先者，已有了新潮的发型和鲜艳的色彩，引人注目。

一位女大学生率先发言。她忏悔了四人帮统治时代，八亿中国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脑袋的悲哀。她很动感情地朗诵了一首诗，那大意也是说要寻回自己独立思考的脑袋。另有大学生表示附和。

一位长发光亮的新潮青年袁小涛站了起来，他挖苦“刚才那位女士”（这在那时还是讥讽的称谓）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脑袋。他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就是没有脑袋的表现。他崇奉达尔文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敢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那位女青年被激恼了，咕鲁了几句，又无力反驳。

我站起来说了几句。我自然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告诉袁小涛，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它有详尽的批评。说马克思主义从未批判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对的。

珠影满清海也作了发言，要求继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原是珠影东方红的。被开除后，一直在外流浪。

李正天呼地站了起来，两眼圆睁，直视前方作战斗状，大声叫道：

“不管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反正我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我是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喉咙挤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但又无话可说，又呼地坐下。

全场莫名其妙，为之愕然。

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这家伙，再也不能给他留面子了！”我心里骂道。

“李正天，你不要吓唬老百姓！我问你，刚才在场所有人的发言，有谁说过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没有，是不是？既然没有，你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官方听的！你打击别人来向官方讨好！不错，你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你既然主张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你就要讲讲道理：为什么别的主义都不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你一点道理都不讲，吓唬人家一句就拉倒，这算什么？这不是宣集文的作风吗？我们昨天反对宣集文，怎么你今天又把宣集文的作风学来了呢？”

李正天脸涨得发紫，一声不吭。

我缓和下来，转而发言。

“我不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只有中共七大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才是适合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谓‘救中国’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是主观的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这次讨论会后，李一哲的分裂和对立，便公开于世了。

李正天遭到我这次打击之后，一年时间，没有敢公开为官方指责民主运动。

但是，一九八〇年一月，邓小平主张取消四大，官方为收罗吹捧者又对李正天有了需要。

这时，以北京为首的全国各地民主运动在官方的高压下，仍顽强地抵抗着，生存着，坚守着越来越小的阵地。可歌可泣。

我不同意以在宪法中删去不科学的“四大”的规定为名取缔大字报。我认为，邓小平的主张，其性质，就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盟取得政权后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大字报，就是人民手中的唯一武器。

那时，邓小平在台上发难，仆从和喽罗们就在下面鼓噪，大字报似乎成了万恶之源。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动乱、灾难、冤案通通算在了大字报的头上。这真是可笑。大字报真有这样的神通么？比如说，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若不是中共的电台广播，报纸登载，它可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冲击作用么？既然如此，那末取缔大字报之外，为什么不取缔电台、报纸？文革中哪一个官员是大字报打倒的？哪一个冤案是大字报定下的？说穿了，起作用的，造成灾难的，归根结底是中共的那套专制的统治机器。那末，为什么邓小平不主张把这套机器取缔？（他也说过一下要改革，这是他进步的一面）。

官方是怎样与李正天达成交易的，我不清楚，但事实是，他跟得很快。就在邓小平讲话不久，李正天便在团省委机关刊物《广东青年》八〇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论大字报》，背叛《民主与法制》的立场，对大字报这个人民手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了颠倒黑白的污蔑。

在这篇文章里，他认定大字报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政府主义有利，破坏安定团结；据他说，这种“不受制约”，“不受审查”（！李一哲大字报若是先受审查，能贴得出来吗？）的言论自由常搞得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总之，应该取消。

但李正天知道我的立场。他心中有所忌畏，不敢冒王希哲的锋芒。因此，这篇文章他只好偷偷摸摸地，非常委屈地用了笔名“罢夫”来发表。没有让我和陈一阳知道。

我得知了这篇东西，拿去问陈一阳。陈一阳也很意外。说：“怎么小李会写这样的东西！”

由于我已公开陈述了对于取缔大字报的立场，而李正天又并没有以真名发表他的《论大字报》，我便也装聋作哑，没有对他进行抨击。

但是我错了。

官方显然对李正天躲躲闪闪，不敢公开亮相赞成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他又奉命在六月四日的香港《大公报》上以真名李正天发表了一篇攻击《中报》的文章，叫《广州四·四座谈会真相》。

这篇东西彻底把我瞒住了，又彻底把香港人民、海外舆论都骗住了，骗得好惨！

我是在事情发生后的十五年后的今天，为了写这篇自传收集材料，才在当年的第六期《人民之路》上，看到李正天的这篇东西的。这篇东西，他显然估计能够避开我的视野，于是，对大字报更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丧失理性的攻击。他说：

“我在会上说过，‘四大是不民主的象征。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不能靠四大来保障。从反右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四大作为一种舆论形式，对邪恶势力有利。’”

我要请教李先生，究竟宣集文是邪恶势力还是李一哲是邪恶势力？我来问你：如果中国人民已真正享有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几人还愿意上街贴大字报？当官方拒绝给人民这些自由的时候，你不是去捍卫人民的自卫权利，却帮着官方去收缴人民手中唯一的最简陋最原始的武器，你的良心何在？

是的，你没有在李一哲大字报上留下一个字，你可以把李一哲说的话忘个一干二净，但你毕竟顶着而且十分愿意顶着李一哲的光环，因为它能卖你的字画，能让人慕名请你去办教席，那末，就请你坚持一下李一哲的立场吧，就请你温习一下李一哲当年说的话吧：

“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革命死了（大字报运动被镇压了）革命万岁！”

李正天鬼话连篇。鬼还不仅在他忘情地污蔑大字报，而且鬼还在于他居然把他的这番话说成是他在广州四·四讨论会上的发言。——“我在会上说过。”

他什么时候在讨论会上说过这么些话？没有。那次会我在场。我作了反对取缔大字报的发言。他不敢与我交锋，他没有这个胆量。他若作了这样的发言，绝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我狂风暴雨般的致命打击。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找到李正天问他：“小李，（现在他已五十多岁），你一九八〇年反对大字报的意见除了以罡夫的名义发表过一篇东西外，我记得没有在什么讨论会再说过吧？因为你要是说了这些意见，以我的性格，我不可能不与你发生过冲突。”

他答：“是的，我没有在别的会上说过。要说了，肯定是会和你发生冲突的。”

陈一阳也证实，他没有在“四·四讨论会”上说过反对大字报的话。

这就表明，李正天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大公报》上的“座谈会真相”文章，完全是一场装腔作势的大欺骗。

“真相”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

一九八〇年四月四日，团省委召集部分青年讨论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我对刘少奇问题和大字报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大意说：大字报曾经支持邓小平，挽救了邓小平。邓小平自己也曾高兴地赞扬过大字报。现在一翻脸就要取缔大字报，可是又不制定出版法，这就等于取缔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我是决不赞成的。《人民之路》编辑何求对讨论会发了报道。《中报》也许是根据这一报道发了一个通讯。这个通讯，主要是报道了我的发言。

不久，团省委又把几名青年活跃分子召去，实际是开何求的批斗会。询问，指责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报道，追问他是怎样发出的。宣传干部李彤气势汹汹地问：“你是什么记者？你算什么记者？你有记者证吗？”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拿出来朝桌上一摔。

我与何求关系原并不十分美好。但见这干人欺人太甚，按捺不住便开口驳道：

“你又算什么记者？你的这个记者证又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无非是吃官方的饭说官方的话。你们有什么权利批斗何求？不错，《人民之路》没有得到政府承认。但这恰恰说明，政府没有给人民出版自由，恰恰说明，民刊有责任迫使政府兑现人民的出版自由。”

赖际煌、李彤等都不再作声了。“批斗会”不了了之。

于是，便出现了香港《大公报》六月四日由李正天说明“真相”的撒谎文章。

六月十二日，香港《中报》不服，发表回应文章《如此而已，岂有它哉！——答李正天六月四日大公报特稿》，文中说：

“我们奇怪的是，本报四月十八日的报道，明明以王希哲的发言为主题，为什么由李正天出面来‘有感’？”

“我们原来就听到大陆传出一个消息，即李、王在对待民主运动的意见上发生了分歧。王是坚决反对党内保守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压制人民民主的；李则主张配合当政者，先求安定，再图法治。现在李正天公开发表‘有感’也从侧面证明了上面传说并非全属子虚。”

回应得很好。缺点是，编者根本想不到李正天是在撒大谎。他的“四·四发言”根本是子虚乌有。也不知为何没有想到应该直接联络王希哲了解一下事情的原委。一九八〇年，应该说，在香港查到王希哲的地址，是不难的。

中共《红旗》杂志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明三的文章，从官方

的角度（或者说官方开明派的角度）总结了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这段历史。我们作为文献，整段把它摘录下来：

有一个省，有几个青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都有过错误，但也写了观点基本正确，在当地乃至全国都有不小影响的大字报。过去由于对他们的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他们受到了伤害。去年春天，一些受牵连的同志贴出大字报，主张“闹事”。社会上也有人想利用这种时机扩大事态，把水搅浑。面对这种动乱的因素，省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处理，明确表示敌我界限一定要分清，不能混淆，搞错了，坚决纠正，做好平反工作。省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同这几个青年同志谈话，推心置腹地交心恳谈，耐心地教育开导，从而消除了长期存在的对立情绪。省委信任这几个同志，不怕他们接触消极面。当社会上有人鼓动这几个同志出来带头闹事时，有的干部主张采取“限制”措施，省委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却要他们去对准备闹事的人多做工作。同时，也提醒他们防止有人钻空子。这样做的结果很好，准备闹事的人安定下来了。省委对这几个同志的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是等到矛盾激化了再去“灭火”，而是把工作做在前头。当这几个同志要在公园里公开举行“理论讨论会”时，省委并没有压，而是由第一、二把手专门找他们谈话，耐心教育他们说：你们青年人思想活跃，要求对国家一些大事进行讨论，这是好的，我们可以帮助。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有些做法不利于安定团结。经过做工作，这几个同志做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这其实是官方与李一哲关系的理想模式。李正天代表了 this 模式。

二十二、伟大的中国之春运动

正如毛泽东抗美援朝，与美国人打了一仗，才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一样，一九七九年一月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也决定与苏联的盟友打一仗，“教训一下”越南这个曾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东方的古巴”，来赢得卡特的信任，以建立世界性的声誉。

但仗打得并不理想。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伤亡，暴露了各种问题。这势必引起党内外对他的信任危机；上海知青闹事风潮也终于动摇了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决心。三月底，他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大棒，开始了向昨天还是他的盟友的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清算。

这个风也吹到了广州。

对李一哲平反素怀不满的广州市委抓住时机下发了习仲勋对我四月一日侨光中学发言的批评。许多单位甚至还播放了录音讲话。“王希哲作了煽动性的反动演说”的谣言不胫而走。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我的诸亲戚反映说，平反后，他们才抬起一、二个月的头，现在不得不又低下去了。

我还是一条路——应战！

我向省、市委提出了抗议。习仲勋回应说，他对王希哲的批评只是个人意见，不是政治结论，正确与否，还须实践检验。习是开明的。

杨尚昆则说：“党内发文件，王希哲无权干涉。”

那么好，我发文章，你们也不要干涉。

我在刘国凯的《人民之声》第八期上发表了出狱后的第一篇文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这是我按照我的既定方针，即用民主的思想去解释和改造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这个办法，文化大革命中叫作“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文章中我提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之后有二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少数领袖的，即寡头的专政，甚至个人的独裁专政发展，斯大林是这样作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作的；一个是逐步扩大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向工人自治、劳动者自治的阶级专政（最终消亡专政）的方向发展。铁托领导着南斯拉夫正在进行着这一试验。它是符合列宁所说“把代表劳动人民的政权变成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方向的。

这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独裁”的所谓合理性，便被我从理论上剝去了。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又发了一个与《人民之声》记者的谈话。谈话中，我明确宣言，我将坚守李一哲《民主与法制》的理想。我第一次公开声明了，我是所有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执笔人。这样，就使官方抓住李正天来造成影响以压制民运的办法，大打折扣。习仲勋十分生气，把李正天等叫了去，拿香港转载的文章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你们看，李一哲又出来了！”

香港两家刊物许行的《观察家》和李怡的《七十年代》都转载了我的文章。形成一稿多投。这是因为香港的大学生们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人民之声》，又不约而同推荐给了这两家杂志。以后，我便尽力设法避免这种使香港文化界朋友们被动的情况出现。

那时，香港各大学的大学生们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非常强。大陆开放以后，他们在“认识中国，关心社会”（认中关社）的口号下，蜂拥回来，详细地观察中国各方面的社情。

他们的团体一方面和官方的青年团体联欢寻求合作，以帮助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也把关注的目光射向民主运动，竭力寻找民运人士，与之建立联络，以求得相互的交流和了解。

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本身是中国人，他们关心中国，关心国内民运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中国人应该作的事情。

但官方把他们视作外人，视作异己，视作似乎企图插手民运的很可怀疑的境外势力。

他们在街上购买《人民之声》认识了刘国凯，又通过刘国凯找到了我家。从此来我家探访的香港各界人士（仍以大学生为主）牵连蔓延，络绎不绝。我遵循周恩来的教诲，广交朋友，来者不拒。并为他们迅速向内地幅射，提供了帮助。在后来我的《判决书》中，这也是我的罪状。

常来或来过探访我的香港朋友记得有：

张永强、王昭文、于品海、文海亮、冯业兴、吴慕姿、刘山青、刘子濂、杜成、骆竞才、陈仕强、刘英杰、王耀宗、周鲁逸、曾繁光、马国明、刘少文、吴仲贤、林昭寰、游伟雄等等。在我被捕入狱后，这些朋友及其他未谋面的朋友李怡、许行、李卓人、张文光、陈鼓应、雷竞旋等多曾为我主持正义，竭力呼吁。在此我向朋友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应我的要求，这些朋友为我带来了大批海外的书籍。过去宣集文骂李一哲是德热拉斯的门徒，但在那封闭的社会里，我们根本没有读过德热拉斯的著作，心向往之。现在，我们读到了卡德尔，读到了德热拉斯，还读到了葛兰西的欧洲共产主义，佛洛姆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读了麦德维杰夫，读了王凡西，知道了香港的保钓运动，台湾的“美丽岛”运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总之，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年，我新获得的知识，使我突破了国内的狭隘眼界，使我如居高屋而 其瓴，批判的锋芒，越来越饱蘸国际的风云，

它的成果，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因此，中国之春运动中的王希哲，不仅是王希哲本人的，也是香港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民主运动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全国的性质。与《人民之声》建立联系之后，我便着手与北京的民运建立联系。

那时，随着魏京生、任宪町的被捕，《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实际上已被取缔。北京民主运动的山寨上，最有影响的杏黄旗，也就非《四·五论坛》莫属了。

我给徐文立去了信，表示了我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并希望成为《四·五论坛》的广州撰稿人的愿望。

徐文立用恭正的毛笔立即给我回了信，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热情地提到，他们的刊物是以四·五为号召的，而当年参加“四·五”的许多北京青年都读过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并接受了它的影响。

读了它的信，我百感交集。啊，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祖国，为祖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一点积极的事情，并得到人民的承认，是多么幸福呵！

但是，如果说李一哲的贡献在于它在林彪、四人帮面前（还不是在整个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口号的话，那么，“中国人权同盟”的任宪町、“启蒙社”的黄翔就更加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顶天立地，石破天惊般地在骄横不可一世的共产党面前提出了人权的口号，揭起了“保障人权”的大旗，从而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发展，树立了一座更加巍峨壮观的记载着战斗、流血和牺牲的里程碑。

在这座里程碑面前，一开始我们看到，共产党是傲慢的，不屑一顾的，随后，它便不得不一点一点地向它低下头去！

刘国凯不赞成我介入《四·五论坛》，他认为作为李一哲不应该让一个具体的民运组织局限了自己。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觉得，若不进入《四·五论坛》，对北京的运动就只能如隔岸观火，难以直接感受它的脉搏。

这一年的十月十八日，团省委又一次召开理论讨论会。我发表了“改造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二篇文章《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

在这篇文章里，我承认人民可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人民必须在法律上有权监督共产党，甚至撤换共产党。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公仆，它只能以一个法人的资格存在，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人民有权随时撤换它。

刘国凯对我仍然同意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提出质疑。他大胆提出，既然阶级已经消灭了，那么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有了。

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大钧同意我的发言，指出“没有监督的领导必然是专制主义的领导。他认为改革的中心，应该是民主的改革。”

广州重型机器厂工人理论家郭盛雄也作了发言。

李正天的发言也略有新意。他主张改革纪律检察委员会，使之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这就在实际上批评了邓小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次会议的论文，团省委全部作为共青团的文件正式印发了。这样，《党的领导与人民监督》成为我唯一的一次在体制内合法发表的论文。在后来对我的刑事侦察中，检察官罗列了我的几乎全部文章认定“反动”，唯独大赦了这一篇。说明他们认定文章反动的标准，根本不在乎它的内容，而在于它是否在体制内发的。若是在体制外发的，这本身就是“自由化”，就足以认定反动。检察官究竟把这些文章读过一遍没有呢？天知道！预审员更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如果你的这些文章都是经过批准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我们根本就不会追究你了。”

一九八〇年三月，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四·五论坛》以红色的油墨，出版了它的告别刊。在这期“告别刊”上登载了我的《民主的方向》。

这篇文章，我驳斥了所谓新华社特约评论员还魂毛泽东主义，把人民民主贬低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手段”。

我认为，民主是劳动者摆脱异化，借以解放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自由人”的形式。因此，民主是目的，不仅是什么手段。

针对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言论，我反驳道：

“不自由的出版制度，就是一个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民主形式’。人民为什么要上街贴大字报，难道不正因为出版制度的不自由吗？人民为什么要在街头办画展，难道不正因为出版制度的不自由吗？人民希望我们的城市象海滨一样的宁静，为什么不去为这种宁静创造条件呢？”

此时，刘国凯的《人民之声》亦已停刊。这样，一九八〇年三月以后还坚持下来的民刊，较有影响的便只剩上海傅申奇的《民主之声》，广州何求、王一飞的《人民之路》和武汉秦永敏、朱建斌的《钟声》了。

我认为在官方的无情摧残下，民运为保存自己而作出收缩，是可以理解的。但火种不应星散，正好利用这一低潮时期，加强其活跃分子的思想交流。因此，我仿效毛泽东早年“新民学会会员通信”的方式，亲自创办了非发行性的通讯刊物《学友通信》，形式是把各地朋友给我的文章信件，摘其精华，翻印出来，反馈回去，以飨诸君。《通信》的对象除了各地民刊的原主办者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秀民间思想家，如罗亦农、陈尔晋、徐水良、杜应国、顾进军、江小英等。此间，倪育贤的来信也曾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贵州启蒙社的秦晓春来了一趟广州，他给我带来了一件吃惊的消息。说是不

久前，《光明日报》的某记者曾万里迢迢，从北京专门带了一份中央政治局的绝密会议文件来给他看，会议是邓小平与凡是派汪、纪、吴、陈针锋相对的指责。纪登奎指着邓小平说：“你从美国回来途经日本，经日本政府秘密安排与蒋经国见面，这是未经中央批准的，是违反纪律的。”这位记者希望启蒙社重新杀回北京，贴出大字报，声援邓小平。但没多久，这位记者又神秘消失了。原来，在中央的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已经把汪、纪、吴、陈扳倒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民间的力量了。

我是文革过来的，我熟悉这是文革中，中央两派斗争争持不下时，某些人惯用的伎俩。不说江青，即使周恩来，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上说了句“好同志”后，也会立即暗示人将此“纶音”作为小道消息传出去，以利于他平反老干部的方针呢！但无论如何，这对人民多少了解一些共产党的幕后活动，增加一点透明度，这还是有利的。我希望秦小春抓住类似的渠道，多掌握一些消息。于是这也成了我“刺探国家机密”的罪状。

成都江小英也来到广州。她力主《学友通信》要站出来批邓，对邓小平一月十六日的攻击、压迫民运的讲话，给予一个坚决的反击。我没有赞成，认为这不是《学友通信》的任务。

香港张永强要求国内民运支持台湾“美丽岛运动”。我同意了。建议何求的《人民之路》上多介绍台湾的民运。我还写了一封给陈鼓应的信，请张赴美国交陈先生。后下落不明。

刘山青来广州，请我建议国内民运发一个联合声明，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同意多在刊物上介绍团结工会，但不同意发声明。我认为，团结工会已经通过斗争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它可能得到了东西，瓦文萨现在应该是布署撤退的时候了，不然，无休止的罢工会脱离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不应该在此时帮他们的倒忙。

这一年的八月，瓦文萨与波兰共产党签定了复工的格但斯克协议。签约后，瓦文萨说了几乎与我所说的一样的话：“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希望的一切，但获得了当前形势下所能得到的一切。其余的我们也将获得。因为我们有了最重要的东西——独立工会。”——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懂得这个道理该多么好啊！——果然不久，反对瓦文萨合理妥协的极端派在拉多姆继续号召总罢工，促使雅鲁泽尔斯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扫荡了团结工会。数千人被捕（包括瓦文萨），迫使波兰的民主运动偃旗息鼓了近十年。

当然，我也没有完全回避邓小平对民运的压迫。四月四日团省委关于五中全会的讨论会上，我就正面批评了邓小平取缔大字报的怪论。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便引来了《人民之路》和香港《中报》的报道，也引出了李正天的一场“讲真相”的大骗局。

中共五中全会以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被特别抓紧了。

“历史决议”在共产党政治生活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联共布党史》和四十年代的中共历史决议，都曾中共政治指导的官定教科书。

我决心也以民运的资格写出一部这样的“历史决议”，尝试以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蓝本，写出“1966——1976年中国的阶级斗争”来。重点当然是“四·五”，我须要走一趟北京、上海、南京会见当年的参加者收集第一手材料。我必须尽快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影响官方的决议。

徐文立也给我来信，邀我上京共商民运下一步的打算。我便决定成行了。杜成、骆竞才等朋友资助了我路费若干。苏江还没有去过北京，这回便与我携手而行。

六月十一日，我们先到武汉。车转出蛇山，眼前飒然便是久违了的一片大江。苏江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这是对长江的赞叹。

我们停留了二天，可惜未能联络上秦永敏和朱建斌，略事游览之后，继续北上。

龚小夏来接我们。

李一哲平反后，小夏当年便以广东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小夏把我们带到北大。苏江与她住在一起，我则住进了法律系与研究生曹志杰为伴。

曹志杰便是赫赫有名的“四·五”第一名英雄。七六年的三月三十日，是他率北京市总工会理论组29人在天安门纪念碑上贴出了第一张对周恩来的悼词。

他对我很是热情，说是很早就知道我们了。小夏来到北大后，他们经常通过小夏了解我们的情况。

他向我介绍了当年“四·五”的一些过程，但他似乎忙于功课，没有再介入去年以来的中国之春运动。他介绍我去参加了一次北京市委党校召开的法律研讨会。讨论“县委大还是宪法大？”我颇觉可笑。因为如果他们谁也不敢提出“中共中央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的话，讨论县委和宪法孰大不过是没事找事干的游戏罢了。但我不敢发言，怕无端暴露了自己。

与北大其他一些师生的会见也颇有收益，主要是理论上的。对魏京生，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想不到受迫害这么深的彭真对民运人士下手也这么狠。但他们都相信，魏京生绝对不会坐足十五年的，因为形势很快还要大变。

在未名湖畔，我会见了王军涛。这是又一位大名鼎鼎的“四·五”英雄，团中央候补委员。他勇敢地，责无旁贷地介入了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他主办的杂志

就叫《北京之春》。这是对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呼应。正是有了他和陈子明等人的介入，中国之春与“四·五”的血脉联系，才有了最具权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他似乎并不善言，对我提出的问题总是简单地回答。我们交换了对毛泽东的意见。我们都认为毛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乌托邦，带着浓烈的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国传统理论对他的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对他的影响大得多。我们对邓小平背叛了他昔日的支持者，压制民主运动表示了共同的不满。他沉着地说：“我们比他们年青，未来是我们的。他们应该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感觉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但也相信当此民主运动低潮时，他会长期地蛰伏下去了。不料，几个月后，他便和胡平、于大海、房志远等人一起在北大掀起了一场海淀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浪潮。他又居然是一位演说家了。

徐文立，则比王军涛更加充满了锐气。他一见到我，便紧握我手说：“你来得好。我正要和你讨论一下组党的问题。”他说，“我们总要有个组织吧？这样，好动员国际的力量来支援我们。”

他约我到甘家口旅店再作商量。

小夏正在导演她改编的希腊古典名剧《俄底浦斯王》。她邀我和苏江去看。说今天曹禺也要到。但我必须去甘家口，便把苏江留下看戏，一人去了。

甘家口旅店是一间招待所式的简单旅舍，也颇干净。

三楼的一间房里，徐文立外，已经到了青岛《海浪花》的孙维邦（孙丰）和安阳《民主砖》的刘二安。

那时，收录机这玩艺刚刚时兴起来。何求托我带了一部给孙维邦，他十分高兴，把玩不已。

徐文立要刘二安作记录，然后说：“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虽一直受到压制，但仍然存在。我们应当考虑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还没有尝试多党制的先例，我们应该试探一下这方面的可能性。”

他建议组织一个政党，叫作“共产主义者同盟”。他说，希望我们都表示一下意见。若大家同意，刘二安的记录稿就整理一下，变成一个组党工作的会议纪要，若大家不同意，便作罢。

徐文立的会议主旨使我感到意外。这种事情，无法事先在信中交换意见，只好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临场交待办法，也可以理解，但即刻表态，终嫌草率。我只好说：

“对文立刚才提出的组党意见，我个人表示不参加。因为我还要与各方面的人士保持接触，参加了你们这个党，一些人就不敢与我接触了，我的接触面就小

了，这并不利。这是一。

第二，你们也最好不要组党，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法律没有说允许，也没有说不允许。组了党是个挑战，但树大招风，今后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了。

第三，现在青年思想复杂，各家各派，主义很多。有主张暴力的，有主张改良的，我是主张改良的。你的党叫“共产主义同盟”，未必能号召别人。所以，不如先不要组党，提倡青年多读些书，加强交流，逐渐达到对国家改革的统一认识，还更好些。

孙维邦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也不主张组党。徐文立说，既然大家都是这个意见，组党的事也就作罢。

我随即便把刘二安的记录撕下，去卫生间将其撕碎冲走了。

回来，徐文立又提出，既然提倡大家读书交流，总应有个交流的园地吧！建议以我的《学友通信》为模式，也搞一个《学习通讯》。也希望我参加。我同意了。

于是商定，《学习通讯》为月刊，由参加者轮流编辑发行。我告诉徐文立，我还要去上海和南京，届时我将亲自征求傅申奇、徐水良的意见。

长谈结束已将近黎明了。北京的夏天天亮得奇早。文立说，睡一睡吧，脑袋都直了。他待一会还要上班呢！

这就是所谓的“甘家口会议”。据徐文立后来说，在我们“会议”的那个房里，公安的探子已设计好了窃听器。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是一次长谈。文立向我详细介绍了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全过程和各个流派的主张和背景。我录了音，为我的写作准备也为了回去向广州的朋友介绍北京的运动。这一次，香港的刘英杰先生也参加了会见。

我和苏江游览了故宫、定陵和长城。小夏和我们一起在天安门照了像。她问我们参不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她可以让老曹去给我们弄票。我回答说：“没有兴趣！”是的，我为什么要去拜见这具木乃伊呢！我已不是一九六六年的那个狂呼着口号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了，我已不是那个穿着军装，站在金水桥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的那个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了。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广场上，我还能闻到血腥。是他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他还有什么理由盘据在这广场上继续接受人民对他的僵硬躯壳的礼拜呢？

我和苏江登车东下，去上海。

车过南京，徐水良来接我。徐水良是南京著名的民运人士。与我的经历相似，他也是经过文革的反省后，对中央文革反戈一击的老红卫兵。1975年底，他在南京新街口连续贴出几篇反江张姚王的大字报后，也遭到了省委组织的点名批判。被称为“南京的李一哲事件”。李西宁、秦峰这些南京“四·五运动”的带

头人都接受过他的影响。

略事休息后，已是晚上。他把我们夫妇带去城外一个朋友家住下。他很警惕，一路上都在注意有没有官方的探子跟踪，暗指给我看哪些人（甚至是情侣）有探子的嫌疑。

我北上南下半个月来，没有发现，也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事，心里倒有些笑他过于神经质了。

黑黢黢的城墙边有一条河沟，徐水良告诉我说：“这就是秦淮河。”我暗地一惊：这破败荒芜的两岸夹着的这道黑乎乎的水沟就是那记载着六朝金粉，箫舞笙歌的秦淮河么？就是那朱自清笔下的桨声欸乃，波光摇漾的秦淮河么？历史的陈迹在我的脑中闪电一般掠过。

第二天，我携苏江拜谒了中山陵。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之父安卧在紫金山上。紫金山气象肃穆，我放眼望去，飒然风来。虽不见离离之黍，却也是万籁俱寂，由不得心潮伏起，陡生悲哀：孙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安在？孙先生鼓吹的宪政共和理想安在？孙先生的衣钵后人安在？呜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徐水良欣赏并同意参加“学习通讯”。他带来了一些发起或参加过1976年“南京事件”的青年，让他们向我介绍当年的情况。这些青年对我很尊重，把我比之为“十二月党人”般的“老一代革命者”。我这才知道，在青年一代的眼里，我已经老了，属老一辈了。这一年我三十二岁。从此，我不敢再自称青年。

我父亲恰好在上海拍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说的是一位援华抗日被击落的美国飞机师，如何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救起的故事。歌唱中美友好。这是中美建交后的新潮。

我们见到了父亲，住进上海电影技术厂的招待所。这一带正是我儿童时代度过的地方。

我见到了傅申奇。

傅申奇给我的最早的印象，是看到他写的那篇著名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文章劈头就说：“我求学的黄金时代，正好是共和国最黑暗的时期”。

那是在中国之春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第一个改称“新中国”为“共和国”。这里包含了二层意思，一是为了与共产党喜称的“新中国”划清界限，二是为了暗示当前的中国号称共和国，应为共和国，而实非共和国，我们应为真正实现共和国而奋斗。

此文在各民运杂志刊出后，流传甚广。“共和国”之称令人耳目一新，青年学生，首先是北京的大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他们本能地领会到“共和国”之称在当时所包藏的叛逆意义。“共和国”一词立即成了时髦，风行于他们的诗歌、文章特别是他们的竞选演说之中，并迅速向作家、音乐家、干部、官方报刊席卷，最后以一曲《血染的风采》达到了它极盛的顶点，最终挤走了“新中国”，甚至“六·四”以后，那些枪口灌满鲜血的屠夫们也被官方糊里糊涂地（或干脆是欺骗地）授予了“共和国卫士”的称号。这也算得是反革命“执行革命的遗嘱”了！

总之，傅申奇第一个代表人民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讨厌“新中国”，向往“共和国”！

傅申奇第二个著名举动是他与上海复旦大学徐邦泰等人，勇敢地站出来，参加了上海区级人民代表的竞选。

1980年的县、区级人民代表直选，是在人民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党内改革派建设民主政治的一个进步表示，从动机来说，它是真诚的；但由于共产党不可逾越的“四项原则”的障碍，又使得它在实践上是虚伪的和欺骗的。

民主选举的前提，是拥有独立意志的个人，是个性独立的“自治的人”。但“四项基本原则”统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被压塑成非自治的，不允许有独立意志的“集中指导下的人”。共产党规定的“直选”仍然是“集中指导下”的直选，候选人不得有违背共产党意志的独立的竞选口号和纲领，因此，这种“直选”除了粉饰的作用外，与钦选相比，并无实质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是虚假的粉饰，民主志士也仍要充分利用它。于是，傅申奇“跳出来”，在他所属的拥有二千工人的上海动力机厂大声呐喊着宣布竞选了。

傅申奇家的居室很小，他把我引到了另一位朋友家，我们交谈。

我向他详细地通报了北京的“甘家口会议”。他赞成我不搞政党的意见，也同意参加《学习通讯》。我与他展开了理论问题的讨论。我们一致赞同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认为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对于中国的改革，我们也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当主张恢复中共七大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即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耕者有其田和发展有利民生的私营经济；保障民权；军队国有等等。我们商定，在我们今后的文章和所办刊物上，协力地宣传上述主张。

我还向他介绍了广州、台湾、香港民运的状况，特别是香港。我介绍说，四人帮垮台后，香港左派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形成了各种流派，绝大部分已站到了同情，支持国内民运的立场。国内民运应该加强与他们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不应害怕和拒绝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担负着使国家民主富强的共同义务。

对于民运今后的形势，我们也交换了意见，估计了邓小平最终完全向保守派妥协，全面镇压民运的可能性。我们同意可以而且必要对邓小平的压迫作出有理、有利、有节的抵抗。

在所有民运人士中间，我比较满意，比较放心的就是傅申奇了。后来我把《责任》交给他办就因此。

申奇又带我去复旦会见了徐邦泰。徐见到我很高兴。他告诉我，远在1975年，当李一哲在广州的大围剿中孤军奋战之际，他已遥望南天，愤然写下了一首鼓励李一哲的词《满江红》。他说这首词已在什么地方发表过，他把词拿给我看，我读了，心中非常感谢，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人心。

他又向我介绍了复旦和上海各高校的区人民代表竞选情况。他告诉我，复旦站出来七位学生。有中文系的张胜有，新闻系的徐邦泰，国际政治系的吴研雪等。他们各组班底，散发资料，接见选民，发表演说。张胜有称，陈景润不适于作人民代表。他只能作专家。“要当人民代表，就要勇于为人民说话”。

其它大学也开展了竞选。大学生们甚至为矗立在各大学门口的毛泽东巨像是推倒还是保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复旦大学党委奇迹般开明地承认了学生的竞选活动。

张胜有与徐邦泰曾主办《大学生》。徐邦泰在该刊发表了引起轰动的《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这是“八·九民运”鼓吹新闻自由的先声。

徐邦泰向我表示，他一旦当选了区人民代表，他将在这个岗位上不遗余力地为推进和保护民主运动做自己应做的工作。

傅申奇的竞选，在上海官方的压力和作弊下失败了，徐邦泰却取得了胜利。后来，我们看到，徐邦泰的确没有辱没他作为一个民选人民代表的称号和使命。

现在，徐先生是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联阵主席。

在杭州，我们终于见识了共产党的特务。

那一天在西湖边，我们在一家旅行社买了明天乘车一日游的票。下午经过那里，苏江顺便问了一下明天在哪里上车和什么样的车之类。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达旅行社，服务小姐悄悄地很紧张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小心呢！不知会不会有人要抢你们的東西。”

我一听这很有来头，便问：“这话怎么说？”

小姐说：“你们昨天买了票后，就有人来问你们买的是什么票，一日游还是二日游。下午你们来过，刚走，他们又问，你们刚才是不是退票。我们很奇怪，

问他们这样打听人家干什么？他们不说话就走了。……你看，你看，就在那边大树后面，就是那几个人！你们要小心呢！”

我这才想到，徐水良的处处警惕，虽说未免草木皆兵，但也确属多与此类人物打交道后的经验之见。

六月底，我回到了广州。一回广州，我便通过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就特务的跟踪事件，向广东省、市的公安机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二十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

徐文立的工作十分干练。我回广州后不久，他主持的第一期《学习通讯》已经整齐地出版了。这一期上，他制定了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计划草案。下一期轮到孙维邦。他发表了对陈尔晋《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的意见。第三期，就轮到我了。

这时我的写作任务很重，我必须抓紧整理和继续收集材料，把“1966——1976中国的阶级斗争”写出来。但我仍然挤出时间来，编辑第三期以完成我的义务。我为此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道的专政》，这是我的第三篇用民主思想改造“四项原则”的文章。

我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立论：

“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的，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

我据此批驳了一切（甚至包括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含人道主义的错误。

文中，我分析了列宁和毛泽东为什么会背离了马克思的人道理论，把他们的专政一步一步等同，甚至降低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专政的。

在革命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得使用他们的敌人使用的一切武器”……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共产党人使用敌人的武器，使他们获得了对专制主义的一步一步的胜利。但是他们每一步胜利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复，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沾染专制主义的传统”。

最后我强调：

“社会主义对全世界的感召力……首先在于它是一个人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生活，人们感到合理，感到温暖，感到自己是人。从而愿意把自己溶化于社会，为这个社会的进步献出自己的一切。”

后来，正是这篇文章，被中共的法官判决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宣传。

1980年的8、9月间，几乎同时发生了二件大事。一件是营救刘青运动，一件是全国民刊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先说营救刘青运动。

《人民之声》停刊半年以后，刘国凯静久思动，又开始有了一些行动的倾向。

我从外地考察回来，在下塘黄雨深家向《人民之声》同仁和几位香港友人作了一次各地民运状况的通报，同时向他们介绍了举办“学习通讯”及办此通讯的意义。致于被问到会不会遭致镇压和牺牲问题，我回答说：古往今来，立志于改革的进步力量，总是要准备作一点牺牲的。毛泽东说得好，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谁都喜欢享受胜利，但若谁都不肯去经受失败，付出牺牲，又怎么会有最后的胜利呢？我们要尽力避免牺牲，但也只有一定的牺牲，才能造成较大的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的前进。

刘国凯听我说完，大有感慨地补充说：

“是啊，我也考虑过波兰问题。如果波兰工人运动不是敢于在1956年、1970年作出牺牲，又怎么可能造成今天的声势，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他指的是以瓦文萨为首的团结工会终于迫使政府承认了他们。

恰值这时，徐文立向全国民运发出了一份情况通报：
原北京民刊《四五论坛》召集人刘青被秘密判处劳动改造三年

据北京消息：七月三十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刘青家属，刘青被判处（未经法院）劳动改造（而不是劳教）三年。已解押陕西执行，刑期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刑满后送原单位劳动。行前家属未见一面。

据口述，刘青被判处的理由是：

一，参加了傅月华组织的那次游行，是主动者；

二，公开出售魏京生一案公开审判的记录稿；

三，偷取病假条达一年多（被告之，这是判处的主要依据。原单位和北京的医院都曾诊断刘青有慢性病，主要是高血压）。

八月三日发自北京

刘国凯立即抓住了这个事件开始了大动作。他来找我商议。认为当初魏京生不检点，给官方抓住把柄，说是“出卖情报”，民运不好说话。现在抓刘青则毫无借口。民运若不站出来说话，让官方知道民运决不屈服于暴力，则终将唇亡齿寒，被官方一个个收拾。我赞赏他的精神，同意民运应该作出反应。他立即以《人民之声》牵头，倡议各地民运团体成立了“全国营救刘委员会”，发布了成立公告。这般勇敢，很出乎我的意外。

我为他起草了一份抗议声明，署“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迅速散发了出去。

我本人没有参加“营刘委员会”。我交李海东一份意见信，请他报广东省委转呈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要求迅速公正处理刘青问题。李海东担心我直接参加了“营刘委员会”，我告诉他没有参加，但若刘青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我会公开发表我的意见的。

刘国凯反复地恳劝我以个人名义也发一个声明；徐文立给我寄通报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真有些为难，感到这个“梁山”看来是非上不可了！

我并不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我十分清楚以我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会带来

的影响和风险。——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没有亲朋好友？你可以不惜自身，横一条心，慷慨赴死，但你不能不计算你会给你无辜的残年父母、孤妻幼子，瓜亲蔓戚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司马公赞扬李陵“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而非“全躯保妻子之臣”。他理解得很深刻，许多人临大节而苟且，“保妻子”这三个字在其中的分量。

但是我是《民主与法制》的写作者，我自命手中继续高举着李一哲理想的旗帜。当此北京警方无法无天，国家法制严重倒退之际，我噤若寒蝉，怂恿别人去讲话，自己却袖手一旁作壁上观，若如此，真不齿于人了！

我写信给徐文立，请他把情况再落实清楚，究竟是劳改还是劳教。这是错不得的。

徐文立回信说，已向公安局内部的朋友了解，确属劳改，情况属实。

我反复思索，想到北京市公安局受四人帮毒害深，他们对天安门事件平反心怀不满，总想报复。当此邓小平与民运决裂之际，他们无视国家法制的进步，故态复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提笔写了一篇东西，题为《就刘青审判案给五届人大代表同志们的信》。

我署了名将信给徐文立，嘱他再作调查，若确无大出入，便托将此信交全国人大。

同时，我也将写作此信的情况向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他的文书佟星作了通报，可能由于他们始终未能接到省委就此事的明确指示，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需要特别提一下佟星。

佟星作为李海东的助手，又作为同是文革过来的同龄人，与我一直很谈得来。在团省委其他干部大都冷落我，与我保持距离之后，他仍与我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属任务在身）。一次他因事到我家，闲聊中了解了我家的历史后问：

“你出身电影世家，为什么不去作一个演员呢？”

我答：“演员的一生，无论多么精彩，也是扮演别人。我为什么不直接扮演我自己呢？”

他赞叹道：“这话太有性格了！”

他清楚刘青案我的态度的全过程。但在后来的审判中，他作为官方公职人员不出庭却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可以致我于死命的伪证。并至今不愿见我，更不愿澄清事实。共产党的统治机器可以吞噬一个多么好的青年的良心。

他现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我祝他仕途顺畅。

不久，收到徐文立给我回信，再次肯定事实无大出入，他说他自己也署名后，已将信交郭罗基呈全国人大了。（注：郭氏在最近 95 年 9 月《争鸣》上发表的《魏京生与中国民主运动》一文中，提到了他在人大就刘青问题的发言，却没有提到此事。）

一收到徐文立已将此信呈人大的消息，刘国凯的“营刘委员会”立即将此信大量翻印，并向广州市内、全国各地和海外，广为散发和登载了。

官方震怒了。杨尚昆专门把李正天召了去，对他说：“王希哲现在太不象话了。再这样下去，该怎么办也就只有怎么办了！”他是通过李正天向我发出了最后的严重警告。

这封给人大的信任务是为刘青案辩护的，可记叙的不多，有一点需要记一记。

在向台湾新兴民主力量呼吁共同行动的那一段里，我写道：

“记得远在三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就说过，“中国应当统一，它应当统一于民主统一于进步。”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国民党台湾当局仍然顽固地反对民主，反对进步。最近他们还镇压了以‘美丽岛’为代表的新生代运动。我们应当坚决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这些错误。”

1986 年，台湾以原美丽岛领袖黄信介为首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成立，我尚在狱中，闻之极兴奋。总猜测这个党的名称与我 1980 年的上述呼吁，是否有着某种联系。但后来得知，这个党竟罔顾它对民族前途，对大陆民主运动所负的义务，兀自向“台独”滑去，深为遗憾。

与营刘同时发生的，便是“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及其机关刊物《责任》的诞生。它是 78——81 年中国之春民运达到的光辉顶点。

现在已经退出民运的何求和他的《人民之路》是这次代表大会的发起者，这是他对“中国之春”运动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大会的组织骨干，则是王一飞。

王一飞与我是一代人。是文革中铁路中学“红旗”的头头。他与他的弟弟王一鸣曾以武斗坚决闻名。自 21 中后山枪毙张金贵案，他服刑期满后便一直发配在从化民乐茶场。不知何时回城，到了广东罐头厂工作。

也许和我一样吧，他在农村漫长的岁月里也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九七九年夏他来我家，带来了一篇长文，《论智识阶级》。文中认为，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是错误的。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应该是智识阶级。中国民主的命运，只能寄托在这个新兴的智识阶级身上。

他的论点当然可以讨论。但作为文革一代过来的人，经历了大的挫折和苦难生活还能保持有这么一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他有志介入民运工作。我向他介绍了全国和广州的民运状况，特别提到了刘

国凯与何求之间的矛盾。我希望他能在广州民运的工作中，对刘、何二人的矛盾起一点协调和团结的作用。

后他便主要在何求的《人民之路》（80年12月改为《自由谈》）工作。因为刘国凯的《人民之声》时已停刊，但《人民之声》的聚会王一飞也是能够参加的。他的桥梁作用，十分明显。

八月中旬，王一飞、何求告诉我，他们已向全国各地民刊发出倡议，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大会定于九月上旬举行。

我吃了一惊，觉得这真是一个冒险之举。虽然我也早有这样的设想，在条件具备时，召开一次全国民运团体的协调会议，但是这样规模的代表大会，又在这样的高压条件下举行，简直是难以思议的。

我问何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了吗？文件怎样起草？人员怎样接待？他说都在进行。

我又问，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设想过了吗？何求答，他已经安排好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有人专门负责安全。

我没有再问，心想，若警察不来干涉，你要保卫人员何用？若警察干涉，这些“保卫人员”能够抵抗警察吗？

自文革以来，我非常清楚，中共对民间的全国性组织，警觉极高，一有苗头，立即取缔，这是毫不会手软的。因为这种组织，无论它是什么旗号，标榜什么宗旨，对中共专制的潜在威胁，都是极大的。我害怕为此民运遭到更惨重的摧残，但又希望经此一搏，代表大会真开成功了，那个意义将是划时代的。于是我采取了不反对主义的观望态度。

武汉的朱建斌、长沙的张京生、韶关的钟粤秋先后到达了广州，暂住何求家。天津、河南的代表已在路上。他们到达广州后，也曾找我，交换过意见。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疑虑。

8月31日夜，东山区农林街派出所以查户口为名，搜查了何求家，带走了何求、朱建斌、张京生和钟粤秋，民刊全国代表大会遭到了挫折。

王一飞处变不乱，紧急通知将原定广州召开的全体会议改为通过文件交流的地区会议。以代表们的双边互访，通信交换意见的形式，终于完成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成立任务。

各民刊协会会员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联合公告》如下：
联合公告

新兴的民主运动从几个月前的寒流中复苏，又开始了它的第二个成长时期。

于是，各地新兴民主运动的主要体现者——民刊编辑部，纷纷提出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要求与愿望。

鉴于这种呼声的日益增高，尤其是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与气氛，鉴于世界潮流的推涌，我们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

一个多月来，我们主要在广州，同时通过多边、双边的交流磋商等等的方式，紧张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准备工作。

这一民刊联合体便是“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今后我们将在这一组织内，共同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的实现，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作出我们的贡献。

至此，“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了！

我们同时坦率地指出：由于某些阻力的存在，使我们未能全部完成我们的工作。会议决定，未完的工作留待日后条件成熟时继续完成，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组织工作。

特此公告

全国民刊首届代表大会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以地名笔划顺序排列）

单位	代表	通讯地址
广州《人民之路》编辑部	何求	广州东山百子横路三号二楼
上海《人民之声》编辑部	傅申奇	上海动力机厂
上海《玫瑰岛》编辑部	鲁弟	上海崇明岛东门路七号
上海《后起之秀》编辑部		
山东《追求》编辑部	刘国璋	山东临清县国棉厂水电车间
开封《无名》编辑部	王静湖	开封市剧绒街二十一号
长沙《共报》编辑部	张京生	长沙市新中机械厂
长沙《理想通讯》编辑部	刘力平	长沙基础大学
长春《雪花》编辑部	彭金贵	长春汽车厂工具分厂锻模车间
宁波《飞碟》编辑部	童年	宁波市家具一厂
安阳《民主砖》编辑部	路建国	安阳市香港街十号
安阳《星光》编辑部	历万明	安阳市钢铁厂炼钢二厂铸锭车间
安阳《新时代》编辑部	尚运成	安阳市县东街四号
武汉《钟声》编辑部	朱建斌	武汉一冶三公司
青岛《海浪花》编辑部	孙维邦	青岛商河路三十九号乙门三〇三
贵阳《启蒙社》编辑部	杨再行	贵阳八角岩路一号
贵阳《使命》编辑部	曾省斋	贵阳中华南路七十三号
贵阳《解冻社》编辑部	李家华	贵州供电局
温州《呐喊》编辑部	郑玉林	温州小南路十七号
韶关《庶声》编辑部	钟粤秋	广东韶关冶炼厂硫酸车间
韶关《北江》编辑部		

这时的民刊协会会员是十九家。二个月后，它就增加到了二十八家，包括与徐文立不同意见，自行复刊的北京《四五论坛》杨靖。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一成立，立即着手举办了它的机关刊物——《责任》。在

他的创刊号上，发布了“新闻公报第一号”和王一飞起草，何求署名的代表大会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分三个部分：“简单的回顾”，“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报告追述了民主运动从李一哲大字报，四五天安门事件，民主墙以来的历程，阐述了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历史使命。

对于民刊，它强调“一个民刊比一个张志新的影响大得多。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民刊，就意味着千千万万的张志新要站出来为中国社会的改革而献身”。

报告警告“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对民主运动施加任何强硬的压力，都是不明智的”。

报告号召结束民刊混乱的“各自为战”状态，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联合统一的队伍，更深入到群众中去”。

它最后说：“我们将用我们的原则和行动，来开创这样一个先例：人们自由地为社会提供了物质与精神文明，又能自由地完全享受它！”

《责任》由王一飞主持（何求继续主办《自由谈》）。他与我商量，要求我主办《责任》，我正在撰写《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只答应担任顾问并为其撰写社评。

民刊协会积极开展工作。首先争取了香港各大学联合会是委员会和各大学的学生团体、学报，连续向全国人大发出呼吁声明，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要求制定新的出版法，开放报禁，保留人民使用大字报的权利以及释放刘青等政治犯等（从此，香港的民运与大陆的民运便逐渐沟通、呼应并最终打成一片）。然后，又正式以“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名义，向湖南师院北上请愿代表团发出慰问信，对他们发动的誓死反抗政府压制民主竞选的学潮，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深切的同情。

原来，十月中旬，长沙的湖南师院陶森、梁恒为首的数千学生，激于校党委与毛致用相勾结，压制民推候选人，强行钦定候选人，而爆发了大规模学潮，并迅速发展为静坐、绝食和北上请愿。同时工人为声援学生，正酝酿全市总罢工。但在某些投机分子被官方拉拢之后，运动终于遭到了分化和破坏。这是一九八〇年最具震撼力的一场学生运动。它促使邓小平下定了彻底铲除民运的决心。

《责任》为声援湖南，又发表了上海宝山县新当选的人大代表徐邦泰、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的意见书，对“长沙发生的因民主竞选遭受阻碍、干扰而引起的学生游行、绝食事件”表示震惊，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长沙事件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

这是中国民选的人民代表以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在民间的全国性刊物上公开

向政府发出抗议，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充分表现了真正的民意代表的威力。

长沙湖南师范学院的陶森等同学来广州见我。他们向我介绍了长沙各高校民主选举受到压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学潮的详细经过，及胡耀邦来长沙和在京接触王震的情况。他本人就是这次学潮的主要领袖和谈判总代表。我特别注意他介绍的高校学生们静坐示威时，长沙的工人也出动了游行队伍来声援他们。这真令我兴奋。文革以来，这是学生运动第一次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声援。陶森问我对这次学潮的意见。我的回答后来写进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中：

“今年十月九日深夜，当长沙湖南师院的学生为他们的民主权利请愿，来向他们的副院长苏明提出质问的时候，苏明愤恨地回答学生们说：‘这是文革的产物’。他糊涂了！这不是毛泽东文革的产物而是人民的文革的产物。他不知道，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这又是一次全国性的民运高潮。上海、长沙之外，北京有机化工厂何德甫，北京氧气厂龚平，韶关冶炼厂钟粤秋，河北清苑县王屹峰……纷纷站出来竞选，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

人民代表的基层直选，在北京的各大学也掀起了波澜。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张炜、韩志雄这些著名的民运活动家纷纷揭竿，亮出旗帜和纲领（甚至北师大还有刘少奇的大公子刘源）在万众的欢呼中号召选民投他们一票。在竞选辩论中，他们一致猛烈批评了北京中、高级法院对魏京生案的非法判决。

在这般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官方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稍微改变对人民舆论的蔑视，由北京高级法院出面，对所谓“判处魏京生案的根据”作了一番解释。

这是一个靶子，应该抓住它。

我立即以《责任》编辑部评论员的名义，写了《评北京高级法院 11·12 谈话》，对所谓“惩罚思想的扩散”不算惩罚思想的狡辩，给予了坚决的批驳。我说：

“扩散是思想存在的方式。世界上谁人见过未经扩散的思想？我有某种思想，但我守口如瓶，绝不去告诉他人，那末对于社会来说，我根本就没有思想！如果法律允许某个人头脑存在某种思想，条件是他必须紧闭嘴巴，那么这个法律有什么脸宣布它是最文明，最民主的法律？难道专制法律的任务不正是在于，它必须禁止扩散某种对它保护的对象来说，存在着威胁的思想吗？”

我要求王一飞从第二期起在《责任》的封面上加上口号：“青年们，别忘了你的社会——责任”。

在这一期上，我配合海内外的呼声和各地民刊的向官方机构交涉，争取合法注册登记的斗争，发表了评论：《评一九五二年的出版条例》。

我批评的是彭真，但我没有想到，针对人民的呼声，反民主顽固派陈云居然能够制定出如此反动，如此狠毒的方针：

“关于制定出版法的问题，我（邓力群）请示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指示，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蒋介石斗，就是利用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

怪不得，黄华监狱里，关某说不允许李一哲与共产党作“合法斗争”了。

你们看！曾自称反对国民党专制而号召革命，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的武装叛乱手段非法（非民国政府法）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他们自供，他们汲取了国民党还不够专制被他们“钻了空子”的教训，来对人民实行网罗更加严密的布尔什维专制！就是这样一些堕落到不惜向法西斯统治术总结教训的人，还居然要到联合国去说，中国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比在旧中国任何时期都多！江泽民先生，先不说“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请你们象国民党一样制定一个出版法，让人民为保障自己的权益自由发言，与你们作一点“合法斗争”可以吗？如果你连国民党给过你们的“民主和自由”都不敢给人民，你们“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又何在？你们推翻孙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除了给人民带来二十几年的“动乱”，数千万人的牺牲外，究竟有什么进步意义？

现在应该是反击邓小平的时候了。

自一九七九年春魏京生第一个站出来抵制邓小平的压迫罹难之后，民主运动一直对邓小平采取了一种忍让的态度，不希望与他的关系彻底破裂以有利于反改革顽固派。

但是邓小平咄咄逼人。他对1980年10月——11月民主运动再一次的高潮极其憎恨。在顽固派的唆使下，他发表了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讲话，决定对民主运动全面下手，动用专政的机器将其斩草除根。民主运动除了反抗，没有退路了。

我和王一飞、傅申奇商量后决定，《责任》必须堂堂正正，坚决全面地予以反击。这样，《责任》第六期发表了我撰写的社论《邓小平错了！》第八期又发表了傅申奇撰写的评论《民刊与法制共存亡》，（此时，中共取缔民刊的九号文件已经下达）对邓小平无视党内顽固保守派是改革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危害，却把他的前同盟军民主运动视为主要危害的错误，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批驳。社论指出，已经“无任何政府公职的邓小平公民”却对政府发号施令，本身就是违法。社论强调法律不是邓小平手中的玩物，人民的宪法权利必须要用战斗来保卫——

“至于我们，中国新一代民主青年，是决不会再害怕毛泽东时代已经司空见惯的超法律压制手段了。如果能为捍卫人民共和国宪法而在它庄严的国徽上洒下我们的鲜血，那真是无上的荣耀！就象血洒“四·五”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样，将值得永远自豪！”

是的，后来成百上千青年的鲜血又一次真的洒在这纪念碑下了，他们真的值得永远自豪。

由于我对何求历来不大放心，总感到他有向忠发的味道，对他的现有理论修养能否胜任领导全国民协感到不太信任，担心他消极影响王一飞，因此力主将《责任》迁到上海，由傅申奇主办。前面说过，我对傅是比较放心的。这样，《责任》第三期后，便在上海出版了，我仍担任顾问。我将我在港发表的文章的稿费（主要为《七十年代》支付）的一半寄傅申奇作为《责任》的经费，另一半，留作广州办刊使用。但在后来的被捕搜查中，正如刘国凯所说，思想准备不足，“坚壁清野”不够，被警方悉数没收。

二十四、《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〇年一月，我的三万字长文“1966——1976中国阶级斗争”更名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终于脱稿，在香港《七十年代》上发表了。李怡先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了及早发表这部著作，他甚至将杂志特为提早了一周出版。警方曾派人伪作李怡到我家探访，装得维妙维肖。我堕术中，浑然不觉。直到十二年后我出狱，还向记者们谈到我曾在家会见过李怡。后李怡先生来电话说“没有此事”，我才恍然大悟，不提。

这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其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今日读它，仍有如昨日所撰。它与《民主与法制》一样，是我个人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出狱二年的心血结晶了它，又是它使我重新回到了监狱。

在这部著作里，我表达了这样的中心思想，必须把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放到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矛盾斗争中去考察。

自五十年代以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当代进步与反动的试金石。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从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到，它的宗旨是为维护斯大林主义的，因此是反动的，是逆民主潮流而动的，这就注定了它最终要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而走向失败。

但是，文化大革命能够把千千万万的人民动员起来，它就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与专制官僚阶级的矛盾。

文革一开始，人民对官僚阶级的造反运动被缚在毛泽东的战车上，是他保卫斯大林主义，建立毛泽东帝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样，这个造反运动就具有了进步和反动的二方面性质。它冲击了官僚阶级，使这个阶级至今还对“造反派”刻骨仇恨，咬牙切齿，用尽一切方式来污蔑它，说明它是进步的；但这个造反运动在毛泽东、中央文革专制理论的蒙蔽，唆使下伤害了大量无辜，在打击了官僚的同时把毛泽东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加以崇拜，它又是反动的。

人民的造反运动在这进步与反动的痛苦碰撞中逐渐成熟，终于，它突破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背弃了毛泽东的战车，“反戈一击”，开始了追求自己的独特的经济政治利益的民主运动。它的正式发生以1976年的“四·五”为标志。这一点，连吴德都感觉到了。他在4月4日中共政治局为天安门事件定性的决策会上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这样的逆流。过去都是说‘想念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毛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了。”

在吴德这样一类共产党官僚的脑袋里，他们压迫人民是应该的。人民受了压

迫后就应该“想念毛主席”——这是既定的模式。真奇怪，现在他们连毛主席都不想了！他感到人民“猖狂”了，大事不好了！

非但“不提”，吴德不敢说的是，人民甚至已经公开向毛泽东的“秦皇朝”宣战了。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我把“四·五”解释为久蓄而爆发的“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我说，“这场大革命（你叫他什么都可以）至今还在延续，它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开始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宣布它结束的”。

有件事应该提一提。十三年后，我出狱，在香港金钟先生的杂志《开放》上甚至李怡先生的《九十年代》上看到介绍郑义先生的文章。说这种“两种文革”，即区分毛泽东的文革及与之对立的人民的文革的理论，是郑先生提出来的。我不知道郑先生首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阵地上提出来的。我很高兴能够“所见略同”。

一九八一年的春节，何求家召开了新春茶话会。香港各大学和社会活动家十余人参加。我向他们介绍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我指出，共产党把自己从一个“公仆党”变成老爷党并不仅仅是个党风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党风。要根本改变“不正之风”，就只有根本改革政治制度。

我没料到这个讲话被录了音，在后来的庭讯中作为“证据”放了出来。我更没料到这正是我在“中国之春”运动中，最后一次会见香港的广大朋友们了。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遵照邓小平对民运斩尽杀绝的十二月讲话精神，发布了取缔所谓“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九号文件。这个文件既记载了共产党顽固派的专制行为，又记载了民主青年们不畏强暴，为抗拒他们的高压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把这个文件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必须大段地摘录它如下：

近期以来，全国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积极活动，扩大发行范围，并且纷纷要求注册登记，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都企图争取合法地位。……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发，订阅，有一定的市场，其头头许多也就是非法组织的头头。有些非法组织，还力图在一些青年中扩大和吸收成员。……他们互相串连，秘密开会，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团体（你看，共产党多么害怕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旗号，进行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活动。有的甚至捏造说，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布满干柴”。他们妄图把所谓“社会上的每一次骚乱都利用起来，点燃这堆干柴”，“在危机周期中进行夺权”，搞反共反人民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有的还与国外、港台反华反共力量勾结，谋求支持，以扩大他们的反动影响，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

因此，中共专制主义顽固派的“总方针是”：

“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

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

“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你看，既要干法西斯勾当，又怕让世人知道！）

“对于同国内外及港台反动势力相勾结，泄露国家机密甚至出卖情报的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在取得确实证据后，应依法取缔，并惩办其中的首要分子”。

被邓小平的取缔政策激怒了的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寸步不让地采取了一种激烈的方针。他们决定组织“爱国护法请愿团”上京，到天安门广场请愿，对中共顽固派践踏宪法，拒绝民刊、民间社团合法注册，登记却给以强制取缔的专制行径，向全世界发出公开的强烈的抗议。

他们究竟是怎样决定的，我至今并不清楚。当王一飞向我通报此事时，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他们瞒着我，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必然坚决反对。王一飞告诉我，广州决定由何求代表去，他本人留在广州应变。傅申奇、朱建斌也决定代表上海和武汉去，与北京的杨靖会合。但是，傅申奇怎么也不与我商量一下？也许他以为是我同意的？我暗暗叫苦。

杨靖我没有接触过，只知道他比徐文立激进一些。但王一飞、傅申奇为什么也头脑发热了呢？《责任》又交给谁呢？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一个资料上看见傅申奇北上前给刘邵夫先生的一封信，使我知道了他当时的想法和对《责任》的交待：

邵夫兄：

很久未给你音讯，使你耽忧了吧？

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有小林主持，有稿件和其他事可与之联系。地址：和田路1950弄15室林牧晨。此行凶多吉少，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可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就此。

F 4 • 2 •

“F”为傅申奇。

秦永敏在给我的一个资料里写道：

面对中共九号文件，“傅申奇则认为浮头的鱼让他们一网抓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光荣流产，在北京制造一场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王一飞也有这个意思。看来，他们是讨论了的。

4月10日，何求、傅申奇、杨靖等人在北京同时被捕，天安门抗议行动流产。

“风萧萧兮易水寒。”无论政治家和历史家今后将怎样评价这次“护法请愿团”的北上，也许它确属一种类似中共史上的白区“左”倾盲动的冒险主义。但

是，它毕竟给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共产党顽固派迎头一击，让他们知道，他们一声恐吓，就能使中国的十几亿臣民战战兢兢，俯首听命的时代，已是一去不复返了！1989年“4·26”社论后，英勇的学生们也是这样。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4月10日北京逮捕后，天罗地网的全国大逮捕也就开始了。

4月20日，我这一生中第三次被送进了监狱。

二十五、“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

还是关某。他坐在审讯桌的一侧，用很漂亮的火机把香烟点着，悠然自在地望着我走进来坐下。仿佛我从来都在他的手心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样。

预审员换了。一老一少，正襟危坐。

“我们又见面了！”——他说。“其实我也很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再见到你。你自己要进来，我有什么办法？”（胡说八道！）

上次你们李一哲平反，我们就是有看法的。但既然省委决定为你们平反了，我们也就高高兴兴地放你们走。看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写的东西，跟以前真是大不相同了。不能不承认，你的这次进来，跟上次平反，还是很有关系的。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丢掉幻想，交待清楚这两年的问题。不要以为什么时候还会平反。”

我说：“这不是幻想，关先生，我坚信会平反的。哪怕一百年也是会平反的！我写的东西是大不同了。那只说明我进步了。我没有错。”

我和何求等的被捕，并没有使得原“营刘委员会”的朋友退缩。刘国凯立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作出反应。于是一份《告各界人民书》便在全国全广州和海外到处传播了：

亲爱的朋友、同志：

.....

上海“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广州《自由谈》负责人何求；《责任》及《学友通讯》编辑王希哲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北京《四五论坛》编辑徐文立、杨靖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杭州《之江》编辑王荣清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温州《东瓯》编辑郑玉林、邓焕武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韶关《北江》主编钟粤秋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武汉《钟声》负责人秦永敏、朱建斌以“反革命罪”被捕了。

.....

关于这次决定起草和发布《告各界人民书》的紧急会议，刘国凯先生有一个回忆如下：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从无抗争的声音。这次，我们这些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一定要打破这个陋规，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至于用什么形态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出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

他说他已想过了，有两个方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天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掂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从汽车往外扔东西的姿势。“这样，汽车一开动，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怔怔地凝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半点造作。心中暗忖：提出如此激进的方案，要么是极勇敢的民运战士，要么是……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一定会立即否定这个动议，因为太冒险了，必然会使更多的同志被捕。毕竟这一年多的磨练使我稍稍学到了一点“领导艺术”。我微微一笑，对大家说，范一平的意见大家看怎么样？或许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呢？短暂的沉静后，有人说，这样危险性太大，随即有人附议。王一飞说：“现在人大正在开会，还是寄给人大的好。我们都还是公民，寄信给人大总该是合法的。当然，共产党要抓人，尽可编造出所谓理由，但我们这样做，周旋余地毕竟比较大一些。”大家都表示赞同。王一飞接着提出，抗议信由他撰写，刻印由《人民之声》的同志协助，为保护更多的同志，抗议信（即“告各界人民书”）由他签署。

大伙沉默了，显然都为王一飞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所感动。而我的感触尤深。

因为只有我知道他在“学习班”中失去了几年自由，继而下农村，前几年好不容易回城做工。他的女友艰辛地等他多年，近期已准备结婚成家，现在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把一切危险都担在自己身上，其政治品格之高洁，真令人钦佩万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若要在广州七九民运中评议勇敢者，那王一飞应是第一人。

.....

具体安排由一飞决定。邓文伟、范一平都说愿去。危难之中见真情，在这凶险的时刻，《人民之声》的同志们都能挺身而出，使我内心极为感动。

散会后，我嘱大家分头离去。

果然，即使用这种十分温和的、亦符合中共所订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抗争，都不能见容于中共。王一飞被捕了，并一直关押着，久久不审判直至一年半以后才判了个监外管制三年。由于王一直在狱中关押，狱中一天算监外两天，故宣判后，立即释放。王一飞出狱后跟我谈起，公安局的人对他讲：“原来根本没打算捉你，是你自找的。发什么抗议信！如果我们不把你捉起来不知你还要搞什么名堂呢！”

不久，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传讯盘问。

为我和其他民运人士的被捕，海外舆论也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签名的抗议信、公开信纷至沓来。“大胆评论毛泽东，王希哲在穗被捕”之类的报道不绝于各类媒体。海外朋友们很了解我，他们一致认为我案是中共政府见不得人的又一次文字狱和思想狱。各大学学生会专门派团上来向省公安、司法部门询问王案。所得回答皆不得要领。许多朋友也来探访我的妻子苏江以示慰问。（刘山青甚至为此

横遭逮捕。)这一切，在视人民如刍狗的共产党眼里，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更使他们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与反华反共势力“勾结”之深。

这一次坐牢，已是“曾经沧海”了。情绪很快就安定下来了。我尝试写作小说。几个月后，小说完成，叫作《船，沉没了》，是我以我英德茶场的一位好朋友谢良先生的一出爱情悲剧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成的（原始稿）。看守所主管教邓某向我借阅，说是阅后一定奉还。结果一去没有回头。

故事写的是六十年代初，居住在南越西贡堤岸的一对青年华侨恋人。男主人公谢国明为逃避兵役，不打越共，在曾参加过香港海员罢工的老越共地下党员范某的安排下，回到了中国，女主人公李华英，则留在西贡。二人苦苦相思，盼望越共早日解放南方，南北统一，他们好完婚团圆。

终于越共打过来了，西贡“解放”了。华英跳上插着金星旗的坦克车去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越南华侨被迫害得纷纷逃亡。华英一家的财产被没收，绝了生计，华英险遭越共当权恶霸奸污，幸为已被整肃的老党员范某所救，终于也被裹进了逃亡的大潮。她携保姆老太太与几百人一起，挤上了一条破木船，驶向茫茫的南中国海，为菲律宾政府所拒，不得已折向香港。途中木船终于为风浪击毁沉没。华英将橡皮圈推给老保姆，自己为大海所噬。老保姆悲悲戚戚飘流到香港，终于见到了也遭中共极左政策的迫害批斗，离开大陆来到香港的国明，她哭诉着将华英临难脱下的戒指交给了国明……

过去，常听说作家在描述他们笔下的人物的悲苦时，也会痛哭流涕。这回，我有了切身的感受。特别是当我写到华英消失，老保姆抓住橡皮圈在昏暗苍茫的大海上绝望凄号之时，我已是涕泪雨下，不能自己了！

啊！当六十年代初，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少年一样，读着摧人泪下的《南方来信》，唱着“解放南方，勇敢向前进，打倒美帝，消灭卖国贼。骨肉离散，仇恨冲天，江山分割到哪年？”的越南战歌的时候；当我们在歌剧院里，听着《椰林怒火》中不屈的阮文追那慷慨就义的演说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热血沸腾，我们是怎样恨不得一下子站起来把旧世界砸个稀烂。我们怎能想到，多少年后，就会有谢国明、李华英的苦难，就会有中越边界上那万万千千作了炮灰长埋在地下的两国青年！

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悲喜剧，是人民曾经那样地欢迎了共产党，把它视为救星，最终又那样憎恶了共产党，把它视为……。共产党只准人民拥护它，不准人民憎恶它。但拥护和憎恶都是一种人类的感情。专制的法律和手段能够把人抓进监牢，但它能够改变人类的感情和人心的向背么？共产党需要反省一下的是它究竟为什么会从得人心变成失人心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恶意宣传”可以解释的么？

关某又来找我谈了一次话，希望我有一点认罪的表现，不然的话，他说：“我们就很难向检察院提出对你轻判的理由了。”

他看起来是真诚的。也许，只要我略有悔罪的表示，事后，也未必真的会判我十四年重刑。但是，我的思想已成体系，它已无法由我扮演一个尝试站到官方立场的王希哲去驳倒站在民主立场的王希哲了。除非去违心地讲一些骗人的假话，蒙混过关，再求一逞。对一些“政治家”来说，它也不失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手段，如邓小平的“永不翻案”的保证一般。不错，邓小平是混过来了，再次出头了，被自己封为“第二代核心”了！刘少奇、彭德怀则毁灭了。但在人格的感召力上，邓与刘、彭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六·四”枪声一响，英雄豪杰鸟兽散。入狱的，避难的大都投降了，“立功”了，自掴嘴巴了，怨天尤人了，它对民气的摧残，对正义的亵渎是何等巨大！然王军涛、陈子明、任宛町三君子，临难不苟，舍身取义，气贯长虹，又何其壮哉！

“戊戌”的精神须由谭嗣同来体现；民国的精神须由秋瑾、林觉民来体现；五四精神须由李大钊来体现；民主墙的的精神须由魏京生来体现；同样，伟大的“六·四”精神须由伟大的王、陈、任诸君子来体现。没有他们背负起黑色的十字架，六四精神将无地自容。

太累赘了么？不，我想，应该把王军涛先生在狱中给律师的信摘要下来，其青史留名：

张先生、孙先生：

.....

但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运动的领袖和发起人，在面对后果时，不敢负责任，诋毁运动时，我感到很难过。因为，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难者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和行为，但我相信，他们不少人是想为中国人民，为真理和正义战斗，献出了生命。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我不能再强调分歧，而应更多地崇敬他们的动机。那些活着的他们的同道不敢为他们辩护，他们于九泉之下不会瞑目的。为不使我的同胞含冤九泉，决定利用我的机会为他们的合理的但当时出于政治利害考虑我不赞成的观点辩护。我知道，这样做会加重对我的惩罚，但唯其如此，才能让死者安息。因为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难的处境下，不避风险，仗义执言。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请允许我把我“六·四”第三天在狱中墙上写下的诗再抄出来，献给军涛、子明和宛町：

黑云乱来露金甲，
满城何事雨天花？
长安卷去火正急，
金水扑来坦克车。
拼向飞灰不死鸟，
留得民气愤怒蛙。
燕赵慷慨悲凉地，
又见抚尸哭叛徒。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开庭， 在实际上的秘密状态中，
审理了公诉人陈裕华检察官对我的起诉。张锐法官任审判长。他们起诉我的是：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文章）
组织反革命集团罪；（甘家口会议与《学友通讯》）
煽动群众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罪。（刘青案给人大的公开信）

我没有辩护人。由法庭指定并与法庭勾结一再损害我的合法权利的“辩护人”
陈健文律师我当庭宣布不予承认。

我的家属没有一人被通知参加。

我为自己，为同志，为真理，为海外备受共产党污蔑的同胞、 团体在中国
民主运动中所作的一切，作了长篇的辩护（虽然它不时地为张锐法官粗暴地打断），
题目是：

“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

是的，让历史来检察吧，历史才是最无私的检察官；让人民来审判吧， 人
民才是最终审的法官！

秋风初起的十月，一副手铐，一辆吉普，当然，还有几名警察，送我上路了：
车颠簸着沿着崎岖的山道绕过清涟的北江，朝着西北驶去。在粤西北那望不到尽
头的深山野岭之中，有一座监狱，怀集监狱。我将在那里渡过漫漫的十四年。我
外面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的呢？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零时

后 记

一九九一年夏，从遥远的莫斯科传来“八·一九”政变的消息时，我已在狱中度过第十一个春秋了。罗海星敲响了水管（这是我们的“电话”铃声）。我们各自爬上了窗口。

“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有些惶惑。
我兴奋地说：“CP 完蛋了。叶利钦胜利了！”

随之，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整个东欧令人目瞪口呆的土崩瓦解。

那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红旗终于无可挽回地从它飘扬了七十余年的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下来了。•按理说，我们应该是高兴的。但罗告诉我，他有些难过，他曾是一位共产党员。

我也有些难过。望着这零丁飘落的红旗，不免心酸，双目有泪。

啊！红旗！红旗！当年保卫过你的保尔•柯察金们哪里去了？二十年前，我们千千万万的中青年踏进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保卫红旗为矢志的。我们叫做“红旗派”。像保尔一样，我们也曾经在那鲜红的旗帜上洒下过几滴自己的鲜血。

是我们背叛了红旗，还是红旗背叛了人民？

我曾经说过，对本世纪初叶那些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先驱者们的奋斗，我始终怀抱一种敬仰之情。人类的美好理想，从孔夫子的“大同”到西方耶稣的“博爱”，都是一种朦胧的共产主义精神。人类几千年都夸父追日一般，追逐着这个伟大崇高的目标。

但是，当共产党胜利了，它把这乌托邦施行於社会，强制人民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它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空灾难。

从纯粹个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面人民曾为它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旗飘落下来，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不要忘了，正是这面鲜艳的、美丽的、似乎一切都是在为人民利益着想的红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派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全部藉口。

那末，让历史上应该消逝的东西消逝吧！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马克思）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王希哲给江泽民主席先生的信

尊敬的江泽民主席阁下：

最近，您的法院再次判处了著名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魏京生先生十四年徒刑。我深感惊讶。诗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然心所谓危，冒着也被您的警察和法院抓进去判处颠覆罪的危險，给阁下写几句话，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我曾在某本书中了解到，阁下对中国人权理论问题的突破曾是有贡献的。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政府扬弃了拒不承认主义，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来提出和论证中国的人权问题，确是在1990年12月阁下对人权问题的批示后才开展起来的。翌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应该说是阁下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无论中共政府过去和现在实际做得怎样，《人权白皮书》毕竟代表了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进步意向。但是，江主席阁下，您今天的惩办魏先生，是否从人权白皮书倒退了呢？在那个白皮书里，您的政府承认人民有思想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自由。你们把“反革命罪”解释得非常严格，把它限定为只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受到惩罚的”那些行为才在中国被视为犯罪（反革命罪）。那末，今天您的法院审理的魏先生的行为可以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的行为吗？举例来说吧，我们记得，过去中国政府曾以一个国际正义人士的朋友的资格，同情和支持曼德拉先生，并不认为曼先生反对他的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甚至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他的政府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则魏先生之言行与曼先生比又何如？江主席阁下如此惩办魏先生，在世人面前究将自己置于何地？

您的法院审判魏先生，看来，显然是根据您最近在政法会议上的一个讲话行事的。我不赞成您的讲话。

二十多年来，我希望我国能成为一个文明的讲求民主与法制的国家。中共也曾接受过民主与法制的口号。但一个政党要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随心所欲地操纵和解释法律，决不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江主席先生至今坚持要把共产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您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根据这个说法，江先生与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认为共产党自身可以不受法律的束缚。共产党只有“领导人民制定”和“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权利，而没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正因为这样，即使你们的宪法规定了人民享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但只要任何一个人民真正来实践这个自由（首先是批评共产党政府的自由）您的警察和法庭就会以莫须有的“主观具有颠覆意图”的指控将其入罪（奇怪的是，政府是人民公仆，主人不喜欢这个公仆，要批评它、“解雇”它，怎么就有罪？岂不主仆颠倒，恶仆欺主了么！）。

江主席阁下主政以来，提倡孔孟，熟读孔孟。难道不记得孔圣人有教诲说，为政之道，甚至可以去兵，去食而必须存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么？您的政府经常漠视人民的宪法权利，经常地在法外自定非公开的秘密条例剥夺人

民的合法政治权利，把这说成是“党领导人民执行法律”，“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你们的执行机关行政从来只根据“文件”，不尚法律；中国的百姓从来也只是打听“文件”，不关心法律。这难道不是事实么？但这一来，我国人大颁布的宪法和法律对于世人还有信么？“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你们总不高兴香港人民对“九七”后的命运的怀疑，说是“已经给了你们《基本法》的保障嘛！中国政府对外的保证从来是讲信用的嘛！”且不说香港、大陆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法律待遇上不平等本身就违宪，就以《基本法》来说，不也是你们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因此也应由你们共产党来领导执行（这中间必有“文件”）的么？你们定的法在大陆失信，却说能够在香港有信，何以服天下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直的。一个有信政府无论对内对外，应该在任何地方都是有信的。

一个失信的人应该受到他人（哪怕这个人本身有毛病）的批评；一个失信的政府也应受到天下人（哪怕批评它的外国政府本身并不理想）的批评。这并不是什么“双重标准”。中共执政以前，不是也很欢迎外国政府和人士对中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专制主义错误进行批评吗？毛泽东在评论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的一个演说里就说过：“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的军事、政治纷纷议论’”。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干涉中国内政，是“霸权主义行径”，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相反他很欢迎这个“干涉”。对蒋介石委员长的不接受外国政府的批评，对他的“烦恼”和他对外国政府、人士的“指责”，毛泽东倒认为是“十分可笑的”（请见毛选909页）。维护国际公认的民权准则，应该天下一家，应该互尽责任，这是很好的毛泽东思想，中共不应该坚持么？中共政府在六十年代前，对美国、对苏联、对南斯拉夫、对一切“反动”国家的反民主侵人权行为，批评还少么？这是正确的。一个人要有正义感，一个国家也要有正义感。一个鼓吹“自扫门前雪”，对国际社会没有正义感的国家，它的人民对它的国家和社会也不会有责任感，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只会是自私的、腐败的，这个国家也只能是可悲的、可怜的。

中共辩解说，它的政府至今并未在《世界人权公约》上签字，因此它的国内法可以不受人权公约的限制，也因此，它可以拒不考虑世界舆论对它违反人权公约的批评。

且不说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却自拒世界公法是何形象，我要提醒的是，中共忘记了它的政府主办的第十四届世界法律大会发表的《北京宣言》曾明确号召：

“大会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并通过国家立法来确保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受到尊重。”（《人民日报》1990年4月28日）

中共这样宣言了之后，难道就可以“说完拉倒”，不负任何义务了么？它“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国际人权条约”，呼吁所有国家“立法来确保个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自己却不参加、不“确保”，人家批评它，它就翻脸发脾气（与蒋

委员长当年的脾气一样)，这不是愚弄世界各国，愚弄世界人民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共政府连这点传统民族道德都忘记了么？

江主席阁下也许会说，共产党也是为国为民的呀！我们必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呀！最近，阁下甚至说：“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不对的。不敢谈西方，哪怕仅根据中国传统优秀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我们也应该说，一个国家的政法工作的首要任务应是维护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的实现。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法工作着眼点首先是维护统治者的稳定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它就决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你们辩解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好的，那么我要问，当年的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国？为什么它就没有权利首先为了维护它的统治的稳定来压迫你们共产党了呢？为什么它就没有权利把“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放在政法工作的首位”而制定《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等以对付你们共产党人的民主运动了呢？难道二十年代中国人民的人权要求最紧迫的是政治权而不是“生存和发展权”，九十年代，倒反过来，中国人民最紧迫的却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不是政治权利了么？既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稳定社会的法律是任何一国都应该做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共产党为什么要触犯上述法律？为什么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你们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不是为了你们的一党私利，你们怎么解释你们的历史？你们怎么为自己革命的正义性辩护？

根据你们今天的逻辑，那么，让我们回忆一下1927年，若不是你们党发动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造成的“动乱”，造成的北伐后方的“不稳定”，又怎么会引起蒋介石、汪精卫的清党呢？

你们搞的这些民主运动，不是连你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认为过火了么？因此，国民党对你们党的压迫和屠杀是正当的。只有压迫了你们，屠杀了你们，消灭了你们，实现了“稳定压倒一切”，国民党才有可能顺利北伐，才可能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才可能着手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可能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总之，国民党才能做成一切事情，否则“一切事情都通通做不成了”！

反过来，共产党对国民党压迫的一切反抗：你们的“暴乱”和“叛乱”，你们的武装割据，你们搞全盘西化的两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纯是西方的东西）便是非正义的。由此引起的十年内战，由此引起的日寇入侵，由此引起的北方那个无产阶级领袖的苏维埃国把外蒙古从中华民族割裂出去，由此引起的数千万中国人的死亡和流离失所通通都应由共产党负责，是不是呢？如果历史应该是这样写的话，那么，我们要问共产党为什么不早点省悟“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为什么不早点省悟中国人民首先要求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道理，在1927年就把自己解散了，让国民党在70年前就安安稳稳地把“什么事情都做成了”，那我们的国家今天该是多么富强呀！

但那时的共产党并不认为稳定就可以压倒一切的。他们认为，首先应该争取和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因此他们发动了民主革命。他们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先

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他们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要求，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时中共的人权观和国际公认的人权观没有任何不同。这不是本人的臆造，它有共产党无数次的宣言和报告为证）。它认为只有首先实现和维护了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政治权利，才可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真正稳定，才能动员和实现全民的抗战，人民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才能做成一切进步的事业。我王希哲始终坚信共产党的这一主张是正义的，也仅仅因为这样，我坚信共产党当年的革命是正义的；我始终没有忘记和拥护共产党的这一民主主张。但共产党自己却把它的主张忘记了，它的历史忘记了，把它当年得以获得人民拥护而最后胜利的这些主张说成是“不合国情”、“破坏稳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而弃之如敝屣了。

江主席阁下，您作为党的总书记难道真的不感觉，你们今天的理论无法解释你们的党史所可能包藏的危机吗？危机在于，若共产党真的反省了，感到它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万万人民尚未得到温饱的条件下就超前地把争取人民的政治权放在首位而坚持革命政策是错误的，那么，逻辑的结果，共产党就必须承认，它在民主人权口号下用枪杆子夺自国民党政府的权力是非法的，而被迫撤退到台湾的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中华民国才是合法的了！这个危机难道还不深刻么？

我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反革命家。我不愿意去推翻任何政权。二十多年来，我只是用我的笔对历史和现存社会进行评论，促其改革。我只向事实负责，只向历史的逻辑负责。“在秦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先贤有范，如此而已。

尊敬的江主席阁下，前面我说了，我担心您的警察和法院明天也会以颠覆罪逮捕我，并且在“公开审理”中，又会以“票发完了”，“法庭不够大”为理由拒绝一切你们不喜欢的人旁听。那么，就会象1982年你们的法庭所做的那样，人们将听不到我的一点声音。为了预备这一点，我把给阁下的这封信作为我事先的辩护吧。伟大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在它的第十九条中宣告：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我希望在您的法庭可能审判我时，世界人民，包括一切没有忘记他们当年民主理想的正直的共产党人能听到我的上述声音，并得到他们的同情。

王希哲

1995年12月28日(全文完)